

#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带一路”的价值研究 (胡键)

Study on Valu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u Jian)

中国崛起、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 (张小明)

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World Order  
(Zhang Xiaoming)

全球伦理与国际话语权 (孙英春)

Global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Sun Yingchun)

作为一种跨国挑战的“中国挑战”：  
对当代美中关系的启示 (潘成鑫)

The “China” Challenge as Transnational Challenge: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U.S.-China Relations  
(Chengxin Pan)

印度对印太外交的考虑及其局限 (李莉)

India's Indo-Pacific Diplomacy and Its Limitations (Li Li)

国内政治、对外政策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  
(韩召颖 赵倩)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Han Zhaoying and  
Zhao Qian)

权力转移、地位焦虑与中美战略竞争新态势  
(王秋彬)

Power Transition, Status Anxiety and New Trends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ang Qiubin)

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倡议与全球行动(林跃勤)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ese Proposals  
and Global Actions (Lin Yueqin)

Aalborg University 丹麦奥尔堡大学

Huaqiao University 华侨大学

**Editor in Chief**

李形 (Li Xing), 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林宏宇 (Lin Hongyu), Huaqiao University, China (for Chinese editions)

**Associate Editors**

Ane Bislev, 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Jesper Willaig Zeuthen, 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Wang Qiubing, Huaqiao University

Shang Huipeg, Huaqiao University

Chen Wenshou, Huaqiao University

Wang Guanxi, Huaqiao University

Zhuang Guotu, Huaqiao University

Huang Rihan, Huaqiao University

Li Yiping, Xiamen University

You Guolong, Huaqiao University

Ye Qilin, Huaqiao University

Zhang Shengju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 Sume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 Q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iang Yang,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ng Yuan,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Wang Huanxiang, Jiaying University

Chen Hongbi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Zhang Shu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ournal Manager and English Language Editor**

Ashley Kim Stewart

**Chinese Language Editor 中文责任编辑**

范强 (Fan Qiang)

**Cover Design 封面设计**

黄日涵 (Huang Rihan)

**Published by**

Aalborg University Press, in collaboration with Huaqiao University

**Distribution**

Download as PDF on [www.journals.aau.dk/index.php/jcir](http://www.journals.aau.dk/index.php/jcir)

**The Secretariat**

Kroghstraede 1

Aalborg University

9220 Aalborg East, Denmark

Tel. +45 9940 9150

E-mail: [stewart@cgs.aau.dk](mailto:stewart@cgs.aau.dk)

Homepage: [www.journals.aau.dk/index.php/jcir](http://www.journals.aau.dk/index.php/jcir)

# 目录

“一带一路”的价值研究.....	1
胡键	
中国崛起、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	13
张小明	
全球伦理与国际话语权.....	24
孙英春	
作为一种跨国挑战的“中国挑战”：对当代中美关系的启示.....	34
潘成鑫	
印度对印太外交的考虑及其局限.....	50
李莉	
国内政治、对外政策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	63
韩召颖 赵倩	
权力转移、地位焦虑与中美战略竞争新态势.....	85
王秋彬	
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倡议与全球行动.....	96
林跃勤	

## Table of Contents

<b>Study on Valu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 .....	1-12
<i>Hu Jian</i>	
<b>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World Order</b> .....	13-23
<i>Zhang Xiaoming</i>	
<b>Global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b> .....	24-33
<i>Sun Yingchun</i>	
<b>The “China” Challenge as Transnational Challenge: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U.S.-China Relations</b> .....	34-49
<i>Chengxin Pan</i>	
<b>India’s Indo-Pacific Diplomacy and Its Limitations</b> .....	50-62
<i>Li Li</i>	
<b>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 .....	63-84
<i>Han Zhaoying and Zhao Qian</i>	
<b>Power Transition, Status Anxiety and New Trends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b> .....	85-95
<i>Wang Qiubin</i>	
<b>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ese Proposals and Global Actions</b> .....	96-108
<i>Lin Yueqin</i>	

## “一带一路”的价值研究

胡 键

**【摘要】**“一带一路”五年来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一情况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广泛的认同和接受，但在一些国家、一些地区以及一些项目的合作中也遭遇到一些困境。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沿线国家尚未构筑“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价值，从而使合作缺乏持久有效的基础和发展动力。鉴于此，沿线各国需要共同构筑“一带一路”的价值。当然，这种价值并不需要重新打造，而是从沿线多样文化、多样文明中寻找和提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最大价值公约数，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实践的引导力、凝聚力，并在沿线国家中产生“一带一路”合作的向心力。只有这样，“一带一路”的合作才会持久，合作的实践才会不断深化中产生实效。

**【关键词】** 一带一路；共同价值；多样化；最大价值公约数

**【作者简介】**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Study on Valu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stract:**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reflect its wid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by countries along its route, but it has also encountered some difficulties in cooperation with some countries, regions, and projects.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complex, bu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fact that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have not yet adopted the common valu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using the lack of a lasting and effective basis of power for the initiative's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light of this,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the valu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value does not need to be reinvented, and we need to seek and extract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of value from the diversity of the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in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nations along the route, guiding and making a cohesive force of the practic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enerating centripetal force for cooper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ly then will cooper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 sustainable and its practices deepen effectively.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mmon values; diversity;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of value

**Author:** Hu Jian is Director and Professor at the Research Centre of Soft Power,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倡议，五年来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就意味着，作为一项战略性的国际合作倡议，它虽然由中国提出，但显然有十分重要的国际基础。根据笔者的观察，“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基础主要来自以下两大宏观性因素：一是中国过去的发展得益于世界各国的支持。众所周知，中国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国际体系之后才取得现代化的伟大成就，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通过“筑巢引凤”的方式不仅获得了外部资金的支持，也获得了外部技术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是开放国际体系中的最大获益者。当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也理解自己的责任<sup>①</sup>。所以，在联合国维和、人道主义救助、环境保护、流行性疾病防疫等方面，中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是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其发展理念从“离不开世界”转化为“反哺世界”。“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就是中国反哺世界发展理念的具体载体。然而，我们也要承认，“一带一路”五年来的实践遭遇了不少问题和困惑，以至于有的项目难以推动，有的被搁浅，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沿线国家尚未构筑“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价值，从而使合作缺乏持久有效的基础和发展动力。鉴于此，本文专门探讨构建“一带一路”共同价值的可能性问题。

### 一、为什么要构建“一带一路”的共同价值？

既然“一带一路”是经济发展的战略合作倡议，那么就应该构建一种沿线国家关于在“一带一路”框架内长期有效合作的共同价值。这实际上是跨国战略合作和国际组织构建的一条基本经验。在这里，笔者将以两个案例为证，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上合组织。

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成果就是建立欧洲联盟，而欧洲联盟能够成功建立并非只是为一体化而一体化，而是基于共同价值。国内学者对欧盟共同价值的研究较少，更多关注的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关注欧盟作为一种全新的“规范性力量”能否成为地区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一种新模式。<sup>②</sup>有的甚至担心欧盟这种“规范性力量”会运用其规则、价值观及观念来规范世界政治和经济，从而演变为对世界的一种“规范性强权”。<sup>③</sup>但是，也有少数学者对欧盟的共同价值进行了了解与研究，认为欧洲一体化建立在“和平”与“安全”两大基本价值之上。<sup>④</sup>回顾欧洲一体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sup>②</sup> 洪邮生：“规范性力量欧洲与欧盟对华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52-65页；张茗：“‘规范性力量欧洲’：理论、现实或‘欧托邦’？”，《欧洲研究》，2008年第5期，第1-16页。

<sup>③</sup> 崔宏伟：“‘规范性强权’欧盟与中欧关系的和谐发展”，《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第54-61页。

<sup>④</sup> 杨逢珉：“和平与安全：欧盟对外政策的基本价值理念”，《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43-154页。

化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欧盟内部所蕴含的共同价值。欧洲之所以走上一体化道路，就是因为欧洲长期以来饱受战乱之苦，以至于欧洲的思想家们一直在思考如何避免欧洲陷于战乱的问题。早在1625年格老秀斯（Hugo Grotius）就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诉诸武力解决的可能性问题。18世纪以后的欧洲战乱频仍。在这种情形下，一些思想家如圣一皮埃尔（Jean Pierre）提出了“永久和平方案”，第一次将“永久和平”视为一种崇高的理念，甚至提升到价值的层面。1795年，康德（Immanuel Kant）在《永久和评论》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世界联邦以实现永恒和平的设想。区别在于，不同的思想家对欧洲一体化的设计有所不同。早期的思想家们既有邦联主义的设计方案，也有联邦主义的理想。而冷战结束以后，一些思想家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是把欧洲一体化置于超越民族国家即“后民族结构”的语境下来设计。他认为，“后民族结构”意味着必须用超越民族公共领域的交往关系来建立欧洲的一体性。一体化本来是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成就，但在一体化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正在失去力量，特别是在国家的调节功能、国家的古典组织功能等方面，国家已经失去了它的“优先性”，代之而来的则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sup>⑤</sup>但实际上，从圣一皮埃尔（Jean Pierre）的邦联主义理论到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论”，从库登霍夫-卡勒吉（Kudenhoff-Kareski's）的“泛欧运动”到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的“欧洲联盟计划”，等等，几乎所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为了避免欧洲重新发生战争，建立一个在合作基础上的永久和平的欧洲。<sup>⑥</sup>因此，“和平”与“合作”才是构筑欧洲一体化共同价值的两大精神支柱。“和平”与“合作”的共同价值包含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即“更加统一，更加多样化”（more unity and more diversity）。“更加统一”反映的是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开放性，体现的是“合作”的价值；而“更加多样化”彰显的是欧洲一体化的文化包容性，体现的是“和平”的价值。因此，文化的包容性和政治的开放性就构成了欧洲一体化即欧盟的共同价值理念的基本内容。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欧洲一体化遭遇例如英国脱离欧盟等诸多困境，但欧盟依然还能正常运行。

再来看上合组织，这是一个全新的地区多边机构。前身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主要是为了解决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界问题和军事互信问题。经过五年的发展，“上海五国”基本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由于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地位逐渐下降，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在中亚地区呈现出合流的趋势，并直接威胁到相关国家和整个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面对这种复杂的新情况，“上海五国”于2001年在上海正式升格为一个地区多边组织即上合组织。除了上述五个国家外，乌兹别克斯坦也成为创

<sup>⑤</sup>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sup>⑥</sup> 胡键：“欧洲的‘后现代性’及其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第65-70页。

始国。最初，上合组织并没有一个共同价值，但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内容的“上海精神”，这也成为上合组织的共同价值。在这种共同价值的支撑之下，上合组织才获得强劲的发展动力。<sup>⑦</sup>近20年来，上合组织的发展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未来的上合组织不仅能够为地区各国树立起牢固的安全屏障，架起经济、文化交往的桥梁，还能够开辟一条区域合作的新路径，促进成员国的包容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⑧

欧盟和上合组织的发展历史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发展有重要的启示。第一，建立在共同价值基础上的合作才具有持久性。前文述及，欧盟虽然目前遭遇一些困境，但几个世纪以来思想家们的艰辛探索为当今欧盟深入持久的合作构建了一套共同价值。因此，欧盟绝对不会因英国的“出走”而解体。上合组织的发展不仅因为其具有新功能（最初合作的两大轮子：非传统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新机制（平等、开放、不针对第三方）、新理念（即“上海精神”），还因为在“上海精神”的共同价值支撑下其内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的功能不断外溢（从非传统安全合作、经济合作到其他各个领域深度且有效的合作）。第二，价值的功能在于导向。如果没有价值的导向，任何治理都会丧失其目标。<sup>⑨</sup>“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从主观目的上来看不是为了构建一种地区治理的方案或模式，但客观上它通过促进沿线国家尤其是欧亚大陆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客观上发挥了通过经济发展塑造欧亚大陆秩序的作用。<sup>⑩</sup>因此，“一带一路”就需要一种共同价值作为导向，以避免盲目塑造相应的地区秩序。第三，“一带一路”是跨国合作倡议，沿线国家不仅社会制度不同，而且宗教、文化、民主结构等差异非常大，不同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所持的价值理念也大相径庭。如果没有基本的共同价值，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合作。而共同价值就相当于从不同文化、宗教、民族、社会制度等方面提取出来的最大公约数，是共同认同的价值，这样的价值才能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中深度、有效发展。

## 二、什么是“一带一路”的共同价值？

共同价值无疑是以多样性、多元性、复杂性为前提的，单一性、一元性和简单性就无所谓“共同价值”，而是“自有”价值。既然是“共同价值”，那么就意味着在共同价值之外还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在寻找“一带一路”共同价值的时候，必须承认沿线国家各民族价值存在的差异性。这也就给寻找“一带一路”共同价值增加了困难。但是，既然是跨国、跨地区的合作，又要使这种跨国、

<sup>⑦</sup> 胡键：“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动力”，《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45-50页。

<sup>⑧</sup> 孙壮志：“新时代上合组织的新作为”，《人民论坛》，2018年第10期，第38-40页。

<sup>⑨</sup> 胡键：“全球治理的价值问题研究”，《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第3-15页。

<sup>⑩</sup> 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4期，第13-19页。



跨地区的合作具有长期的实际成效，就必须寻找到一种可以被沿线各国所接受的共同价值。当然，“一带一路”的共同价值不是重新构建，而是在各国既有的文化中去寻找、抽取和提炼。那么，如何去寻找、抽取和提炼“一带一路”的共同价值呢？

第一，一个前提是要明白“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和目标究竟是什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关于其内容的研究颇多，并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一带一路”的话语和观点。例如“‘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的大战略”<sup>11</sup>；“‘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新国际主义外交战”<sup>12</sup>；“‘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sup>13</sup>；“‘一带一路’是中国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战略”<sup>14</sup>，等等。此外，一些学者在对外宣传的过程中更是把“一带一路”视为诸如“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的方案”、“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再造中国，再造世界”的方案等。实际上，从最初提出的设想来看，“一带一路”并没有承载如此多的功能，其最主要目标还是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来提高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完善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众所周知，中国过去的对外开放主要始于东南沿海地区，也就是从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到沿海经济开发开放区的对外开放格局。而中西部的开放程度仍然十分有限。即使是这样并不完善的开放格局，也使中国真正融入了国际体系，使中国在既有的全球化体系中实现崛起。另一方面，这种开放格局也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地区二元现象，即东岸沿海地区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发展缓慢。这种情形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最大障碍。因此，中国需要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以促进社会经济和现代化的平衡发展。既然中国是由于融入国际体系而实现崛起，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的确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同样，发展起来的中国必须要为世界的发展做更大的贡献，也就是前文所述的反哺世界。因此，“一带一路”可谓具有“一举两得”的功能：它既是促进中国内部平衡发展的经济计划，也是把中国发展的势头延伸到世界各国（首先是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设想。不过，充分发挥后一种功能需要沿线国家的友好合作，单独靠中国一国绝不能完成这种跨国、跨地区的合作使命。

第二，一个重要的现实是要明白“一带一路”穿越了复杂多样的文明形态，沿线各国的民族、宗教情况十分复杂，所以各族民众所持的价值也各异。从地缘经济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周边的核心是中亚—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东盟国家）。本文以中亚—南亚地区为例。需要强调的是，

<sup>11</sup> 姚勤华：“‘一带一路’系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社会观察》，2015年第6期，第20-21页；信强：“‘三重博弈’：中美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美国研究》，2016年第5期，第19-30页；刘昌明、姚仕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欧亚一体化战略与大西洋主义”，《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1期，第56-66页。

<sup>12</sup> 李文、蔡建红：“‘一带一路’对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实践意义”，《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第4-6页；胡宗山、鲍林娟：“‘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外交新动向”，《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27-32页。

<sup>13</sup> 金中夏：“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探讨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战略”，《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6期，第57-64页；另外还可参见金玲：“‘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1期，第90页。

<sup>14</sup> 熊艾伦、范勇建、张勇：“‘一带一路’与过剩产能转移”，《求索》，2015年第12期，第75-79页；张理娟、张晓青、姜涵、刘畅：“中国与‘一带一路’产业转移战略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第82-92页。

笔者把中亚与南亚看作一个地缘结构内的不同部分,原因在于四点。其一,历史上,中亚、南亚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统治印度300多年之久的莫卧儿王朝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在印度建立的封建专制王朝,但王朝的政治中心长期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喀布尔从地缘上来说就是连接中亚与南亚的枢纽,喀布尔的形势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中亚、南亚形势的风向标,在地区稳定与反恐问题上尤其如此。<sup>15</sup>其二,中亚与南亚在地缘上的分割时间并不太长,也就是苏联存在的70多年。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了寻找出海口和从经济上融入国际体系,中亚各国实行了多向化的平衡外交,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南亚。对中亚国家来说,南亚国家既关系到自己的安全问题,也是它们能源的主要消费国。其三,南亚的两个大国——印度、巴基斯坦已经正式加入上合组织,而该组织曾经主要是为了维护中亚地区稳定和促进中亚各国经济发展而成立的地区组织。当然,印度、巴基斯坦在没有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前就已经是该组织的观察员国。因此,它们与中亚各国的联系非常紧密。其四,中亚—南亚地区的宗教、文化及民族构成最为复杂。由于历史上被不同的外来势力统治,征服者不仅带来了屠杀,也带来了文化。因此,中亚—南亚地区最初都是以本土文化为主,在此基础上诞生了诸多本土化的宗教,如印度教、佛教、萨满教、袄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这一情况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传入,历时千年之久。后来,佛教从印度向西北方向发展,逐渐成为中亚—南亚地区的主导性宗教,到公元四五世纪时,佛教已成为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的主要宗教,并且与其他宗教在中亚地区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教缘”格局。这种情形大致延续了300年,随着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帝国的领土扩张迅速征服中亚地区。大约在16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强制推行下,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换言之,伊斯兰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宗教战争彻底征服了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sup>16</sup>中亚地区不仅宗教复杂,民族构成也非常复杂。中亚五国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数量最多的是哈萨克斯坦,境内有131个民族,民族数量最少的塔吉克斯坦也有80多个民族。<sup>17</sup>实际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南亚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民族构成也非常复杂。民族构成的复杂性给中亚—南亚地区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宗教、民族的复杂性反映的是文化的复杂性。从历史来看,中亚—南亚地区是突厥文化、佛教文化、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斯拉夫文化、道教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等,各文化之间既有长期并存的情况,也有此消彼长的格局。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断层线地带”,如果“文明断层线地带”强调排他性的文化个性特征,那么如亨廷顿所说,“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

<sup>15</sup> 参见林太:《印度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四、十章。

<sup>16</sup> 陈新奇:“八世纪前后中亚地区的宗教演变”,《新疆地方志》,1992年第2期。另外还可参加[美]胡曼·佩马尼著:《虎视中亚》,王振西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9页。

<sup>17</sup> 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生的那些冲突”<sup>18</sup>；如果把“文明断层线地带”转化为“文明的交汇地带”，那么就意味着文化是在交流、对话中不断融合的。

第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价值上寻找不同文明形态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要厘清哪些价值是不同文明形态、不同文化类型、不同宗教、不同国家的民族在价值上的最大公约数。当然，我们不能像大海捞针一样来寻找“一带一路”的共同价值，需要在已经提炼出来的某些价值基础上进行升华。“一带一路”所穿越的地区民族、宗教、文化都非常复杂，国家众多，社会制度差异很大，但“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在一些已经开展成熟合作的地区实际上已经提炼出一些被该地区人们所接受的价值，“一带一路”的共同价值将会吸收此类价值。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可能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价值源的合作机制有：联合国、亚信会议、上海合组织、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不能违背联合国的精神，而是要更进一步弘扬联合国关于“安全、发展、人权、正义”的价值精神。也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才被写入联合国的决议之中。其次，亚信会议倡导的“互信、协作、和平、安全、发展”也为“一带一路”贡献了价值源。再次，上合组织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直接就可以转化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当然“一带一路”的实践将进一步使“上海精神”升华。此外，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倡导的“相互尊重、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价值，金砖国家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义利相兼”的价值，等等，都蕴含了人类共同和共通的价值目标，因而为“一带一路”提供了相应的价值源。而这些价值都指向一个共同价值目标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因此，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等提取出来的价值最大公约数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须从三个维度来认识：第一个维度是人类的维度，即人类而不是其他的类，是因为人有别于其他类而拥有共同、共通、共识的价值来支撑自己的一切活动。除此之外的其他物种都不可能有价值，它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本能。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目标而提出的一种发展倡议。换言之，“一带一路”的实践就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人类的合作，并非中国一个国家就能够实现的。第二个维度是人类命运的维度，即当今世界人类所遭遇的各种困境都是共同的，人类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是超越一切的，只关乎人类的。例如，气候变化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流行疾病防疫问题等，都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而不是具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人们常说地球就是一个村落（即“地球同村”），但笔者认为她更小，地球就是一个里（古代

<sup>18</sup>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中国 25 家为一里，也就是“世界同里”）。第三个维度是共同体的维度。这个共同体并非是卢梭意义上的共同体，按照卢梭所言，“一旦人们这样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共同体，那么对共同体任何一个成员的伤害必然意味着对整个共同体的伤害，而对于共同体即使是更为微小的伤害也会使所有成员感受到”<sup>19</sup>。在人类尚未结成单一的共同体，而是拥有各个不同共同体的情况下，卢梭所说的共同体显然是针对外部其他共同体或任何第三方的。事实上，冷战时期的北约、华约都是卢梭所讲的共同体。但是，当人类普遍结成了一个单一的共同体，即全人类都处在一个共同体中的时候，人类就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即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人类共同体任何一个成员的伤害也就意味着对整个共同体的伤害，这就会促使人类共同体全体成员加强协作来共同应对这种伤害，以保护所有成员乃至整个共同体的利益。因此，作为价值公约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展开来就是：和平安全、诚信合作、平等协商、共赢发展、包容互鉴。这些构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价值基础。

### 三、如何提取“一带一路”的最大价值公约数？

寻找到最大的价值公约数是一回事，提取最大的价值公约数则是另外一回事。毕竟不是数字符号，价值公约数的提取涉及的是人的问题、民族的问题、国家的问题，简而言之是文化的问题。因此，提取最大价值公约数必须要从民族、国家和文化现实出发，切不可主观的名义进行“一刀切”或“一厢情愿”地想当然为之。在文化和价值方面，最容易陷入“以我为主”的文化自负感。特别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于是就有人从中国的文化、价值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认为必须是中国的价值才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价值，必须是中国的文化才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文化，等等。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文化输出论”、“中国文化主导论”、“中国价值优先论”、“中国价值引导论”等。这种情形显然既不利于推进“一带一路”，也不符合现实情况。因此，必须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出发来提取沿线国家的最大价值公约数。当然，中国的价值必然要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元素而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构成。例如，儒家倡导的“先义后利、以义为上”，墨家强调以“国家百姓之大利”为义等价值都可以转化为当代中国外交新的价值取向，即一方面秉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利合一”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当前中国的外交实践也对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进行了新的发展。其一，坚持和平发展的世界大义，坚持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利。其二，坚持“和为贵”的理念。“和”即“协调”，就是处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组织目标；“和”又意味着“团结合作”，将个体优势合并成团体优势，提高效率与创造更大价值。其三，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必须尊重人的价值。这些价值主张都无疑会成

<sup>19</sup> [法]让-雅克·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徐强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 页。

为“一带一路”倡议价值的组成部分。不过，“一带一路”的价值绝对不是中国一家的价值构筑起来的，而是沿线国家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第一，和平与安全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当今，人类对和平与安全的渴望超越了任何一种其他的价值需求。“和平”这种价值实际上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价值，没有和平与安全，其他任何的价值追求都是假的，也都难以实现。正如前文所述，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一体化诉求归根到底就是对和平的追求。而和平与安全对于那些曾经遭受过和正在遭受战乱的地区的人们来说尤其显得稀缺而弥足珍贵。中亚—南亚、中东地区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动荡的地区，其中既有大国力量的地缘政治博弈，也有包括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因素。动荡不安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而且直接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特别是源自于中东地区的难民危机已经成为危及周边地区尤其是欧盟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英国退出欧盟表面上是英国当时领导人的个人政治动机，但深层次原因还是欧盟所遭遇的种种危机，其中就包括难民危机所引发的欧盟政治危机。因此，和平与安全这种价值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

第二，诚信合作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的价值需求。沿线国家尤其是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对合作的愿望超出其他任何国家。一方面，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浪潮迅速成为一股洪流，中亚国家正是在这种洪流的影响下而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然而，民族主义的洪流并没有因中亚的独立而平静下来，相反，这股洪流一方面继续揭开民族与民族之间仇恨的外衣而使之演化为民族纷争与民族冲突；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后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合流，形成一种对中亚主流社会产生巨大消解作用的反建制力量。这两种情形都会导致中亚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地区地缘政治的碎片化。在这种情形下，中亚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出现了逆转，从解构联盟走向区域合作。<sup>20</sup>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愿望之下，中亚国家不仅参与了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合作机制，而且对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的共同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持积极的态度。“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践不只是中国与沿线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更是相关国家企业之间具体项目的合作。“一带一路”的内容是互联互通，而互联互通的目的是推动相关国家、相关企业的深度合作、有效合作。无论是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还是企业的项目合作，都必须以诚信为基础。鉴于此，不少学者提出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努力构建“一带一路”的信用评价体系。<sup>21</sup>实际上，诚信在沿线各国的文化传统中都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sup>20</sup> 胡键：“从解构联盟到区域合作：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嬗变”，《世界民族》，2008年第5期，第1-8页。

<sup>21</sup> 谭文君、崔凡、董桂才、孙巧莉：“‘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别信用评价体系的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第79-84页等。

第三，“一带一路”的合作并不是强制性合作，各类项目也不是强制推行的项目。最初，一些学者缺乏正确理解，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认为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这完全是一种误读。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但需要与沿线各国共同来推进。鉴于此，一方面，中国首先是与相关国家协商签署“一带一路”的框架协议，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合作项目中也同样是本着平等的原则进行友好协商，而不是硬性推行。因此，境外一些媒体认为中国在一些国家制造了债务危机，这种说法实际上错误地认为“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是中国单方面推进的。即便在某些国家存在所谓的“债务危机”，也只能说是在合作开始的时候，由于对合作的具体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而没有协商好相应的机制。况且这种债务危机也并非单方面的，而是合作双方都面临的。总之，平等协商的价值贯穿“一带一路”项目合作的始终。

第四，“一带一路”穿越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都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所开创的发展道路和所创造的发展奇迹，对沿线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也试图努力把自己的发展势头向周边和更远的地区延展，让相关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东风。当然，中国内部的发展依然不平衡，在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二元现象，这种地区性的二元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的重要障碍。因此，中国要继续加快内部经济发展和继续全面对外开放，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内部的平衡发展。与当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一样，促进中国内部的平衡发展同样离不开世界。因此，一方面，中国加强内部的互联互通，不断改善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环境，既要引导东南沿海地区的资金投向中西部地区，也要通过改善中西部投资环境吸引外部资金。另一方面，在内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加快中国与外部的互联互通，在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促进国内市场要素与国际市场要素在中国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顺畅流通，以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赢发展。

第五，“一带一路”穿越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尤其是文化的陌生感往往会导致对抗与冲突。“一带一路”的“五通”基础是民心相通，也就是要加强跨文化交流。既然是跨文化交流，就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那么简单，尽管中国文化成功“走出去”的不多，原因可能就在于单纯地想到自己文化如何走出去，而没有考虑外国民众是否接纳中国文化。“一带一路”的实践尤其强调文化上的对话与交流，最终达到相互接纳和相互融合。这样才能够促进民心相通。古丝绸之路最初是因战争而起，却是因文化而兴。而在文化交流中，在古丝绸之路之上不是中华帝国将东方文化强制向西域和更远的地区输出，而是中华帝国主动“拿来”外来文化。例如，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带回诸多有形的物质文化产品，包括西域的葡萄、苜蓿、胡萝卜等，还带回来西域无形的精神文化，如西域音乐等。据《晋书》记载：“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

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輿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sup>22</sup>这段话表明，张骞曾在长安传授他滞留西域时所接触到的“胡曲”。谈到“胡文化”，《后汉书》有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sup>23</sup>也就是说，在汉灵帝的时候，“胡文化”一度成为大汉帝国中上层的“流行文化”。自魏晋时期到唐宋时期，中原王朝对佛教文化也是主动“请进来”的，并一度成为“国教”。当然，中原王朝也会对外来的文化进行创新并且返回去影响其来源国，尤其是佛教，在中国被革新后又返回去影响印度。<sup>24</sup>上述情况表明，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因而才在陌生、对峙、交流中不断融合产生新的文化元素，推进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不断发展。当今，“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更加需要在包容互鉴中来进行跨文化交流。任何国家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单方面地输出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都将注定是失败的。

#### 四、结语

“一带一路”五年来的实践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功，在“五通”方面都有不凡的业绩。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是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但是，五年来“一带一路”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和某些具体项目上的确存在着问题，以至于一些人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产生了分歧、误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一带一路”迄今尚未构筑起自己的价值基础。任何一种合作都需要合作机制本身的凝聚力和合作各方的向心力，而价值的导向作用和引领作用则是塑造合作机制凝聚力和产生向心力的根本性要素。“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经济发展，但同时又着眼于长期的发展和持之以恒的推进，因此，“一带一路”需要构筑自身的价值来凝聚沿线国家。不过，构筑“一带一路”的价值基础，并非要从无中生有，创造全新的价值元素，而是从沿线国家多样化的文化中和沿线既有国际合作机制的价值中提取最大价值公约数。

无论各国的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差异有多大，人类总会存在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共同价值。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小而言之，那些合情合理的事，不同的人想法却是相同的。推而广之，符合人类发展趋势的价值一定是人类所共同接受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宗教、文化、社会制度的差异不过是表面性的差异，而深层次中的价值尽管也有差异，但毕竟作为同

<sup>22</sup> 《晋书·乐志》。

<sup>23</sup> 《后汉书·五行志》。

<sup>24</sup> 季羨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类的人类总会找到作为类的共同价值，甚至可以说，共同价值正是人类作为类存在的内在本质。因此，我们把这种支撑人类作为类而存在的价值称为共同价值。

“一带一路”倡议，从小的方面来看是中国促进本国内部平衡发展和带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倡议；从大的和更长远的方面来看则是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总体性发展战略。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要合乎中国的文化价值，也要尊重国际道义，并在价值公约数基础上不断拓展国际道义。这些国际道义包括：以共赢发展来拓展和平的国际价值；用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来推进共同担当国际和平的责任；努力缩小各国的经济差距，倡导各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经济事务，追求国家间经济平等的权利；坚持开放原则，倡导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经济合作；不仅关注自身利益，也关注全球整体利益，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以及关怀和促进个人福祉，使作为个体的人享有基本的权利，实现人的全面的平等的发展。



## 中国崛起、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

张小明

**【摘要】**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最为典型的非西方大国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崛起，国际秩序指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秩序，而世界秩序包含国际秩序、国内秩序以及跨国秩序，但迄今为止世界秩序的核心在于国际秩序，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是 21 世纪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变迁的动力之一，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动力。

**【关键词】** 中国崛起；国际秩序；世界秩序

**【作者简介】**张小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xmzhang@pku.edu.cn。

### 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World Order

**Abstract:** The rise of China is the most typical example of the rise of non-Western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der is the order among the sovereign states, and the world order includes international order, domestic order, and transnational order, but at the core of the world order is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estern countries have dominated the international and world orders since the Westphalian peace conference, and the US has been the dominant country in the so-called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since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other non-Western powers i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world ord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Key words:** 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order, world order

**Author:** Zhang Xiaomi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重要和深刻的变

革,有关中国与国际秩序或世界秩序的关系也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sup>①</sup>。相关主题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中国到底是现存(全球与地区层次)秩序的维护者还是挑战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本文作者无意也无力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这一主题。但是,本文作者试图通过解读“中国崛起”、“国际秩序”以及“世界秩序”等相关概念的含义,来阐释和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以及将要发生的变化。

## 何谓中国崛起?

虽然中国崛起是21世纪初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 or China's rise)并非21世纪初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实际上它至少在二战期间就已经开始被使用了。<sup>②</sup>然而这个概念被学界广为使用,却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事情,即从美国学者威廉·奥弗霍尔特在1993年出版题为《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强国》这本书开始。<sup>③</sup>随后,中国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概念并出版了相关著述。<sup>④</sup>如果说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还有一些西方人士质疑

<sup>①</sup> 光是相关研究著作的数量就很多,其中包括: Ramgopal Agarwala, *The Rise of China: Threat or Opportunity?*, New Delhi: Bookwell, 2002;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Robert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Ted C. Fishman, *China Inc.: The Relentless Rise of the Next Great Superpower*,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05; Ian Storey, *ASEAN and the Rise of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6;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William W. Keller and Thomas G. Rawski, ed., *China's Rise and the Balance of Influence in Asia*,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V.P. Malik and Jorg Schultz, eds., *The Rise of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Asia and Europe*,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2008; Minqi Li,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Rex Li, *A Rising China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Security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2008; C. Fred Bergsten, et al., *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and Cheng-yi Lin,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2009; Brantly Womack, ed.,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Herbert S. Yee, ed., *China's Rise: Threat or Opportunity?*, London: Routledge, 2011; Arne Odd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London: Bodley Head, 2012; 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Gary J. Schmitt, *The Rise of China: Essays on the Future Competition*, Encounter Books, 2013;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5; [美]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 [俄]米·季塔连科、弗·彼得罗夫斯基著:《俄罗斯、中国与世界秩序》,栗瑞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sup>②</sup> 笔者查到过多本分别出版于1941年、1943年、1959年、1962年、1964年、1970年、1989年英文著作的书名中包含“中国崛起”这个概念: Chiang, May-ling Soong, *China Shall Rise Again*, London: Hurst & Blackett, Ltd., 1941; William F. Burbidge, *Rising China: A Brief History of China and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Generalissimo and Madame Chiang Kai-Shek*, London, 1943; Arthur Doak Barnett, *Communist Economic Strategy: The Rise of Mainland Chin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1959; Victor Purcell,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2; Wayne Ayres Wilcox, *India, Pakistan and the Rise of China*, New York: Walker, 1964; Immanuel 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Irwin Millard Heine, *China's Rise to Commercial Maritime Power*, New York: Green Wood, 1989.

<sup>③</sup> 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3. 该书的中文版于1996年出版: [美]威廉·奥弗霍尔特著:《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强国》,达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虽然奥弗霍尔特并非最早使用“中国崛起”这个词的人,但是可能正是他的这个本书引发了冷战以后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以及“中国崛起”这一概念的流行。

<sup>④</sup> 阎学通、王在邦、李忠诚、侯若石:《中国的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有关中国崛起的论点的话<sup>⑤</sup>，那么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崛起为大国则似乎已经成为西方学者、评论家和政治家的广泛共识了。<sup>⑥</sup> 甚至有西方学者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两国集团”(G2)等吸引人的概念，以此诠释中国实力的极大增强。<sup>⑦</sup> 还有西方学者出版了以《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西方的衰落》等为题目的著作。<sup>⑧</sup> 有人明确指出，21 世纪初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就是中国的持续崛起，中国已经从一个国际社会的边缘角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的显赫角色。<sup>⑨</sup> 特别是自从 2003 年以来，随着中国知识精英和国家领导人公开阐述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更是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时尚，甚至中国人提出的“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这个概念本身，也成为某些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研讨的对象。<sup>⑩</sup> 一位欧洲学者甚至这样写道：“今天欧洲的所有人都在观察中国，大家无论是否了解中国，都对中国的崛起有看法。”<sup>11</sup> 实际上，西方媒体报道亦是如此。正如一位学者在书中所写道的：“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里，被媒体报道最多的事件，不是全球金融危机，不是经年累月的伊拉克战争，甚至也不是‘9.11’恐怖袭击，而是中国的崛起”。<sup>12</sup>

虽然中国崛起在 21 世纪初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崛起只是 21 世纪初的现象。实际上，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最早可以追溯到 1943 年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具有完全主权地位的国家，它在 1945 年还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国共内战以及 1949 年以后新中国长期在国际社会中被孤立和历经多次政治动荡，中国的崛起过程如果不能说是被中断的话，至少也是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阻碍。中国真正被认为开始步入在国际社会中崛起的过程，应该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之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9 年到 2007 年，中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9.8%，比世界经济同期发展水平高 6.8 个百分点，超过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经济起飞时的记录。在 200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

<sup>⑤</sup>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5 (1999), pp. 24-36.

<sup>⑥</sup> Samuel S. Kim,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in Barry Buzan and Rosemary Foot, eds., *Does China Matter? A Reassess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Gerald Segal*,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40.

<sup>⑦</sup>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 *International Finance*, Vol.10, Issue 3, 2007, pp.215-239;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l? Think Agai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 2007; Fred C.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87, Issue 4, July 1st, 2008, pp.57-69.

<sup>⑧</sup> [英] 马丁·雅克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 年版；[英] 尼尔·弗格森著：《西方的衰落》，米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

<sup>⑨</sup> 赵可金：“中国地位与世界角色—探索新外交哲学”，《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50 页。

<sup>⑩</sup> Bonnie S. Glaser and Evan S. Medeiros, "The Changing Ecology of Foreign Policy Making in China: Then Ascension and Demise of the Theory of 'Peaceful Rise'", *China Quarterly*, Vol. 190 (June 2007), pp. 291-310.

<sup>11</sup> Ingrid d'Hooghe, "The Limits of China's Soft Power in Europe: Beijing's Public Diplomacy Puzzle", The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Diplomacy Papers No.25, 2010, p.1

<sup>12</sup> [澳] 潘成鑫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张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前言》第 1 页。

到 9.59533 万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约合 1.15 万亿美元），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位。<sup>13</sup>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2005 年超过英国，在 2007 年超过德国。到了 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上升到 5.8786 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sup>14</sup> 中国的快速崛起无疑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但也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实际上，中国在科学技术、国防现代化以及国际角色等诸多方面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然而，今天的中国依然处于崛起的过程之中，或者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之中的大国，它面临着很多和很大的内外挑战。<sup>15</sup> 虽然有某些中国学者预测，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sup>16</sup>，或者中国将是国际舞台上仅次于美国的“名副其实的配角”<sup>17</sup>，但是更多的中国学者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采取谨慎评估的态度，并否认中国将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sup>18</sup>

中国崛起之所以在 21 世纪初成为如此引入瞩目的现象，除了中国实力快速增长之外，更在于中国的特殊性，即中国是 21 世纪初在现代国际社会群体性崛起的非西方大国中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代表，因为它属于一个“非西方性”最为明显的新兴大国。

众所周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现代国际社会发源于欧洲，后来逐渐扩展到全世界，成为全球性的国际社会，西方国家一直是现代国际社会的主导者，是国际规范的主要制定者、修订者、传播者以及裁决者，而非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国际社会的后来者，一直是国际规范接受者或者抵制者。然而，国际社会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也为非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这是因为，随着非西方国家加入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广大的原先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地位并加入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中的非西方国家逐渐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席位，这在联合国成员国组成中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尽管非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渐成为了国际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还是相对比较弱小的，20 世纪 50-60 年代兴起的第三世界主要是被视为“反抗西方”的重要势力，西方国家依然维持着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所谓“金砖国家”的实力的快速增长，非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群体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对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这些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不满足于只当国际规范的接受者，

<sup>13</sup>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2/Nov/233921.htm>，上网时间：2018 年 11 月 1 日。

<sup>14</sup> “GDP 数据显示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1-02-14/085921950289.s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11 月 1 日。

<sup>15</sup> 张蕴岭：《寻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前言》第 2-3 页；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up>16</sup> 阎学通著：《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 页。

<sup>17</sup>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7-18 页。

<sup>18</sup> 王缉思编：《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3 页。

也希望参与新的国际规范的制定。正因为如此，在21世纪初有学者提出西方霸权是否行将终结的问题。<sup>19</sup> 本文作者认为，现在谈西方霸权的终结还为时过早，所谓非西方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或者不结盟运动一样，远没有（也不太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影响巨大的单一行为体。但是，非西方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群体性崛起的确是21世纪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崛起的非西方大国中，中国可能是一个最为特殊和典型的个案。众所周知，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一直在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之间摇摆不定，而印度、巴西、南非都曾经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其在语言、价值观等文化属性方面深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中，只有中国的“非西方性”最为纯粹，它在21世纪希望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意愿大概也是最强烈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中国来说，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有利时期。中国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内忧外患，富裕、强大和获取国际尊重似乎即将到来。中国人在精神上重新获得自信，很多人认为国运正在往上走，该是中国宣称自己‘天命所归’的时候了。”<sup>20</sup> 也正是因为中国此种特殊性，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中快速崛起的中国相对来说更为容易被视为一个另类国家或者“挑战者”、“修正主义国家”，并被加以防范和制约。对于中国来说，如何以行动和言语让西方国家相信自己不是一个现存秩序的“挑战者”、“修正主义国家”，则始终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任务，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中国智慧”？）。

## 国际秩序是否为世界秩序的核心？

“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两个概念往往被加以混用。虽然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它们被混用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二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因此，解读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实属必要。

秩序是人们常用的词汇，但界定它并不容易，有关秩序的理解总是存在着争议。<sup>21</sup> 何谓秩序？秩序（order）与无秩序（disorder）相对立，指一系列事物或现象出于某种目的和按照某种规则的有序排列。赫德利·布尔说道：“说一些放在一起的东西显得有秩序，其最简单和通常的含义是，这些东西按照某种格局（pattern）而相互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意性的，而是基于某个明确

<sup>19</sup> [英] 马丁·雅克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第38页；庞中英：“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53页；[英] 巴里·布赞：“全球性变革与国际秩序的演进”，《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17-18页。

<sup>20</sup> 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6版），计秋枫、朱庆葆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596页。

<sup>21</sup> [美] 小约瑟夫·奈、[加] 戴维·韦尔奇著：《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十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0页。

的原则。因此，书架上的一排书是有秩序的，而地板上的一堆书则是无秩序的。”<sup>22</sup> 也就是说，秩序的建立有赖于共同追求的目标或共同利益，因为秩序是一种旨在追求社会生活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与此同时，秩序的维持也有赖于规则的存在，包括法律规则与非法律规则，以及使得这些规则得以发挥效力的制度。在布尔看来，均势、国际法、外交、大国作用以及战争等等都是国际社会的有效制度，使得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得以存在和维持，但国际组织只是“假制度”，虽然国际组织在维持秩序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并不是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sup>23</sup> 共同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无疑有助于秩序的维持，但是今天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

国际秩序，即“国家间的秩序”<sup>24</sup>，或者“国际社会内部的秩序”<sup>25</sup>一般指近代以来至今的主权国家之间的秩序，正如有的学者所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后的国际秩序，或者“威斯特伐利亚秩序”<sup>26</sup>。当然，国际秩序也可以指所有类型的国家之间的秩序，即除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之外，还包括前现代国家之间的秩序。国际秩序无疑属于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国家中心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布尔就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sup>27</sup> 约翰·艾肯伯里把 1945 年以后主要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称之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sup>28</sup> 问题在于，如何界定“自由主义的”？阿米塔·阿查亚质疑该秩序的自由主义性质，因为自由主义秩序只存在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不属于这个范畴。<sup>29</sup> 另外，今天此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遭受的挑战是否主要来自美国政治变化和相对实力变化本身？有学者在讨论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危机并走向终结的时候就提到了美国因素。2016 年 11 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持这种看法的人明显增多。比如，阿米塔·阿查亚就认为，唐纳德·特朗普虽然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但特朗普胜选在多个方面挑战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复合世界”正在来临。<sup>30</sup> 但是，他同时又认为，中国一直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这一秩序的崩溃会让其损失巨大，因此中国将不

<sup>22</sup> [英]赫德利·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四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5 年版，第 7 页。

<sup>23</sup> 同上书，第 2-4 页。

<sup>24</sup> 同上书，第 21 页。

<sup>25</sup> 同上书，第 22 页。

<sup>26</sup> 王赓武：“当今世界秩序是好的秩序吗？”，《外交评论》，2015 年第 6 期，第 11-14 页。

<sup>27</sup> [英]赫德利·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四版），张小明译，第 11 页。

<sup>28</sup> John Ikenbu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John Ikenbury, *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John Ikenbu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sup>29</sup>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加]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6 期，第 14-25 页。

<sup>30</sup> [加]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6 期，第 14-25 页。

会允许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突然崩溃。<sup>31</sup> 另一方面,很多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把中国的崛起视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挑战或威胁,因为中国被视为一个非自由民主国家。比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冷战后不久就预言,“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sup>32</sup> 他进一步指出,“……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意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意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sup>33</sup> 与此同时,他也指出:“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sup>34</sup>

与国际秩序不同的是,世界秩序则是指“整个人类大社会的秩序”<sup>35</sup>,它的内涵无疑比国家间的秩序或者国际秩序更为广泛,实际上既包含国家之间的秩序或国际社会内部的秩序,也包括国家内部的国内秩序,还包含众多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构建的秩序或跨国秩序等等。因此,世界秩序研究属于世界政治研究范畴,国家中心主义色彩相对较弱。

也就是说,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参与秩序构建的行为体类型和数量的不同。参与国际秩序构建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数量相对较少,而参与世界秩序构建的主要行为体,除了国家之外,还有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数量相对较多。此外,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即构建国际秩序的行为体—国家只是历史的产物,不是永存的,而作为世界秩序终极单位的个人却是永存的、不会消失的(除非地球毁灭)。正因为如此,布尔就认为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更重要:“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更重要、更根本,这是由于人类大社会的终极单位(ultimate units)不是国家,也不是民族、部族、帝国、阶级或政党,而是个人。个人是永存的、不会消失的,而人类的这种或那种集合形式则并非如此。现在是国际关系的时代,然而今后不管全球政治或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世界秩序问题一直都会存在着。”<sup>36</sup> 在本文作者看来,到底是世界秩序更重要,还是国际秩序更重要,这更多属于价值判断问题。

然而,“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两个概念却常常被混用,因为两种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亨利·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一书中,就反复混用这两个概念,并且始终没有对这两个概念加以界定。<sup>37</sup> 其实,我认为,这两个概念被混用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因为自近代以来,主权国家一直都是世界政治中的最主要的行为体,其地位高于个人,世界秩序是否存在的最关键因素,正是

<sup>31</sup> 同上注。

<sup>32</sup>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页。

<sup>33</sup> 同上书,第204-205页。

<sup>34</sup> 同上书,第297页。

<sup>35</sup> 同上书,第21页。

<sup>36</sup> 同上书,第22页。

<sup>37</sup> [美]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

在于国家之间的秩序是否存在。也就是说，至少是从近代以来，正是因为存在着国际秩序，所以世界秩序才得以维持。或者说，国际秩序是世界秩序的一块坚实的基石或者核心。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重点论述的实际上是均势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及其演变，认为维持均势是国际秩序得以稳定的最可靠方法，因此其世界秩序研究实际上更接近国际秩序研究。他认为，在当今世界，霸权变得非常难以接受，包含着政治不正确，这就使得均势可能成为建立或维持秩序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路径。<sup>38</sup> 在基辛格看来，革命是危害国际秩序的主要危险，是对现存秩序合法性的挑战，即当“一个体系中一个或一些主要权力体不接受（国际秩序的）基本安排或其他国家国内制度”<sup>39</sup>时，这个体系就处于被革命状态。赫德利·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一书中，则使用“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一词，认为世界政治中之所以存在着秩序，就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国际社会，即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它基于一系列的规则、规范与制度。也就是说，布尔首要关注的对象，实际上也是国际秩序问题。在布尔学生、牛津大学蒙塔古·伯顿讲席教授安德鲁·赫里尔看来，布尔坚持认为，一个弱的（thin）、多元的国际社会是维护世界秩序之最佳方式。<sup>40</sup> 但是冷战结束后，有英国学派学者提出，世界政治可能正在发生着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的转变，因为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在增强。<sup>41</sup> 尽管如此，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被非国家行为体所取代或者共享的状态，国际秩序依然是我们首要关注的对象。

总之，虽然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它们经常被加以混用，这是因为自近代以来至今，国际秩序的存在是世界秩序得以维持的基础，或者说西方主导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秩序始终是世界秩序的核心。

##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世界秩序的变迁

如前所述，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最为典型的非西方大国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崛起，国际秩序指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秩序，而世界秩序包含国际秩序、国内秩序以及跨国秩序，但迄今为止世界秩序的核心在于国际秩序，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

21 世纪初，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迁，表现在权力结构变化、规范变迁等多个方面，尽管主权国家之间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并没有被超越。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

<sup>38</sup> Henry Kissinger, "We live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Daedalus*, Vol. 124, No. 3, The Quest for World Order (Summer, 1995), p. 102.

<sup>39</sup> Henry Kissinger, "Reflections on American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35, No. 1 (Oct., 1956), p. 43.

<sup>40</sup> [英]安德鲁·赫里尔：“第四版序言”，[英]赫德利·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四版），张小明译，第 II 页。

<sup>41</sup>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崛起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动力，并且受到格外关注。原因在于这些非西方国家有自己的秩序观，其中中国传统秩序观的非西方性最为典型，也最为被关注。

古代中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世界秩序观（天下观）以及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主要是其他东亚国家）关系的规范和制度（朝贡体系或朝贡制度），它被有的学者视为真正的世界秩序观，有别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秩序观。<sup>42</sup> 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对外关系理念极大地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行为，并且在近代以后面临着以主权平等为核心原则的西方国际关系理念的巨大冲击，中国从此开始逐渐改变自己的世界秩序观念，接受了源于西方的国际秩序观念。<sup>43</sup>

问题在于，近代以后，中国是否已经完全放弃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念？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解读是很不一样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sup>44</sup> 也有学者指出，“古代中国向来将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地区的关系视为国内地区间关系的延伸，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 and 方式处理与其它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了数千年贯穿、维系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规范、法则和模式，其思想、经验和历史遗存（包括正反两方面）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战略和东亚区域的格局与秩序。”<sup>45</sup> 还有学者明确指出，“仅仅从晚清和 20 世纪初中国身份构建的历史实践已经可以看出后世民族主义革命的端倪：民族主义是中国政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一种动员力量，并不是中国世界观的核心或终极关怀。存于中国之心的，仍然是对天下的关怀。在 20 世纪以来的历史迷雾中，民族主义只是那条龙的爪子。中国并没有真正实现从‘天下’到‘（基于民族主义的）世界’的观念转变。”<sup>46</sup>

在赵汀阳看来，我们可以使古代中国的天下观现代化，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sup>47</sup> 他还提出了“新天下体系”的设想，即“天下体系就是意在化天道为人道之大业。周公设计的分封制度，即天下一体分治体系，是政治史上一项开创性的制度实验。尽管尚未充分表达天下理念，却是天下体系的唯

<sup>42</sup> [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赵汀阳：《天下的当地性：世界秩序的实践和想象》，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版；李扬帆：《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年版；[韩]金容九著：《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之法》，权赫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王赓武：“当今世界秩序是好的秩序吗？”，《外交评论》，2015 年第 6 期。

<sup>43</sup> 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2 页。

<sup>44</sup> [美]约瑟夫·R. 列文森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7 页。

<sup>45</sup> 杨倩如：“双重视野下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研究—在中外关系史与国际政治学之间”，《当代亚太》，2013 年第 2 期，第 48 页。

<sup>46</sup> 李扬帆：《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第 797 页。

<sup>47</sup>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 3 页。

一实验，其制度设计之得失，对于未来可能的新天下体系是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sup>48</sup> 张启雄认为，在当今，对中西国际秩序及原理的探寻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中国实力的增强将带来更大的影响力与更艰巨的责任，而整合国际秩序的问题也将接踵而至。因此，他提出，今天应该寻找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原理，即“中华世界秩序原理”或“天下秩序原理”，融合西方历史文化价值所形成的国际法秩序原理，弥补国际法之不足，从而形成更适合于规范“东西国际体系”之国际秩序的“全球国际秩序原理”。<sup>49</sup>

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不少。<sup>50</sup> 比如许纪霖认为，传统的天下主义可以在现代性的脉络中予以扬弃和更新，发展成为新天下主义，或者天下主义 2.0 版。用他的话说就是：“新天下主义的所谓‘新’，乃是加入了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在新天下秩序之中，没有中心，只有相互尊重独立和平等的民族与国家，也不再具有支配与奴役、保护与臣服的等级性权力安排，而是去权力、去宰制的平等相处的和平秩序。更重要的乃是新天下秩序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没有华夏与蛮夷之分，不再有主体与客体之分，诚如古人所云‘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sup>51</sup> 值得指出的是，许纪霖的新天下主义和赵汀阳的新天下主义有不同之处，前者加入主权国家平等原则，而后者则视等级制为社会运作之所需。用赵汀阳的话来说就是，“周朝的天下分封制度建构了一个网住世界大地之‘地网’，一个有等级结构的网络体系。即使以今日眼光视之，天下体系的网络性仍然具有当代性甚至未来性，但其等级结构却不符合今日世界之价值观，很容易被视为一个支配结构。然而，取消等级的社会至今仍然是个缺乏实践条件的理想。不仅古代社会都是等级制的，今天的世界在实质上也是等级制的。这说明，尽管等级制有悖平等之价值，却仍然是社会运作之所需。价值观有价值观的道理，现实有现实的道理。”<sup>52</sup>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天下秩序不具有普世性意义，它与当今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矛盾和冲突，因此不可能重新恢复儒家天下秩序。<sup>53</sup> 甚至学者对天下观倡导者源于当今中国崛起的现实及其政策需要之目的提出质疑。<sup>54</sup>

本文作者以为，近代以来，中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西方的国际秩序观，但是其传统的世界秩序观没有也不可能从中国的对外关系理念中完全消失，依然还在影响中国的对外行为。这

<sup>48</sup>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69 页。

<sup>49</sup> 常宇鑫：“迎接挑战，回归中华秩序原理——访近代史研究学者张启雄”，《北京大学校报》，2014 年 11 月 17 日，第 4 版。

<sup>50</sup> 于春松：《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sup>51</sup> 许纪霖：《家国天下一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41 页。

<sup>52</sup>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69-70 页。

<sup>53</sup> 王庆新：“儒家王道思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外交评论》，2016 年第 3 期，第 73-99 页。

<sup>54</sup> [美]柯岚安 (William A. Callahan)：“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0 期，第 49-56 页。

种影响可能是近代以后中国与现代社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当然此种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程度大小以及表现形式的不同。在21世纪，西方国家普遍把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现存秩序的挑战，其中部分原因可能就在于此。然而，天下观本质上属于前现代的世界秩序观，而非现代的国际秩序观，除非现代主权国家消亡，否则不太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中国自身也已经接受和捍卫源于欧洲的主权规范。实际上，另外也有东亚邻国学者表达了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在今天已经行不通的观点：“近代之后的世界是国家之间的‘国际社会’，而传统的中华秩序的内在原理是否认‘国际社会’本身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考虑如何克服这种缺点反而强调重新利用中华秩序，这在全球，哪怕是在东亚邻国也是行不通的。”<sup>55</sup>

当然，除了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之外，今天以及未来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变迁的动力还有很多，比如科学技术（如核时代的到来以及信息革命）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恐怖主义者和跨国难民）的作用上升以及主要西方大国内外政策的调整等等中，2016年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是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其对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的冲击都是很大的。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系列不走寻常路的内外政策更让世界进入一个极为不稳定、不确定的时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自身，而不是中国，正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

<sup>55</sup> 王元周主编：《中华秩序的理想、事实与想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页。

## 全球伦理与国际话语权

孙英春

**【摘要】**全球伦理来自于不同社会的伦理意识、社会规范以及相关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积淀与整合，关联到全球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精神在国际事务中的具体运用，国际行为体之间开展平等、开放的交往互动和共同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是“人类共同体”存在、进化的理性基础。全球伦理构成了国际话语体系的正当性根基，也划定了话语权竞争的边界，能够为行为体提升各自话语实践的影响力提供更多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并避免行为体之间因持续冲突而发生“共同体疲劳”。全球伦理在内涵上主要涉及三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责任伦理、正义伦理和对话伦理，国际行为体对话语权的诉求最终将落实为培育和践行这些伦理内容的过程。

**【关键词】**全球伦理；“人类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共同体疲劳”

**【作者简介】**孙英春，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导，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中国传媒大学，100024，电话：15601201056，电子信箱：sunychun@sina.com。

### Global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bstract:** Global ethics is based on the accumul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al awareness, social norms, and related traditions which are shared by different societies, interrelated through the universally-accepted values and morals of global society which appl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qual and open interaction of international actors, along with the common eng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ethics, are the rational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so-called “human community”. Global ethics also provides the basis for legitimacy and boundaries for discourse competi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actors, offers feasibility and probability to their respective discourse practices, and allows the dodging of the “fatigue of community” caused by sustained conflicts. The content of global ethics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ree indispensable characteristics: the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the ethic of justice, and the ethic of dialogue. Finally, the appeals of the power of discourse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ultiv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ose ethical orientations.

**Keywords:** global ethics; *hum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fatigue of community

**Author:** Sun Yingchun is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与全球伦理相关的理解和选择，关系国际社会各个行为体的视野和姿态，也在极大程度上预制了“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全球伦理构成了国际话语体系的正当性根基和话语权竞争的边界。通过对话、协商、合作，寻求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伦理共识，争取与自身规模、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是不同行为体走向世界过程中的重要课题，攸关各自的形象、权益和命运。把全球伦理和国际话语权议题结合起来思考，有益于探索国际行为体之间以及行为体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可行性选择，亦有益于探索超越国际权势政治、安全两难和地缘政治等困境的现实路径。

### 一

中外知识界曾提出有关全球伦理的多种表述和内涵解读。本文视域中的全球伦理，来自于不同社会的伦理意识、社会规范以及相关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积淀、整合与统一，关联到不同国际行为体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精神在国际事务中的具体运用，不仅涉及全球化情境中人类针对生存价值和生存方式的不断更新的思考及其对自我和他者的重塑，还包括道德与正义、利益与权力、战争与和平等攸关人类整体意义的生存、共处和发展的“正当性”为主题的伦理表述、论证和规范。

伦理是影响人类活动的最为无形同时也是最强大的社会规范之一，决定了行为体参与社会活动的共同目标和取舍标准，也限定了形形色色社会关系的构成。单一社会中，伦理能够创造成员之间的信任、影响内部的团结氛围，从而影响合作的稳定性；在不同社会之间，伦理提供了某些特定的“相似之处”，为人类的交往互动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来自不同文化、国家和社会的本土伦理以及共同生活的丰富实践和经验积累，即是建构全球伦理的基础，而全球伦理问题或诉求的凸现，是不同文化、国家和社会共同走向开放、融合的历史过程决定的。希腊化罗马时期斯多亚派提出的“世界主义”、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的“道德乌托邦”、欧洲启蒙运动追求的普遍理性主义伦理等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化发展发挥过作用，也是今天讨论全球伦理的观念基础。近代以来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则是催动全球伦理建构的现实场景——技术、资本、人力要素等的全球性流动、重组，决定了不同社会共同生活空间的扩大和生活实践的一致化，以及各个行为体对信息开放和收益预期的更多诉求，在这个意义上，跨越行为体边界的伦理诉求，不唯是不同文化、国家和社会得以共处的“道德选择”，更成为各种国际行为体的不可忽视、不可取消的共同规范和行为标准，以及作为复杂巨系统的“人类共同体”的秩序和均衡得以维系的根基。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使用的“人类共同体”，并不同于“世界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普世主义道德主张的概念，而是类似于巴里·布赞所说的一种全球体系层次的“人类道德共同体”。它并非是“一个完美清晰的社会实体”，但具备特定的能够恒久发挥作用的共同“伦理观念”，以及通过

共同伦理所划定的范围、结构、成员和“凝聚力”，使行为体的国际社会化行为具有持续性和可预期性，重要的是，“即使局势发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这个“共同体”也不会轻易发生改变。<sup>①</sup>尤其是“人类共同体”融入了权力组织、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多种元素，能够把一种“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关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想象”置于共存和合作必需的规范和伦理的理性结构之上，通过影响行为体的国际社会化进程以及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改善人类境况、推动不同社会向共同的目标迈进。

换言之，“人类共同体”并不是“社会事实”，而更像是能够指导、调控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国际规范的统一体，全球伦理则是这些国际规范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构成。行为体之间开展平等、开放的交往互动和共同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是“人类共同体”得以存在、进化的理性基础。进一步说，“人类共同体”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与观念结构是建立在行为体之间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相互关系基础之上的，就像是一种超越了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开放型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不是最主要的行为体，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主权国家之外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个人<sup>②</sup>）能够通过积极、广泛的交往开展信息共享、行动协商和集体决策，不仅能够收获共同的利益和认知，也会逐步取得某些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性的“共同属性”。

在知识界和实践领域的思考中，构建全球伦理的清晰、一贯的目的，就是寻求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利益的最大化，<sup>③</sup>既要容纳共有的价值观、规范、信仰和态度，又不排斥寻求个体的价值和权益与“人类共同体”的道德理想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不仅如此，全球伦理还需规范各个行为体在特定情景下的权利和义务，支配、评价不同行为体的行为和话语。毋庸置疑的是，没有全球伦理的支撑，国际社会必然会堕入“丛林法则”之中而渐次走向解体，遑论发展、维护有利于人类未来的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以来，各界不断提出建构全球伦理的议题，正是呼吁在国际社会中建立一种更具弹性、更宽容的伦理探讨的程序和机制。正如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我们创造性的多样性》（Our Creative Diversity）报告强调的，人类寻找和制定一套被人们普遍认同的“一套新的全球伦理”伦理规范势在必行，“通过在一套全球伦理的框架下进行对话，达成一系列新的社会政治共识，促进文化繁荣，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极为重

<sup>①</sup> [英]巴里·布赞等：“‘国际共同体’意味着什么？”，《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第1-5页。

<sup>②</sup> 全球伦理的行为主体可以是国家、组织，也可以是独立的具有现代社会属性的个人，故此，全球伦理既是针对国家和组织行为的伦理规范，也是全球社会之中个体需要面对的道德要求。

<sup>③</sup> 一个重要的理解是：国际关系中的利益通常不是纯粹的，并不仅仅是实体利益（physical interests），还包括其他层次上的能够塑造或参与塑造国家行为的东西，包括“激情、理想、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传统政治文化、体制惯性等等”。参阅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52页。

要”。<sup>④</sup>全球宗教界领袖与孔汉思（Hans Kung）等在1993年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

（Declaration towards A Global Ethics）也指出，“若无一种伦理方面的基本共识，任何社会迟早都会受到混乱或专制的威胁。若无一种全球性的伦理，就不可能有更美好的全球性秩序。”<sup>⑤</sup>

进入 21 世纪以来，建构全球伦理的迫切压力来自于世界性交往的普遍化趋势与交往实践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以及核武和核能危险、气候变化、资源匮乏、贫富差距、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现有的各种伦理观念——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无法单独应对现实伦理难题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故此，全球伦理应被赋予更高、更新的内容，不仅要体现出人类对理想目标的崇高追求，更需要提供一种寻求新的秩序和应对新的危机的共同认知：不允许任何行为体无视他者的存在去制造对抗、冲突或不正当竞争——因为任一行为体无视全体需要，都会危及这个整体，“让每一个人都听，同时也要听每一个人在说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充满危险的，但有潜在自愈力的世界的希望”。<sup>⑥</sup>可以说，全球伦理的意义已超越了孔汉思所说的“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规则和基本态度”，而是关系到不同行为体都必须自觉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即：超越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单一文化价值的禁锢，通过共有伦理来约束和调节自身参与国际交往的模式，调和相互抵牾甚至对立的诉求。

概言之，全球伦理之中既有普遍性伦理的形而上知识，也蕴含面向复杂的“人类共同体”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甚至可以说，其本质就是不同行为体应对与他者共存“困境”的集体性智慧，关系到人类共同生活的“道德秩序”，特别是国际行为体能否与“共同体”既有的观念与规范相互融合，在种种利益、权力与秩序的权衡过程中维持某种动态平衡。尤其是在利益和关系结构并不稳定的情况下，全球伦理能够发挥类似“防波堤”的作用，避免行为体因短期利益和机会主义行为发生冲突。正如肯·布斯（Ken Booth）所期待的：“倘若这个世界能够为大多数人提供合理的生活，我们就需要一种新的理性、新的公理、新的机构和新的政治形式，在伦理方面也应有更高的期望。”<sup>⑦</sup>

## 二

国际话语权是国际行为体通过交往所呈现的自身观点、立场、思想乃至情感、态度等话语行为

<sup>④</sup>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张玉国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 页。

<sup>⑤</sup> [德]孔汉思等：《全球伦理》，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171 页。宣言指出，在家庭、社会、种族、国家和各种宗教等一切生活领域，都存在不可少的、无条件的标准，这就是全球伦理，即“关于一些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标准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

<sup>⑥</sup> [美]玛格丽特·米德著：《代沟》，曾胡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8—152 页。

<sup>⑦</sup> Ken Booth, "Human Wrong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1, No.1, 1995, p.112.

所具备的影响力，与自身利益以及承担的责任、义务相关，也关联到自身在“共同体”内部与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受语境、传播方式等因素的制约。不同领域研究者的视野里，国际话语权既是行为体软实力的重要组成，亦与硬实力的分配状况高度一致，并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伦理等因素的制约。

行为体国际话语权的诉求，决定于行为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彼此互动所构建的“人类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全球伦理充当了行为体之间的“防波堤”，也向不同行为体注入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对国际体系性质的判断。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本身，取决于他者对自身话语的判断和态度，对于任一行为体的任何话语而言，其他行为体都可以选择全盘接收，也可以全然忽视、排斥甚至抵制。故此可以说，行为体寻求自身国际话语的效力与价值，离不开全球伦理限定的框架，必得充分考虑自身话语的伦理正当性、感召力和包容性，以及其他行为体的接受方式和限度。

承前所述，具有理性基础和共享特征的全球伦理，能够帮助行为体彼此把握利益诉求与道义立场之间的平衡，并因此具备了获取话语权的“天然优势”——就其本质看，话语权不是非理性的，涉及到各方共同接受的信念、共识，互动的各方之间必得有一种普遍性的伦理标准存在，能够获得基本的相互信任和稳定的相互预期。这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sup>⑧</sup>在“人类共同体”的框架下，福柯提及的“成规”，可以指涉种种国际规范以及不可或缺的伦理成分，能够帮助行为体定义、判断、控制彼此的行为，并直接影响各自话语意义的生产、话语文本的解读阐释，以及话语的内在、外在和主体控制等各个方面。

全球伦理构成了国际话语体系的正当性根基，也划定了话语权竞争的边界。抛开全球伦理去寻求国际话语权，不仅会导致话语行为失效，还可能招致冲突和分裂的后果。必须看到，国际话语空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任一行为体的话语行为以及话语权的变动皆处于不断调适、再平衡的过程中，以适应着“共同体”内部彼此渗透、控制、抵抗的复杂局面。行为体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位置，除了需要给自身行为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说明之外，必定还取决于能否为他者和“共同体”的利益和秩序提供预期更为可靠的愿景。参与互动的各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恪守全球伦理的基本要求，既决定了“共同体”中行为体与他者之间的彼此认可和依存程度，也决定了行为体对彼此话语的敏感程度，以及话语权的强弱。

对形形色色的国际行为体而言，探寻话语权的努力必须指向伦理层面，才可能为话语实践的影响力提供更多的可行性和“可能性”。这意味着，要努力走上“人类共同体”的“伦理高地”（ethical

<sup>⑧</sup> 王治河：《福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159页。



high ground), 将自身纳入全球伦理框架之中, 不仅能够对重大国际事项提出清晰的、具有解决问题意义的伦理主张, 还能够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使其他行为体接受自己话语行为, 影响而非控制议事日程, 并最终影响国际事务博弈的结果。如前所述, “人类共同体”之所以可能, 不仅是因为行为体之间的竞争, 更是因为“道德心的不可或缺”, 如果只遵从本土伦理而忽视全球伦理, 仅仅考虑自身利益而忽视“共同体”利益, 必定会被逐步“边缘化”并丧失话语影响力。

结合知识界在相关议题的思考, 谋求国际话语权的努力, 离不开全球伦理的导引; 全球伦理的建构, 倘若超越呼吁或愿景的层次, 也需要与国际话语权考量结合起来。为实现自身伦理建构和谋求话语权的目標, 必得秉持客观、审慎的态度, 遵循开放、多元、民族性与普适性结合的原则, 减少划界自守、相互隔绝的状态, 降低互动情境中形形色色的偏见和不确定性。不能忽视的是, 一些西方国际行为体由于具备了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先机, 伦理建设也经历了各自现代化进程中的“修补”、“编织”, 不仅能够与自身话语配合而发挥相当程度的话语影响力, 甚至可以将自我经验“强行”上升为“共同体”经验, 使隐藏自身利益的观念和规范普遍化、全球化, 获得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话语强权”。相比之下, 非西方国家以及处于“共同体”边缘地位的行为体有诸多不足、不利之处, 面临着攸关自身权益的紧迫性和“改进”压力。面向“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和未来图景, 西方行为体自当摆脱“独白”传统的历史惯性,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等宰制性观念的限制, 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权力逻辑和冷战思维; 对于非西方行为体而言, 则需客观辨析西方话语的历史特质及当代变动, 使全球伦理成为自身参与国际社会化的根基, 以及从国际话语格局的“边缘”进入“中心”的理性前提。

从“人类共同体”的角度看, 恪守全球伦理亦有益于避免行为体自身的“内卷化”(involution), 疗治行为体自身存在的种种“沉疴痼疾”, 避免行为体之间因自身问题以及彼此间的认知和利益差异而发生类似于“金属疲劳”的“共同体疲劳”(fatigue of community)——正像金属会因“交变应力”超过限度而造成材料变化、结构破裂一样, 如果国际行为体之间持续冲突的压力一再超过极限, 导致彼此的行为期待不断变动, 就可能迅速失去交往的动力、耐心并破坏“共同体”的整合能力, 不可避免地造成“共同体”的解体。在人类交往的历史上,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 三

全球伦理乃至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和践行, 不能回避观念、权力和利益之争, 而不同国家、社会的共存事实是自我而非利他, 多数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并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没有轻易获得的和谐与妥协，忽略、轻视和违背全球伦理乃至背离“共同体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正如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说，“这个世界是资源缺乏的，并且因为这些资源的分配而起冲突，人类终归将他者看作‘非普遍’的群体成员”。<sup>⑨</sup>

尤其是对国家行为体而言，霍布斯语境下的国际关系现实赋予其超道德的地位，自身权力和利益往往是优于伦理选择的，全球伦理的自治性对其行为的约束和影响相当有限，由此也导致了现实的国际关系是“非伦理”甚至是“反伦理”的，行为体之间不是平等、自主的，而是相互依赖并随情境变化的不平等关系，种种民粹主义和“中心主义”的风起浪涌，更使有关全球伦理的价值与可能性的讨论面临重重挑战。正如萨义德所说：“我们不应该假装认为和谐的世界模式已经具备。谁要是仍然以为和平与社会共处的思想很有市场，那也同样是不诚实的。”<sup>⑩</sup>

不过，放弃对理想性和普遍性的伦理原则的探寻，仅仅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的立场去应对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或凭借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优势地位，抱持种种“中心主义”，在对外交往中“自以为是”甚至是“唯我独尊”，皆会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构建良序秩序的掣肘，也将对“人类共同体”既有的系统框架产生巨大挑战。进一步地，不仅伦理失范愈加明显，公平、效率渐行渐远，欺诈、冲突、恐怖与战争等非理性活动也必定不断升温，甚至导致一个危险重重的“全球黑暗时代”的降临。时殷弘对此的观点是：伦理规定了合理的、正当的政治目的，同时也决定有效的、能够实现的政治目的，“如果政治目的与道德截然冲突，那么不管你的政治目的有多高明，到头来都要失败”。<sup>11</sup>他还提出了一种“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的概念，涵义有四：第一，讲求实际、坚持伦理的合适指导作用，按具体情况对政治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做判断；第二，目的必须符合道德，如果有可能采取在道德上不那么可疑的手段，就不得采取在道德上比较可疑的手段，即“两害相权取其轻”；第三，采取的手段造成的综合伤害（或“恶”）不应大于由此造成的综合裨益（或“善”）；第四，不滥用暴力。<sup>12</sup>

结合相关领域的思考，全球伦理在内涵上主要涉及三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责任伦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正义伦理（ethic of justice）和对话伦理（ethic of dialogue）。责任伦理是全球伦理的意识基础，强调所有国际行为体应具备“共同体意识”，在追求自身权益时要承担对他者以及人类后

<sup>⑨</sup> Robert Gilpin,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 Robert Keohane eds.,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04.

<sup>⑩</sup> 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第2页。

<sup>11</sup> 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52-153页。

<sup>12</sup> 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52-153页。

世的责任；正义伦理是全球伦理的价值目标，强调全球社会在规则制定、利益分配、秩序建构等方面的正当性、适宜性，主张通过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和秩序推动正义目标的实现；对话伦理是全球伦理的实现方式，倡导通过对话积累有关全球伦理的共识和实践经验，帮助行为体以平等、包容方式面对彼此的观念差异和利益冲突。承前所述，对全球社会的每一行为体而言，都需要在强化“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培育责任伦理，在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正义伦理，在推动全球互动的过程中增进对话伦理，而国际行为体对话语权的诉求，也终将落实为培育和践行这些伦理内容的过程。

第一，责任伦理来自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精英对人类共同生活的意义以及人对世界的道德责任的思考。责任是康德伦理学说的基本概念，在他思考主体的自由、责任、行为、规则之间的关系时，始终把责任视为一切道德原则的源泉，认为人必须为了责任而责任，以实现人的自由、尊严。康德通过三个命题界定了责任的概念：第一，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上的善；第二，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第三，责任是由于敬重法则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在马克斯·韦伯的思考中，责任伦理追求的是道德合宜性与效率两者间张力的平衡，是一种“理想类型”的社会行为，意味着道德行为必须同时满足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sup>13</sup>他还强调：行动不仅要遵从良好的意愿和信念，还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自身责任，把可以预见的行为后果纳入到道德评判之内。

责任伦理的概念发展到当代，已成为一种基于理性的“道德整合方案”，倡导每个行为体都不要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还应为建设人类共同的责任体系做出努力——所谓“责任”，已不仅对人类和全球社会的责任，也包括对共存他者的责任，以及对未来人类的责任，即如约翰·费舍(John Feisher)等指出的，“行为者为了从道德上负起责任，必须对外界呈现的理性有适当的反应”<sup>14</sup>。这里重要的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共同体意识”是恪守责任伦理构建的基础，没有这种意识，就无法引导行为体理性思考、谨慎行动。

第二，正义伦理在不同社会的伦理思想史中都有重要位置。正义是不同社会的共同理想，但对正义的认知和理解却不相同，也因此造成了社会建构和文化模式的差异。正义通常指个体行为的正当与公正，也关乎社会制度的适宜与公平，正义伦理的对象是社会基本结构，正义的功能在于分配权利和义务、划分与合作相关的成本和利益。根据罗尔斯(John Rawls)的观点，正义是作为一种合作体系的社会的制度安排，能够帮助人们通过共同行动来产生更大利益。针对调节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财富与资源的分配不公，罗尔斯还提出了两个基本正义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二是差别

<sup>13</sup> [德]沃尔夫冈·施路赫特著：《理性化与官僚化》，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sup>14</sup> [美]约翰·费舍等：《责任与控制——一种道德责任理论》，杨绍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

原则和机会均等原则，把个人权利与社会公正、正当合理与公正秩序等伦理范畴关联起来。

全球伦理的目标之一就是正义，即使国际秩序的改进符合正义伦理的要求，以帮助不同行为体在分配、环境和其他方面获取各自理应享有的正当、合理的利益。在“人类共同体”框架内，不同行为体之间有着结构性合作的关系，正义伦理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构成，已不仅是个体社会内部的分配问题，而是表征着维护人类精神的整体价值和尊严，是所有行为体之间保持秩序、和谐与统一的德性或美德。也只有践行正义伦理，才可能使不同行为体能够以“人类共同体”的立场去审视自身与他者的共存关系，使全球伦理进一步超越“愿景式的道德呼声”，推动“人类共同体”运用理性，逐步建立一种赵汀阳所说的，符合“世界制度”理想的“客观利益上的互惠结构”。<sup>15</sup>

第三，对话伦理强调通过对话建立行为体之间相互协商、彼此开放的关系，保全全球社会的秩序和各个行为体的基本利益，并逐步形成与全球伦理相应的制度安排。对话是人类道德和理性的标志，人类文明是经由对话得以前行并不断丰富的，对话决定了知识的生产与分享，也决定了不同国家和文化各自的历史和生命力。哈贝马斯就此指出，不同的文化类型“应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以便共同探讨对于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有关的重大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应当作为国际交往的伦理原则得到普遍遵守”。<sup>16</sup>这里重要的是，只有真实地实现对话的联结，使对话不仅作为一种道德生产的程序，同时也能发展为一种合作博弈的理性机制，才可能摒弃话语霸权、强权，建立交换意见、沟通思想和协调利益的交互主体性动态过程，进一步地，推动国际社会的进化和自身的进步，使各个行为体超越冲突“嗜好”，逐步走向相互信任、平等协商、资源共享的“人类共同体”。<sup>17</sup>

全球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对话伦理。通过对话可以使停滞不前的人类交往重新开放，尊重和包容那些挑战己方“权威”、利益的言语和行为，也创造了使信息传播和人类交往得以持续的情境——在推动人类知识生产的同时，创造和维护着知识的公共性，同时也降低了跨文化乃至全球传播情境中形形色色的偏见和不确定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伦理不可能取消本土伦理，否则就意味着对话的终结；本土伦理也不应对抗全球伦理，否则就等于进步的终结。

## 结语

知识界有关全球伦理的思考所展示的“理想图景”，是全球伦理的构建和传播能够有效推动国际行为体共同走向“善治”，藉由理性力量对内完善自身行为、对外寻求与他者共存所需的合理秩序，

<sup>15</sup> 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第33页。

<sup>16</sup>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作为未来的过去》，章国锋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sup>17</sup> 孙英春：“跨文化传播的对话空间”，《浙江学刊》，2017年第2期，第51-58页。

进而改变、重构“人类共同体”，走向“一个能使得所有的国家、文化和民族保持他们独特的个性，并在真正平等和共同合作的基础上一起工作的世界体系”。<sup>18</sup>

促进不同社会本土伦理的融合，建构理性、多元的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全球伦理，推动发挥全球伦理对人类交往的调节功能，是当前各个国际行为体必须共同面对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人类理性与道德的限度，须知，人类社会的进步不可能仅凭建立在对人类的完美性或者道德和谐观念基础上的道德探讨以及伦理框架之上，没有与之配合的实践层面的制度和法律设计——全球伦理的建构过程不仅包括通过对话、协商去修正、完善相应的伦理规范，更需要的环节，是通过一系列清晰的法律文件以及随之形成的国际制度来体现和贯彻——这种框架不可能牢固，实践中也难以站得住脚。

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国际规范以及全球伦理的建构亦处于新的历史拐点，国际行为体围绕话语权展开的新的竞争也将日益激烈。虽然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正在不断发生变动，但在国际话语权的权力份额和权力运用上不得不面对西方集体话语难以逾越的“霸权”地位。为应对外在世界的种种质疑和挑战、全面保障自身权益，中国必须在自身社会运行和国际交往所涉的不同领域做出伦理安排，通过点点滴滴的国际社会化努力，逐步消解那些影响自身话语权生成和可持续存在的阻碍。

正如梅光迪在1917年所说的，“我们必须理解，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然后才能应付当前与未来的生活”。<sup>19</sup>当前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处的历史性课题，除了如何运用中国经验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如何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方案”之外，还包括伦理层面的紧迫任务，包括：第一，寻求全球伦理与自身利益的契合，使全球伦理“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以及参与国际社会化的理性基础；第二，基于宽容、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学术机制，对中国传统和现当代的社会建构经验进行梳理、诠释，从本土发掘、检验那些能够进入全球社会交往层次、有益于全球伦理建构的“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sup>20</sup>的内容，为全球伦理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建设做出实质性贡献；第三，面向调整、建构和传播“中国话语”的目标，从伦理层面把握中国在国际话语格局中的实践定位，引导客观认识与理性支持，逐步减小多边阻力乃至恶性竞争，预防政治风险以及“联合遏制”，进一步地，寻求自身话语在“人类共同体”之中的长期、有效的结构性影响。

<sup>18</sup> [加]保罗·谢弗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39页。

<sup>19</sup> 梅光迪：“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原载《中国学生》月刊，第12卷第3期，引自乐黛云：“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27页。

<sup>20</sup> 吴宓：“中国的新与旧”，原载《中国学生》月刊，第16卷第3期，引自乐黛云：“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27页。

## 作为一种跨国挑战的“中国挑战”：对当代美中关系的启示

潘成鑫

**【摘要】**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如何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成为国际关系领域分析最多的问题之一。然而，关于中国挑战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很少给予批判性的关注。虽然这一概念的含义看起来似乎不言自明，但本文认为，这一概念误解了所谓“中国挑战”的本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中国”挑战在许多方面可以更好地理解为跨国挑战，而不是起源于中国本身的基于民族国家的挑战。进行这种概念分析至关重要，因为对“中国”挑战的本质的概念上的误解可能并确实误导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这一挑战作出反应的方式。鉴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中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政策是被对“中国”挑战的传统理解方式所误导。

**【关键词】** 中美关系；国家转变；跨国挑战；全球化；贸易战

**【作者简介】**潘成鑫，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也是《全球政治社会学》丛书（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的联合主编，曾于《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太平洋评论》(*Pacific Review*)、《亚太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Alternatives》、《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当代政治》(*Contemporary Politics*)、《当代中国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文章。他的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Edward Elgar, 2012)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SAP)翻译成中文出版，并荣获 20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佳图书奖。他曾先后在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外交学院、澳门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地址：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Warrnambool 区 Pigdons 路 75 号，迪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邮编：3216。电话：61 3 5227 2127。电子邮件：chengxin.pan@deakin.edu.au

本文较早版本于 2016 年 11 月 4-6 日在北京大学北京论坛上发表。感谢贾庆国教授和与会嘉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此文原为英文稿，由华侨大学 2018 级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王英杰翻译。

---

## The “China” Challenge as Transnational Challenge: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U.S.-China Relations<sup>①</sup>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China on the world stage, one of the most analyzed ques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been how to deal with the China challenge. And yet, few studies have paid critical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exactly the *China challenge* means. While the meaning of the concept may seem self-evid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concept misunderstands the nature of the so-called “China challenge,” especially in the economic realm. Instead of a nation-state-based challenge that originates in China itself, many aspec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as a transnational challenge, albeit with Chinese symptoms. Engaging in this conceptual analysis is vital in that a conceptual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China” challenge may, and indeed have misinformed the way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choose to respond to that challenge. This issue has taken on an added urgency in light of Donald Trump’s escalating trade war against China, a policy which has been largely misguided by the conventional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China” challenge.

**Keywords:** US-China relations, state transformation, transnational challenge, globalization, trade war

**Author:** Chengxin P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Deakin University.

### 导言

中国的崛起是机遇还是威胁，美国是应与中国接触，遏制还是对冲，这些问题曾一度引起关注着美、中两国的社会各界的分歧。<sup>②</sup>今天看来，这场争论似乎已经结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威胁，且美国对北京的接触政策是建立在对中国政治自由化抱

---

<sup>①</sup>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Beijing Forum, Peking University, 4-6 November 2016.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thank Professor Jia Qingguo and the participants at the Forum for their constructive comments.

<sup>②</sup> Kagan, Robert. “What China Knows That We Don’t: The Case for a New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The Weekly Standard*, January 20, 1997, pp. 22-2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David Shambaugh and Karl F. Inderfurth, “China and the US: To Hedge or Engage”, *YaleGlobal Online*, (April 11, 2007),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a-and-us-hedge-or-engage> (accessed May 28, 2008); Suisheng Zhao, “Shap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China’s Rise: How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ught Back Hedge in Its Engagement with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5 (2012), pp. 369-389.

有错误希望基础之上的。<sup>③</su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被视为新一轮权力转移中正在崛起的挑战者。<sup>④</sup>北京在南海争端中展现出的强硬立场,以及如“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大胆的举措,都引起了(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关注,认为这是在竞争美国的全球领导力,除此以外,(美国)还对中国改写国际关系规则的意愿感到担忧。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坚称,“中国重返大国地位,或许是21世纪美国外交面临的最重要挑战。”<sup>⑤</sup>如果以史为鉴,许多人对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大国竞争可能带来的暴力后果持悲观态度。<sup>⑥</sup>考虑到另一场修昔底德陷阱重演导致的高风险,<sup>⑦</sup>一个专门研究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的学术性群体(scholarly cottage industry)得以出现。<sup>⑧</sup>

截至2018年11月,在谷歌学术上搜索关键词“中国挑战”(带引号),结果有8810条。相比之下,搜索关键词“美国挑战”得到了3990个结果,搜索“俄罗斯挑战”得到了415个结果,搜索“恐怖分子挑战”得到了1050个结果。通过修改关键词,搜索“来自中国的挑战”这一短语得到了991个结果,而对于“美国”、“俄罗斯”和“恐怖主义”的类似搜

<sup>③</sup>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载于: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accessed July 6, 2018);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2 (2018), pp. 60-70; Mike Pence,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Hudson Institute, (October 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accessed October 5, 2018)。大卫·M·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曾指出,“如今,美国决策精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地将中国视为威胁”。引自 Joshua Eisenman, “Beyond Engagement? Rethinking America’s China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0 (2016), p. 644。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话语和研究中批评“中国威胁”和“中国机会”,以及分析如何定义“中国机遇”(这一问题),势必会助长西方对中国融合于他们的幻灭感。见 Chengxin Pan, *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2012。

<sup>④</sup> 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p. 35-55; Steve Chan, *China, the U.S.,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London: Routledge, 2008; Rosemary Foot, “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management: three decades of China - Japan - US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6 (2017), pp. 829-842。

<sup>⑤</sup> Thomas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W.W. Norton, 2015, p. 1。

<sup>⑥</sup>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pp. 7-45;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2010), pp. 381-396; Richard N. Rosecrance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Next Great War? 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5;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2015。

<sup>⑦</sup>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24 September,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accessed October 10, 2017)

<sup>⑧</sup> Richard Weitz,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Some Insights from Scenario-Based Planning”,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4, No. 3 (2001), pp. 19-48; Sherman Katz and Devin Stewart, “Hedging against the China Challenge,” *PacNet*, no. 43, Pacific Forum CSIS, Honolulu, Hawaii, September 29, 2005;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Lyle J.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索分别得到了 159、136 和 39 个结果。在对《太平洋评论》(*Pacific Review*)杂志过去 30 年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文章进行回顾时,编辑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指出了一些关键的研究主题、问题和方法。正如他所言,“无论是单独还是与盟友一起,中国是否可能破坏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以及其他国家应该如何回应或是本应如何回应这一假定的中国挑战”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基本问题。<sup>⑨</sup>

关于如何控制和应对这一挑战的研究有很多,但直接针对如何理解中国挑战本身的研究却很少。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都必须以对这一问题的特定理解为前提,而关于中国崛起的激烈辩论可以证明,这些理解是多样的,而且这些理解本身也多元化地、不定地受到了不同视角的影响。然而,尽管对“中国挑战”有许多隐含的理解和假设,“中国挑战”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批判性分析。虽然大多数人都在思考这一挑战的各个方面及其政策影响,但很少有人质疑挑战是由中国造成的这一观点。对许多观察人士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顾名思义,中国挑战来自中国本身。一些更谨慎周密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体,还应将其内部不同部分、地区和次国家的行为体考虑在内。<sup>⑩</sup>然而,总体而言,“中国挑战”的概念一直被轻易地使用,似乎其含义是合乎常理和显而易见的。

然而,它的含义并非如此简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对这一概念本身提出质疑,在中美关系及其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的背景下,尤其对所谓中国挑战的经济维度进行集中剖析。笔者的主要论点是,至少在经济方面,所谓的“中国挑战”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跨国的或全球化的挑战。本文首先对现有文献中“中国挑战”的相关论述进行简要概述。进而研究在区域和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应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国”挑战,以及所谓的“中国”自身是如何转变成为的全球化国家的。最后,本文将会讨论对中国挑战的不同理解是如何对中美政策产生不同影响的,以及这对处理当代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 “中国挑战”:美国的观点

作为众多争论焦点的“中国挑战”有很多维度,涉及中国的魅力攻势、军事现代化以及其经济上的崛起。在看似由中国带来的全面挑战的核心就是其被认为的经济上的挑战,而这被视为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基础。难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几乎完全

<sup>⑨</sup> Shaun Breslin, “Still Rising or Risen (or Both)? Why and How China Matter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6 (2017), p. 871.

<sup>⑩</sup> Shahar Hemeiri and Lee Jones, “Rising Powers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1 (2016), pp. 72-98; Min-Hua Huang and Yun-han Chu, “Exploring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hina: A critique on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spectives”, in Quansheng Zhao and Guoli Liu (eds), *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 Glob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pp. 41-61.

从贸易和经济的角度看待美国面临的“中国挑战”，有鉴于此（以及篇幅有限），本文将顺理成章地主要关注“中国挑战”的经济维度。接下来，笔者将简要强调一些对经济领域的中国挑战的常见（主要是美国人的）看法，进而在下一节中对这些观点提出批判性的质疑。

在经济上中国挑战体现在诸多方面。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给许多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带来了巨额贸易赤字。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不仅削弱了西方竞争对手的竞争力，还导致了这些老牌工业中心的就业岗位的流失和制造业的衰退。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向全球以寻求投资和收购机会，ThinkPad、摩托罗拉(Motorola)和通用电气(GE)等美国知名品牌如今都掌握在中国手中。<sup>11</sup>此外，有钱的中国游客和移民被视为新一轮的“中国入侵”，他们购买的对象从婴儿配方奶粉、奢侈品到房地产无所不包。最近，中国的“中国制造 2025” (Made in China 2025)计划似乎让美国对中国破坏美国世界技术主导地位的坚定野心产生了更多担忧。<sup>12</sup>

中国造成的经济挑战引起了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可靠的来源之一就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它在过去 18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发布有关中国的重要的年度报告。<sup>13</sup>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特朗普的国家贸易委员会(National Trade Council)主任、前商业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时代》杂志将彼得·纳瓦罗称为“特朗普总统任内在最不具稳定性的问题上华盛顿最举足轻重的人物，”<sup>14</sup>纳瓦罗一再警告称，中国正在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不公平、重商主义的贸易做法”作为“大规模生产的武器”，以击败美国。<sup>15</sup>在对中国的看法上，纳瓦罗在他的同行中曾一度（被认为）是一个极端的边缘人物(radical outlier)，但他的看法正日益反映出美国对中国挑战的普遍看法。例如，《纽约客》中的一篇文章尽管高呼纳瓦罗的观点是危言耸听的，但却同意其“中国从事了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中国确实在操纵其货币。中国也确实忽视了知识产权法，在工人安全标准和环境保护方面记录不佳，而且在许多其他方面，中国以牺牲其他

<sup>11</sup> Michele Nash-Hoff, “Should We Allow the Chinese to Buy Any US Company They Want?”, *Industry Week* (January 9, 2018), <https://www.industryweek.com/economy/should-we-allow-chinese-buy-any-us-company-they-want>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8) .

<sup>12</sup> Chengxin Pan, “Made in China 2025 and US-China Power Competition”, *The Interpreter* (Sydney: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August 10, 2018),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made-china-2025-and-us-china-power-competition> (accessed August 11, 2018) .

<sup>13</sup>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November 2018), [https://www.uscc.gov/Annual\\_Reports](https://www.uscc.gov/Annual_Reports),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8) .

<sup>14</sup> Molly Ball, “Peter Navarro Used to Be a Democrat. Now He’s the Mastermind Behind Trump’s Trade War”, *Time* (August 23, 2018), <http://time.com/5375727/peter-navarro/> (accessed November 1, 2018) .

<sup>15</sup> 彼得·纳瓦罗写了关于中国经济威胁的三部曲, *The Coming China Wars: Where They Will Be Fought, How They Can Be Won;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A Global Call to Action; and 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提高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竞争的能力”的一系列观点<sup>16</sup>。重要的是，特朗普持有同纳瓦罗相同的看法，认为中国攻击了美国的经济，而他常把这种行为称为是“对美国人工作机会的窃取。”<sup>17</sup>

中国经济挑战的影响被认为超出了经济的范畴。人们普遍认为，权力向“中央王国”的转移，正在给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黄旻华和朱云汉认为，“中国崛起作为一个关键的历史现象，对美国政策制定者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sup>18</sup>尤其是中国在南海的行为，让许多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对一个怀有主宰亚洲雄心的“新的、坚定而自信的中国”感到担忧。<sup>19</sup>在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看来，美国普遍担心“北京的长期政策是把美国完全赶出亚洲，并进而在此建立中国的势力范围。”<sup>20</sup>而且在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国也经常被指责进行网络攻击、债务陷阱外交以及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制造者。

虽然人们对中国挑战的关注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人们普遍认为，由于全球经济重心向中国的转移，上述许多挑战也都是由中国直接造成的，因此这（自然）就是中国的挑战。一些媒体给出的标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失业：中国制造”、“毒害全球之路的根源在于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总体规划”以及“中国对美国选举构成最大威胁”。在一些观察者看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确正积极采取一系列具有攻击性的行动：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到在南海的强硬行为，再到秘密地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和软实力。此外，正如人们所认为的，中国不仅制造了许多挑战，也因而应对这些挑战负责，而且许多这些挑战都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之中的，有着鲜明的中国烙印。例如，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治国方略是在“中国不断演进的商业文化的独特融合中”形成的。<sup>21</sup>根据对“中国挑战”的论述，简言之，中国是一个强大且完整统一的国家行为体，是各种挑战的发源地。

<sup>16</sup> Adam Davidson, “Trump’s Muse on U.S. Trade with China,” *New Yorker* (October 12, 2016), <http://www.newyorker.com/business/currency/trumps-muse-on-u-s-trade-with-china> (accessed October 15, 2016).

<sup>17</sup> Shannon Tiezzi, “Separate Ways? Donald Trump’s Approach to China ‘Stuck in the 1990s’”, *CNN* (April 28, 2016), <http://edition.cnn.com/2016/04/27/opinions/donald-trump-foreign-policy-china/> (September 17, 2018).

<sup>18</sup> Min-Hua Huang and Yun-han Chu, “Exploring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hina: A critique on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spectives”, in S. Zhao and G. Liu (eds), *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 Glob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p. 56.

<sup>19</sup>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 (2013), pp. 7-48.

<sup>20</sup> Kevin Rudd, “America and China are rivals with a common cause”, *Financial Times* (April 16 2015), [http://belfercenter.hks.harvard.edu/publication/25261/america\\_and\\_china\\_are\\_rivals\\_with\\_a\\_common\\_cause.html?breadcrumb=%2Fexperts%2F3028%2Fkevin\\_rudd](http://belfercenter.hks.harvard.edu/publication/25261/america_and_china_are_rivals_with_a_common_cause.html?breadcrumb=%2Fexperts%2F3028%2Fkevin_rudd) (April 18 2015).

<sup>21</sup> Ted C. Fishman, *China, Inc.: How the Rise of the Next Superpower Cha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Scribner, 2005, p. 193.

## 作为跨国性挑战的“中国”挑战

鉴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无数挑战的源头，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所谓的“中国”挑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中国现象？笔者认为，这种流行的观点严重误解了“中国”挑战的本意，它本质上是一种主要由全球化经济导致的跨国性挑战。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笔者将首先从总体上讨论民族国家的跨国化，进而分析应如何更好地理解作为一个多形态国家的中国，其经济不仅具有中国特色，更具有跨国性质。

### 民族国家的跨国化

一些关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传统研究往往将经济和国家视为两个独立的领域。通常认为，虽然全球化已经改变了经济领域，使国家在经济上更加相互依赖，但它对政治领域的国家的影响主要限于国家权力是否被削弱。除此之外，国家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领土界限的、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国家。<sup>22</sup>但这种静态的、非历史性的观点已被一种更为激进的全球性的（分析）方式所摒弃。如威廉·鲁宾逊(William I. Robinson)就呼吁“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界定的国家概念，不是将其作为一种‘事物’或一种虚构的宏观主体，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放到更大的、可能会有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由历史决定的制度形式之中。”<sup>23</sup>在这一激进的全球性（分析）方法之中，笔者将通过利用全球化、经济地理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来突显全球生产网络和跨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是如何推动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民族国家（Westphalian nation-state）转换为新自由主义竞争性国家的。

首先，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式民族国家，如果不完全是虚构的话，也至多是一种理想类型。<sup>24</sup>国家虽然表面上是自成一体、同质的，但从本体论来看，它们都是通过基本的全息关系（holographic relations）与更大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它所处于的、更大的整体。<sup>25</sup>

即使承认国家在以前或多或少是独立的实体，它们的“同质性”也日益受到全球化进程的挑战。具体而言，经济全球化使经济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分散和碎片化，这既得益

<sup>22</sup> 关于这一观点的批评，见 Philip G. Cerny, “Paradoxes of the Competition State: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Globalizatio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32, No. 2 (1997), pp. 256-57.

<sup>23</sup> William I. Robins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ization: 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Stat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0, No. 2 (2001), p. 164.

<sup>24</sup> Andreas Osiander,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n My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2 (Spring 2001), pp. 251-287.

<sup>25</sup> Chengxin Pan, “Toward a New Relational Ontology in Global Politics: China’s Rise as Holographic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8, No. 3 (September 2018), pp. 339-367.

于又有助于跨国资本的优势。这（一变化）转而又为作为政治经济单元的国家的国际化转型创造了条件。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让人们对福利国家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国家必须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全球经济到国民经济之间的传送带”，使之前以国家为导向的政策服从于全球资本竞争逻辑的要求。<sup>26</sup>菲利普·塞尔尼(Philip Cerny)所称的“竞争型国家（competition state）”<sup>27</sup>由此产生。与福利国家相比，“竞争型国家追求更多的市场化，以便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开展经济活动，或在其他方面增加国家财富，（使之）在国际和跨国方面更具有竞争力。”<sup>28</sup>作为全球市场竞争的中心角色，竞争型国家一开始就是在系统或结构层面上产生的一种现象。

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和艺龄·森(Ngai-Ling Sum)就将中国描述为这样一个竞争型国家，而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认为中国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sup>29</sup>另一些人则对为中国贴上“竞争型国家”的标签提出了异议，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最应被视为一个“多形态的国家（polymorphous state）”。<sup>30</sup>此处分析的目的并不是将中国归入任何一个单一的概念范畴；相反的是，笔者认为它更有可能是上述所有因素的混合体。总体而言，在民族国家越来越具有跨国或全球化的性质这一观点上，这些（研究）在路径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崛起带来的各种挑战可以更好地被理解为跨国或全球化导致的挑战。

### 多形态的中国政府及其全球化的经济

首先，以饱受诟病的“中国制造”现象为例。这种现象及其所造成的贸易不平衡被认为是美国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实际上）“中国制造”这个标签的用词是不当的，最好的理解应是“中国组装”。在中国对世界的出口中，中国获得的收益平均只占到产品总值的20.4%，而对美国的出口平均只占到17.1%。<sup>31</sup>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制造”的标签掩盖了全

<sup>26</sup> Werner Bonefeld, "Social Constitution and the Spectre of Globalization," ;A. Bieler, W. Bonefeld, P. Burnham, and A. Morton eds., *Global Restructuring, State, Capital and Labour: Contesting Neo-Gramscian Perspectives*, Hound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47.

<sup>27</sup> Cerny, "Paradoxes of the Competition State."

<sup>28</sup> 同上，第259页。

<sup>29</sup>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Bob Jessop and Ngai-Ling Sum, *Beyond the Regulatory Approach: Putt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ir Pla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6, pp. 201-206; Reinhard Peter Biedermann, "China's Rare Earth Sector – Between Domestic Consolidation and Global Hegemon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Vol. 9, No. 2 (2014), pp. 276-293.

<sup>30</sup> Jude Howell, "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Stat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7, No. 2 (2006), pp. 273-97. 同见 Linda Weiss, "The Myth of the Neoliberal State", in Chang Kyung-Sup, Ben Fine and Linda Weiss (eds.), *Developmental Politics in Transition: The Neoliberal Era and Beyond*, Hound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27-42.

<sup>31</sup> Lawrence Lau, Mingchun Sun, Victor Fung, David K. Richards, and Richard Rosecrance, "U.S.-China Economic Interactions: Trade, Finance,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Gu Guoliang, eds., *Power and Restraint: A Shared Vision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New York: PublicAffairs, p. 37.

球化世界中生产日益具有跨国性的本质，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中国只是最终的组装地。<sup>32</sup>不足为奇的是，中国对所谓“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产品(如 iPhone 和 iPod)的附加值贡献微乎其微，<sup>33</sup>虽然这些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仍在持续计入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融入区域和全球的生产网络，使跨国公司能够到像中国这样的地方进行外包和海外生产。如果是这些外包和海外生产的做法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话，(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本身只发挥了很小、但并非无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一篇接一篇的报道都在兜售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与中国进行贸易已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岗位流失，且这种观点仍在产生共鸣，<sup>34</sup>但人们常常忽视的一点是，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应对失业问题负至少同样的责任。事实上，失业早在当代中国崛起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与沃尔玛在美国销售的大部分商品相关的工作岗位，很久以前就已经从美国消失了，主要流向了台湾、香港和韩国，这也就意味着“沃尔玛与中国的贸易可能确实削减了工厂的工作岗位——但是是韩国的工作岗位，而不是南卡罗来纳州的。”<sup>35</sup>根据美国劳工局自身每年给出的估计，美国直接流失到中国的工作岗位少于 10,000 个。<sup>36</sup>另一方面，中国是近年来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尽管美国出口总额在 1993 年至 2003 年间停滞不前，但同期对中国的出口却增长了两倍。<sup>37</sup>作为美国经济支柱产业部门的服务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更快，在 2016 年达到 380 亿美元，是 2006 年的 85 倍多。<sup>38</sup>

正如我们不能将全球经济中失业问题的挑战完全归咎于中国一样，很显然地，也不能将给美国带来的机会完全归功于中国。中国从全球贸易的机会中获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政府为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政策帮

<sup>32</sup> Chengxin Pan, "Rethinking Chinese Power: A Conceptual Corrective to the 'Power Shift' Narrative", *Asian Perspective*, Vol. 38, No. 3 (2014), pp. 387-410; Chengxin Pan, "What Is Chinese about Chinese Businesses? Locating the 'Rise of China'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58 (2009), pp. 7-25.

<sup>33</sup> 威廉·塔布(William Tabb)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Pod……是‘中国制造’的，但实际上只是在那里组装和测试的。(一台) iPod 价值中的 3.70 美元留给了中国，苹果公司的单位毛利润则为 80 美元。”引自 John Gulick,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and Barriers to China's Hegemonic Accession",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17, No. 1 (2011), p. 17.

<sup>34</sup> Robert E. Scott, *The China Toll: Growing 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Cost More Than 2.7 Million Jobs between 2001 and 2011, with Job Losses in Every State*, EPI Briefing Paper No. 345,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August 23, 2012.

<sup>35</sup> Dorinda Elliot and Bill Powell, "Wal-Mart Nation," *Time*, (June 19, 2005),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074120,00.html>

<sup>36</sup> Will Hutton, in James Pethokoukis, "Author Will Hutton on China's Futur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anuary 5, 2007.

<sup>37</sup> George J. Gilboy,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4 (2004), p. 36.

<sup>38</sup>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November 2017),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annual\\_reports/2017\\_Annual\\_Report\\_to\\_Congress.pdf](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annual_reports/2017_Annual_Report_to_Congress.pdf) (May 15, 2018).

助中国抓住了这些机会。同时，这也使得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经济称为是“超级融合”（superfusion）。<sup>39</sup>尽管特朗普政府试图让美国同中国经济脱钩，<sup>40</sup>但这两个经济体已经是密不可分了的。事实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如此之深，以至于（一旦）美国科技公司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就可能促使“美国的创新能力受损，而这一能力恰恰是这些（美国）政策旨在保护的。”<sup>41</sup>

无论如何，如果孤掌难鸣，对美国就业岗位的“中国”挑战就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是中国“窃取”了这些岗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就业的全球化也在加强。鉴于中国现在是全球生产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的就业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如在1998年至2001年间，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曾裁掉了2100万员工。泰德·菲什曼(Ted Fishman)写道：“中国新失业的工人，尤其是老年工人的数量，可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相当。”<sup>42</sup>2009年初，中国政府宣布，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有超过2000万的农民工失业。<sup>43</sup>

区域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可能部分地归因于当地国家的政策，也有一部分是跨国商业实践的结果。当然，这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也不是由某一个国家造成的。<sup>44</sup>一旦这些网络开始运转，跨国资本就能够对产品的地点、时间和制作方式，及其相应的成本产生巨大的跨境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正如纳瓦罗称之为中国“大规模生产武器”的“可疑(dubious)的中国商业行为”，已不再单纯是本质上的“中国的”（行为）。相反地，它们既是中国企业造成的，也是跨国公司造成的，且两者之间的界限正逐渐变得模糊。

以中国主要的“大规模生产武器”——“中国价格”为例。这一术语指的是中国制造商的价格，在制造相同产品时，中国制造商的价格往往明显低于美国同行。但“中国价格”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中国或中国的重商主义有关的？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同样重要的参与者，就是像沃尔玛那样拥有巨大购买力的跨国公司。在不断增加利润率和满足精打细算(price-conscious)的消费者的需求压力下，这家大型零售商不厌其烦地从供应商那里争取到最便宜的价格。“不是你来告诉沃尔玛你的价格，沃尔玛告诉你，”美国纺织

<sup>39</sup> Zachary Karabell, *Superfusion: How China and America Became One Economy and Why the World's Prosperity Depends on 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sup>40</sup> John Lee, "Decoupling from China: Cutting the Gordian Knot," *The Interpreter* (November 9, 2018),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decoupling-china-cutting-gordian-knot> (accessed November 10, 2018).

<sup>41</sup> Ibid.

<sup>42</sup> Fishman, *China Inc.*, p. 74.

<sup>43</sup> Jamil Anderlini and Geoff Dyer, "Downturn Causes 20m Job Losses in China",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3, 2009), <https://www.ft.com/content/19c25aea-f0f5-11dd-8790-0000779fd2ac> (accessed February 10, 2009).

<sup>44</sup> Robins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ization," p. 187.

协会国际贸易主任说。<sup>45</sup>如果一家中国供应商想从沃尔玛获得业务，它别无选择，只能顺从，因为如果它不这样做，沃尔玛很容易找到愿意替代它的供应商。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将“中国价格”更准确地称为是“沃尔玛价格”。

一些人认为，由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政府持续地对其经济和商业活动施加更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或许这种国家干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有关“中国制造 2025”的产业政策，该政策已成为美国对华关税战的靶子（lighting rod）。从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可以看出，很明显地，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在一系列先进制造业领域中增强更多的自主创新能力。然而，即便是这种明显是由北京推动的政策，也并非是没有跨国联系的。在日本、美国和德国的经济起飞时期，它们都采取了类似的产业政策来进行赶超。<sup>46</sup>中国的这一举动反映了这种业已确立的国际惯例（well-established practice），也证明了中国意识到了自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组装生产线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华盛顿威胁要禁止向中国电信公司中兴（ZTE）供应美国零部件，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推动“中国制造 2025”产业政策的不仅是中国，还有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大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严格技术禁令，（反而）刺激了中国政府在航天和超级计算机项目等领域的国家投资。<sup>47</sup>但即使中国发誓要追求技术独立，没有全球人才和技术的支持，单靠中国（自身）是无法实现的。正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前首席法官詹姆斯·巴克斯（James Bacchus）所指出的，中国不能“通过歧视外国商品和服务、将外国公司拒之门外、在移交知识产权时限制市场准入以及总体上削弱外国在华竞争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sup>48</sup>

此外，在不否认中国政府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下，国家在当代全球化经济中的角色和权力也已经经历了转变。中国作为全球化国家的一面被加强了，而其民族国家的特性则被削弱了。“中国早期对外资接纳的原因在于这拯救了中国共产党，”<sup>49</sup>为了让这一趋势继续下去，中共别无选择，只能保持其经济的开放。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新指导方针，首

<sup>45</sup> Edna Bonacich and Khaleelah Hardie, “Wal-Mart and the Logistics Revolution”, in Nelson Lichtenstein, ed., *Wal-Mart: The Face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New Press, p. 177.

<sup>46</sup> Winston Mok, “‘Made in China 2025’ Is Only Following the Path Beaten by the US and Its Alli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2, 2018), <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united-states/article/2167820/made-china-2025-only-following-path-beaten-us> (accessed November 8 2018) .

<sup>47</sup> Zheng Yongnian, “China and the U.S.: A Clash of Techno-Nationalist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4,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2018/05/14/china-technology/?noredirect=on&utm\\_term=.12ecb3737e6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2018/05/14/china-technology/?noredirect=on&utm_term=.12ecb3737e66) (accessed August 1 2018) .

<sup>48</sup> James Bacchus, “Cheating Isn’t Going to Help China Win”, *Bloomberg* (July 13,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8-07-12/cheating-on-technology-isn-t-going-to-help-china-get-ahead> (accessed August 5 2018) .

<sup>49</sup> Dali L. Ya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olitical Discontents in China: Authoritarianism, Unequal Growth, and the Dilemma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9 (2006), p. 157.



次向外资开放会计审计、建筑设计及评级等服务。<sup>50</sup>2018年6月,中国对外投资负面清单缩短,金融、专业服务、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等领域外资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sup>51</sup>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中国政府都在撤退(retreat)。只有在资本市场,它还保留着很大的控制权。<sup>52</sup>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了其经济中一大部分由国有转为了外商独资或联营所有。到2011年,国有企业仅占中国工业总产出的26%,而私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占据了其余的部分。<sup>53</sup>甚至在一些国有企业,也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他们变为了爱德华·斯坦菲尔德所说的“标准商业实体(standard commercial entities)”,这些实体“专注于国际网络,由国际银行家和律师(为它们)提供建议,与他们各自领域中领先的全球公司进行合作,并受到外国政府的监管限制。”<sup>54</sup>结果,正如罗宾逊指出的那样,“根本没有证据表明,在国际性的控制之下,‘中国的’企业对‘美国的’及其他‘西方的’企业展开了激烈竞争。相反地,这是包含中国企业在内的、跨国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sup>55</sup>

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再是它们原来的样子了,那么中国政府也同样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了。正如中国经济通过融入全球分工而实现了全球化一样,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生了变化。根据一些关于“国家转型”的研究,中国政府已经经历了“国家机构和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失衡国际化”。<sup>56</sup>中国政府及其部分机构(如中国央行)的国际化,采取的形式是“在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就世界经济的需求形成跨国(interstate)共识”。<sup>57</sup>具体来说,中国政治精英对新自由主义准则(如《华盛顿共识》)的广泛接受就是对这一共识形成的例证。<sup>58</sup>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认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研究显示,中国遵循了《华盛顿共识》十项要素中的八项,如财政规定(discipline)、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自由

<sup>50</sup> Xinhua, “China to Boost Foreign Investment”, China Daily (December 30, 2016),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6-12/30/content\\_27822824.htm](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6-12/30/content_27822824.htm), (accessed August 5 2018).

<sup>51</sup> Xinhua, “China Unveils Shortened Negative Lis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China Daily (June 29, 2018),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806/29/WS5b35c63fa3103349141dfc01.html> (accessed October 12 2018).

<sup>52</sup> Nicholas R. Lardy, *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Chapter 1.

<sup>53</sup> Lardy, *Markets over Mao*, p. 20.

<sup>54</sup> 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3. See also Yongnian Zheng,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31-33.

<sup>55</sup> William I. Robinson, “The Transnational State and the BRICS: A Global Capitalism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1 (2015), p. 10.

<sup>56</sup> Shahar Hameiri and Lee Jones, “Rising Powers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1 (2016), pp. 72-98.

<sup>57</sup>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54-255.

<sup>58</sup> Chengxin Pan, “‘Peaceful Rise’ and China’s New International Contract: The State in Change in Transnational Society”, in Linda Chelan Li (ed.), *The Chinese State in Transition: Processes and Contests in Local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127-44.

化以及竞争性汇率等。<sup>59</sup>

因此，由于全球化，中国已成为一个“全球化国家”。全球化的影响不仅包括“国家之间关系的转变，而且（也包括）……国家本身性质的转变。”<sup>60</sup>克利夫·杜兰德(Cliff DuRand)表示，一个全球化的国家“服务于跨国资本的利益，而非其本国人口的利益”。<sup>61</sup>当然，在中国，这一点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并非所有中国机构都被均衡地社会化进了这种全球自由共识之中：不同机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内部分歧和冲突。然而，关于这样一点或许是没有争议的，即许多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已经加入了跨国资本主义(transnational capitalist)的阶层，这使得他们在利益、身份认同和（至少在经济上）忠诚方面变得更具跨国性，而非是“中国性”。<sup>62</sup>

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中国政府及其经济确实对美国构成挑战的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挑战是在哪里、如何出现的，以及（美国）是否关注到中国自身对这些挑战也是一种有效的回应。这些挑战的根源既来自美国，也来自中国“本身”，甚至它们可能会表现出某些“中国”的症状(symptoms)和特征。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谈论中国的挑战，正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融合。《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说得没错：“对美国人来说，中国最令人不安的不是他们的共产主义；而是他们的资本主义。”<sup>63</sup>中国的资本主义，顾名思义，是一种混合的跨国结构，而不具有纯粹的中国性质。

## 对当代中美关系的启示

现有的关于中国挑战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挑战的跨国特征。这种忽视不仅仅是知识上的缺失。它通过在国家中心（假定）下对“中国”挑战（这一概念）进行构建，误导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sup>64</sup>这将“中国”挑战框定为一个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而这又有助于使针对中国的强硬措施合法化。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阻止了华为参

<sup>59</sup> Scott Kennedy, "The Myth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9, No. 65 (2010), pp. 470.

<sup>60</sup> Ian Clark,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5.

<sup>61</sup> Cliff DuRand, "Contradictions of Global Neoliberalism",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 Technology*, Vol. 13, Nos. 1-2 (2014), p. 37.

<sup>62</sup> Allen Carlson, *China Transnationalized?* (EAI Working Paper). Seoul: East Asia Institute, 2015. [www.eai.or.kr/data/bbs/eng\\_report/201505151517457.pdf](http://www.eai.or.kr/data/bbs/eng_report/201505151517457.pdf) (accessed February 22, 2016).

<sup>63</sup> Qing Cao, "Modernity and Media Portrayals of China",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Vol. 22, No. 1 (2012), p. 17.

<sup>64</sup> Souchou Yao, *Confucian Capitalism: Discourse, Practice and the Myth of Chinese Enterprise*,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2, p. 8.

与建设这些国家的 5G 网络，在 2018 年 10 月，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马克·华纳依照他们的做法向加拿大写了一封信，以警加拿大小心华为 5G 带来的、对国家安全所未有的风险，<sup>65</sup>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认为华为是一家受惠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公司，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国家协调一致的政策回应。然而，华为虽然总部设在中国，但一直以跨国公司的形式运作，以美国的商业模式为基础，依靠着 IBM、普华永道、毕马威和合益集团等跨国公司的专业技术。它 80% 的融资来自中国以外的全球的银行。<sup>66</sup>因此，以国家为基础的、受冷战影响的、将“中国”经济挑战视为威胁的观念越来越不能反映出全球性威胁的变化本质。正如亨利·沃尔夫 (Henry B. Wolfe) 所指出的，“当今的电信行业是跨国的、无国界的。”威胁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可编程代码可以虚拟地植入硬件和软件中，从而使恶意行为者能够进行监视或发动网络攻击。<sup>67</sup>

据信，中国的大国崛起几乎一手造成了这些挑战（及机遇），任何相关解决方案都必须将中国作为这些问题的一个主要（甚至是唯一）源头。因此，按照这种说法，美国面临着“中国选择”。<sup>68</sup>进攻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敦促华盛顿“尽一切可能减缓中国的崛起”。<sup>69</sup>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阿什利·泰利斯建议“一种平衡性的战略，慎重地将中国对其不断增长的实力滥用这一因素考虑在内。”<sup>70</sup>在很大程度上，奥巴马以中国为核心的“重返亚洲” (Pivot to Asia) 政策正是从这些以国家为中心的判断中获得的启示。与执行这一政策密切相关的美国外交官之一坎贝尔 (Kurt Campbell) 则否认重返亚洲完全是为了中国。<sup>71</sup>虽然这种否认表面上没错，但毫无疑问，中国一直是重返亚洲的主要焦点。在向国会兜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时，奥巴马对自己的意图毫不掩饰：“如果我们不制定规则的话，中国就会在该地区制定规则。”关于 TPP 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回应，<sup>72</sup>虽然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不

<sup>65</sup> Bill Bostock, “Senators Rubio and Warner Tell Trudeau that China’s Huawei 5G Poses a Security Risk for Canada,” *Business Insider* (October 13,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au/marco-rubio-mark-warner-tell-trudeau-ban-huawei-5g-security-risk-2018-10?r=US&IR=T> (accessed November 8, 2018) .

<sup>66</sup> John Lord, “National Press Club of Australia Speech”, (June 27, 2018), <https://www.huawei.com/au/press-events/news/au/2018/national-press-club-of-australia-speech> (accessed November 18, 2018) .

<sup>67</sup> Henry B. Wolfe, “Australia Should Reverse Its Huawei 5G Ba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14, 2018), <https://www.scmp.com/tech/article/2164104/opinion-australia-should-reverse-its-huawei-5g-ban>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8) .

<sup>68</sup> Hugh White, *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 Collingwood, VIC: Black Inc., 2012.

<sup>69</sup> John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5 (2001), p. 60.

<sup>70</sup>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72),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5, p. 5.

<sup>71</sup> Kurt Campbell, “‘The Pivot’: Thre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Asia”, *The Interpreter* (12 July 2016),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pivot-three-profound-misunderstandings-about-asia>,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8) .

<sup>72</sup> Gerald F. Seib, “Obama Presses Case for Asia Trade Deal, Warns Failure Would Benefit China”,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7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obama-presses-case-for-asia-trade-deal-warns-failure-would-benefit-china-1430160415>,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8) .

同意奥巴马，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对美国而言，中国是一个主要竞争对手。

如今，被视为不公平的“中国”贸易实践为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奠定了基础。特朗普的惩罚性关税已经针对价值 2500 亿美元的“中国的”商品，预计将扩大到所有的剩余“中国”输美商品，价值约 2570 亿美元。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中国的”商品的概念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许多此类商品使用的是外国特别是美国的零部件，而其他许多产品则用于美国公司生产的产品。结果，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伤害并不亚于对中国同行的伤害。正如美联储发布的黄皮书所指出的，在美国制造商中，大约 60% 的企业报告称，2018 年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导致了（它们）投入成本的增加。美国零售商的这一比例甚至更高，达到 70%。如特斯拉估计，仅在第四季度，对中国零部件征收的关税就可能高达 5000 万美元的成本。<sup>73</sup>

到目前为止，用这种以中国为目标的政策来应对主要是跨国性的问题和挑战显然是没有成效的。恰恰相反，它们往往适得其反。更糟糕的是，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敌人的话，这可能就会促使中国（真正）成为它的敌人，而这一敌人正是美国想要消除的。以美国对中海油竞购加州联合石油公司 (Unocal) 的民族主义的反应为例，通过有效地向中国人宣布北美是禁区，美国决策者“向中国现代化的管理阶层发出了完全错误的信息，并促进了中国具有高度破坏性的……倾向，包括民族主义、重商主义和对国际市场的不信任。”<sup>74</sup> 由于美国的任何立法都无法减少中国对全球生产网络的能源需求，中国似乎“在美国的政策面前别无选择，只能与所谓的“流氓国家”建立特殊的经济或外交政策关系。”<sup>75</sup> 中国的这些举动反过来又可能证实了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怀疑，即中国是全球威权国家的庇护者，从而引发相互猜疑和敌对的恶性循环。<sup>76</sup> 从一个同质的中国挑战者的形象出发，并不断对其采取行动，这样下去，华盛顿的鹰派政策制定者未来很可能成功地将中国变为一个更加团结统一的对手。

人们想知道如何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然而，如上所述，这也许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问题。更好的问题应是如何应对带有“中国”特点的跨国挑战。在不否认中国对挑战具有的责任和作用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这一挑战具有着跨国性质，而这一性质是由中国、美国和跨国资本共同构成的。正如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sup>73</sup> Bob Bryan, “Trump’s trade war with China is starting to get nasty for US companies”, *Business Insider*, (October 26,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au/trump-tariffs-china-trade-war-us-companies-prices-2018-10> (November 12, 2018).

<sup>74</sup> Harding, Harry, et al., “China Goes Global: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85 (September/October 2006), p. 64.

<sup>75</sup> Ibid.

<sup>76</sup> 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 4),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2.

所指出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消失、贫困的加剧、富人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灾难性的不受束缚的自由贸易政策。”<sup>77</sup>这种自由贸易政策帮助建立了全球性的供应链，这一链条将美国、中国和许多其他经济体共同联系在了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很显然的是，这种新型关系并没有使美中之间的利益被平等地分享。然而，这种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就不可能通过特朗普式的退入保护主义和对华采取关税战而简单地被解除，至少在不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是如此的。相反地，它需要的是采取新的方式来理解和应对相关挑战、承诺的复杂性。

除非我们超越传统的方式重新思考挑战，那么所谓的“中国挑战”就会被简单地视为国际关系中新兴崛起大国的挑战，并可能或已经将其视为了一种新时代“大国竞争”的信号，<sup>78</sup>这将会引发像在冷战期间（即使不像两次世界大战）司空见惯的左右大国关系的政策互动。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2018年10月就中国问题发表的讲话，再次被“中国”挑战的错误概念所误导，使中美关系朝着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sup>79</sup>

## 结论

本文阐述了所谓的中国挑战实际上是一种全球化挑战的反映的观点。本文认为，这一挑战，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来的挑战，更多地来自全球经济，而不是中国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民族国家本身。然而，关于“中国挑战”的强有力的论述仍在从后一种视角，从大国竞争的角度理解“中国崛起”及其伴随的“权力转移”。虽然这种地缘政治的担忧并非完全过时，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全球经济中的另一种权力转移，即从国家向跨国资本的转移，以及这种权力转移所带来的全球性挑战。

本文通过对“中国”挑战本质的再思考，有助于理解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政策层面，这种对“中国挑战”相关论述的批判性分析，旨在对某种战略提出警告，这种战略在处理一个本质上是跨国性的问题时，习惯性地将其诉诸了传统的国与国手段和外交政策。这一分析也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基础。

<sup>77</sup> Benjamin Shobert, *Blaming China: It Might Feel Good but It Won't Fix America's Economy*, Lincoln: Potomac Books, 2018, p. 3.

<sup>78</sup>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27.

<sup>79</sup> Zachary Karabell, "A Cold War Is Coming, and It Isn't China's Fault", *Foreign Policy* (October 31,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10/31/a-cold-war-is-coming-and-it-isnt-chinas-fault/>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8).

## 印度对印太外交的考虑及其局限

李莉

**【摘要】** 印度的印太外交脱胎于其东向政策，初心是为融入亚太。以莫迪 2018 年 6 月香格里拉论坛讲话为标志，印度已全面接受“印太”概念，印太外交或印太构想将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新视角和新支柱。印度的印太外交将继续重视东盟外交，尊重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印度将与美、日、澳这些“志同道合”的国家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强化互动与合作，会继续参与四国集团但会适度保持低调。尽管在应对中国崛起上印度与美国有共同利益，但印度目前仍希望在中美间采取对冲战略，不想过早选边站队，因此其印太外交将保持较强的战略自主性。印度印太外交的局限在于：印度的主要战略方向印度洋与其印太外交的主要方向——亚太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矛盾；印太本身冲击东盟的地区中心地位；以及印度同时参与四国集团和上合组织也让人感觉印度“脚踩两只船”。

**【关键词】** 印度；印太；中美印；东盟中心地位；东向行动政策

**【作者简介】** 李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研究员、世界和平论坛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印度问题、南亚安全和印度洋研究。电子邮箱：lili\_thiir@tsinghua.edu.cn。

### India's Indo-Pacific Diplomacy and Its Limitations

**Abstract:** India's Indo-Pacific diplomacy is born out of its 'Look East' policy, initially aimed at extending its influence in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Modi's June 2018 address at the Shangri La Dialogue marked New Delhi's full embracing of the Indo-Pacific concept. Thereafter, Indo-Pacific diplomacy, or such a vision, has become a new pillar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a new angle through which it is observed. India's Indo-Pacific diplomacy will continue to put emphasis 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ASEAN and respect for ASEAN's centrality in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Meanwhile, India is expected to strengthen multileve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Japan, and Australia, and continue to engage in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 – but probably keep a relatively low profile. Though it may share common interests with the US in dealing with a rising China, India so far seems to prefer hedging its bets on both China and the US, and is reluctant to choose a side too early. Consequently, India's Indo-Pacific diplomacy will maintain a relatively clear-cut strategic independence. Limitations of India's Indo-Pacific diplomacy include: the kind of competition and confusion that seems to exist between its two ambitions, i.e.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as India's paramount strategic focus, and

the Asia-Pacific as the hub of its Indo-Pacific diplomacy; ASEAN's centrality may be diminished by the Indo-Pacific; and India's simultaneous engagement with Quad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may leave the awkward impression of straddling two boats.

**Key Words:** India, Indo-Pacific, China-US-India, ASEAN centrality, Act East Policy

**Author:** Dr. Li Li is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World Peace Forum, whose specialization areas among others include India, South Asian security, and Indian Ocean studies.

2017年底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后，印太概念既成为国际政治话语构建的新动力，也成为国际关系演进的新变量，同时还是当今世界经历变革与调整的一个缩影。作为美日印澳四国集团（下称“四国集团”）中的一员，印度对印太的战略设计及其可能发挥的作用倍受瞩目，因为与日本和澳大利亚不同，印度与美国尚不存在同盟关系。从2018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下称“香会”）上的讲话来看，印度的印太构想与美国的印太战略有不少差异，其核心强调印太是地理概念而非地缘政治概念，印太不是战略也不是“小圈子”（a club of limited members），印度不搞遏制性同盟。本文将就印度对印太外交的基本考虑、背后动因和实施前景做初步探讨。

## 一、印度“印太外交”的演进过程和基本理念

尽管印度拒绝“印太战略”，但并不拒绝“印太”这一概念。事实上，印度战略界和学界对印太的讨论已十年有余，印度政府则在2012年正式接受这一概念，印度外交从此日益受到“印太”这一框架的影响，因此本文称之为“印太外交”或“印太构想”。粗略看，印度的印太外交迄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初步接受阶段（2012年-2014年）。印度学界和战略界对“印太”一词的使用最早始于2007年。<sup>①</sup>时任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IDSA）研究员的库拉那（Gurpreet Khurana）发表题为《海上航线安全：印日合作前景》的论文，称印太指包括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洋空间，沿岸国包括亚洲（含西亚/中东）和东非国家。<sup>②</sup>印度前海军参谋长阿伦·普拉卡什（Arun Prakash）于2011年撰文称，是时候创造一个新词了，即印太，它包括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他特别强调，“Indo”不是指印度而是印度洋，其与太平洋交汇的地区构成21世纪的

<sup>①</sup> David Scott, "India and the Allure of the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9, Issue 3-4 (2012), pp.166 (published on 15 September 2014).

<sup>②</sup> Gurpreet S Khurana,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1, No. 1 (Jan-Feb 2007), pp.139-153.

世界中心。<sup>③</sup>同年，印度前外秘萨仁珊（Shyam Saran）也撰文指出，印度的传统战略关注一直集中在印度洋，但随着国家利益的向东拓展，印度应将西太平洋纳入国家安全的核心区域，也就是将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战略考量。<sup>④</sup>

2012年底，印度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印度-东盟峰会上表示双方要加强合作，因为“我们的未来彼此相联，一个稳定、安全、繁荣的印太地区对我们各自的进步与繁荣至关重要。”<sup>⑤</sup>这是印度领导人首次公开谈及“印太”，表明印度政府对“印太”概念的正式接受。此后，印度外交和国防高官开始频繁谈论印太。时任印度驻美大使拉奥琪（Nirupama Rao）曾提出“核心印太”的概念，称其为“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洋空间”，包括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菲律宾海和西太平洋。<sup>⑥</sup>这实际将印太限定为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时任印度驻韩国大使毗湿奴·普拉卡什（Vishnu Prakash）直接称印度是一个“印太国家”。<sup>⑦</sup>时任印度海军参谋长乔希（Devendra Joshi）曾于2013年2月以“未来20年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为题发表公开演讲，称“印太”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战略界的讨论中，表明该地区日渐成为一个地缘战略实体。与拉奥琪不同，在他看来，印太范围更广，从非洲东海岸到“远东”和澳大利亚，涵盖亚洲、非洲和大洋洲三大洲。<sup>⑧</sup>

二是高调拥抱阶段（2015年-2017年）。2015年，莫迪政府先后与美国和日本达成重要双边文件，即：《美印关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以及《印日2025年愿景联合声明：合作促进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这是“印太外交”在印度官方正式文件中的较早呈现，标志印度对“印太”从参与讨论到推动落实。印美文件指出，两国将在“从非洲到东亚”的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构建伙伴关系，支持该地区的可持续、包容性发展，包括促进南亚、东南亚和中亚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加强与该地区第三

<sup>③</sup> Arun Prakash, "Rise of the East: The Maritime dimension", *Maritime Affairs*, Vol. 7, No. 2 (Winter 2011), pp. 1-13.

<sup>④</sup> Shyam Saran, "Mapping the Indo-Pacific," *The Indian Express*, 29 October 2011.

<sup>⑤</sup> "Opening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at Plenary Session of India-ASEAN Commemorative Summit",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December 20, 2012),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0981/Opening\\_Statement\\_by\\_Prime\\_Minister\\_at\\_Plenary\\_Session\\_of\\_IndiaASEAN\\_Comm-emorative\\_Summit](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0981/Opening_Statement_by_Prime_Minister_at_Plenary_Session_of_IndiaASEAN_Comm-emorative_Summit) (accessed October 24, 2018).

<sup>⑥</sup> David Scott, "India and the Allure of the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9, Issue 3-4 (2012), pp.168 (published on 15 September 2014).

<sup>⑦</sup> David Scott, "India and the Allure of the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9, Issue 3-4 (2012), pp.167 (published on 15 September 2014).

<sup>⑧</sup> Devendra Joshi, "Geopolitics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in the Next Two Decades", CNS Keynote Address at the Annual Maritime Power Seminar of NMF (February 21, 2013), [https://www.indiannavy.nic.in/sites/default/files/speech/CNSSpeech\\_21-02-13\\_Annual\\_Maritime\\_Power\\_Seminar\\_of\\_NMF\\_0.pdf?download=1](https://www.indiannavy.nic.in/sites/default/files/speech/CNSSpeech_21-02-13_Annual_Maritime_Power_Seminar_of_NMF_0.pdf?download=1) (accessed October 25, 2018).



方的三边磋商。<sup>⑩</sup>印日文件更是在“印太”框架下规划两国未来合作路径：一方面要深化双边的经济与安全合作，特别强调印度“东向行动政策”与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的对接；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其他伙伴国的互动，包括确认美印日三国马拉巴尔军事演习的机制化、美印日三边官方对话机制正式升格为外长级、以及启动印日澳三边官方对话。<sup>⑪</sup>2017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访印时，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互为“印太伙伴”。<sup>11</sup>同年6月印度莫迪政府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称，印美是印太地区的“民主中坚”（democratic stalwarts），两国“紧密的伙伴关系”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sup>12</sup>

2017年5月下旬，印度与日本联合提出“亚非增长走廊”（AAGC）倡议，称将联手在非洲开展质量基建、发展合作、能力建设等，“通过促进亚非发展与互联互通实现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sup>13</sup>同年11月，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在马尼拉东亚峰会前举行了司局级对话，这是2007年以来四国官方的首次再度对话，标志着当年带有安全同盟色彩的四国战略对话机制即“四国集团”的复活。亚非增长走廊的提出和四国集团机制的重启，表明印度的印太外交日益由虚向实。

三是回调构建阶段（2018年至今）。如果说之前莫迪的印太外交更多表现为与美、日等国的积极互动、甚至是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迎合，那么其2018年的香会讲话则标志着印度对外政策的整体回摆，有印度知名学者甚至称之为印度的“新万隆”（a new Bandung），即是对不结盟的一种回归。<sup>14</sup>尽管该学者的判断值得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莫迪在这次讲话中用相当篇幅阐述了印度对印太的原则性看法，即：“包容、开放、东盟中心地位与团结是新印

<sup>⑩</sup> “US-India Joint Strategic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 and Indian Ocean Regio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January 25, 2015),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4728/USIndia\\_Joint\\_Strategic\\_Vision\\_for\\_the\\_AsiaPacific\\_and\\_Indian\\_Ocean\\_Region](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4728/USIndia_Joint_Strategic_Vision_for_the_AsiaPacific_and_Indian_Ocean_Region)(accessed October 25, 2018).

<sup>⑪</sup> “Joint Statement on India and Japan Vision 2025: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Working Together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December 12, 2015),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6176/Joint\\_Statement\\_on\\_India\\_and\\_Japan\\_Vision\\_2025\\_Special\\_Strategic\\_and\\_Global\\_Partnership\\_Working\\_Together\\_for\\_Peace\\_and\\_Prosperty\\_of\\_the\\_IndoPacific\\_R](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6176/Joint_Statement_on_India_and_Japan_Vision_2025_Special_Strategic_and_Global_Partnership_Working_Together_for_Peace_and_Prosperty_of_the_IndoPacific_R) (accessed October 25, 2018).

<sup>11</sup> “India-Australia Joint Statement during the Stat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to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April 10, 2017),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8367/IndiaAustralia+Joint+Statement+during+the+State+visit+of+Prime+Minister+of+Australia+to+India> (accessed October 25, 2018).

<sup>12</sup> “Joint Statement -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Prosperity Through Partnership”,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June 27, 2017),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8560/Joint\\_Statement\\_\\_United\\_States\\_and\\_India\\_Prosperty\\_Through\\_Partnership](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8560/Joint_Statement__United_States_and_India_Prosperty_Through_Partnership) (accessed October 25, 2018).

<sup>13</sup> RIS, ERIA & IDE-JETRO: *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Vision Document* (May 2017), <http://www.eria.org/Asia-Africa-Growth-Corridor-Documents.pdf> (accessed October 25, 2018).

<sup>14</sup> Pratap Bhanu Mehta, “The Shangri-La Moment”, *The Indian Express* (June 6, 2018),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pm-narendra-modi-singapore-speech-the-shangri-la-moment-5205563/>(accessed August 6, 2018).

太的实质”。<sup>15</sup>首先，莫迪以“印太不是什么”强调了该地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印太不是战略，而是一个自然区域；印太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俱乐部（即不搞小圈子），而是涵盖区内所有国家以及在该地区有利益关切的域外国家；印太不是遏制性同盟，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应该反对大国对立，坚持多元、共存、开放与对话。其次，东南亚是印太的中心。东盟一直引领着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构建，因此为印太地区的一体化打下了基础，如东亚峰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两个重要倡议，因此印度支持印太以东盟为中心。三是应通过对话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共同地区秩序，这一秩序应该是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不分大小和强弱一律平等、以及依据国际法平等使用海洋、天空等国际公域的权力。印度信仰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四是印度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开放和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因此支持印太地区保持基于规则、开放、平衡和稳定的贸易环境。五是印度支持印太地区的互联互通，积极参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认为这种互联互通应该是促进贸易而非战略竞争。尽管莫迪有关印太的表态仍然过于笼统，但还是指明了印度印太外交的总体方向，相信其具体政策的构建仍需要一个过程。

## 二、印度“印太外交”的内在动力与战略逻辑

印度“印太外交”的发展是个渐进过程，其背后动因较为复杂，既是印度自身崛起的战略需要，也是印度对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特别是权力转移的回应与利用。总体而言，可概括为融入亚太、深化印美关系和应对中国崛起三大考虑，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大考虑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

（一）印度接受“印太”首先是融入亚太。印度的印太外交脱胎于其东进战略。<sup>16</sup>印度东进始于1990年代初，最初名称为“东向政策”（Look East，又译“向东看”）。此后，该战略不断拓展，经历了从经济到安全、从双边到多边、从东盟到东亚再到亚太的复合演进与升级，体现了印度国力和地区影响的提升，也越来越成为印度对外战略的一根重要支柱。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日渐增强，其对亚太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并认为印度的崛起与其融入亚太的程度密切相关。2012年2月，印度时任外秘马塔伊（Ranjan Mathai）明确表示，“印度东向政策发展到今天，其基本逻辑就是，印度必须与更多的亚洲伙伴以及世界其他伙伴联系起来，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命运。我们认为印度的未来及经济前途取决于我们融入亚洲的程

<sup>15</sup>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accessed August 6, 2018).

<sup>16</sup> 李莉：“印度东进战略与印太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第37-45页。

度”。<sup>17</sup>同期推出的、备受媒体关注的印度智库报告《不结盟 2.0: 21 世纪印度的外交与战略政策》也称, 亚洲是经济机会、秩序建设、大国博弈、海上竞争的“主战场”与战略决策的关键所在。<sup>18</sup>

然而, 印度要真正融入亚太, 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亚太”一词本身, 因为亚太是一个成熟的地理和地缘政治概念, 印度很难在其中现身。而“印太”却从根本上突破了这一瓶颈, 让印度自然融入该地区, 并从边缘走向中心。印度时任驻美大使拉奥琪指出, “以前的亚太概念特意将印度排除在外, 如今印太这个词则让次大陆成为东方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sup>19</sup>印度前海军参谋长阿伦·普拉卡什也称, 亚太一词“将印度边缘化”, 而“印太”一词使印度成为该地区“核心国家中的一员”。他并指出, 印太就是指“马六甲海峡两端、从印度到西太平洋的地域”。<sup>20</sup>有印度学者因此称“印太”是“3.0 版的东向政策”。<sup>21</sup>2014 年莫迪执政后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表明印度全面参与亚太事务的决心。有人因此将莫迪的“东向行动政策”称为“印度的新亚太政策”,<sup>22</sup>也有人视之为“印太外交”。<sup>23</sup>即便是四国集团 2017 年 11 月会晤后印度所发的新闻稿也强调, 印度将其“东向行动政策”作为其与印太地区接触的基石。<sup>24</sup>由此可见, 如果说印度最初接受“印太”概念时, 其心目中的印太不过是“包含了印度的亚太”, 其印太外交无异于升级到亚太外交阶段的东进战略, 那么即便是当下, 印度仍更多以东向行动政策的视角看待印太外交。

(二) 印度拥抱“印太”与不断深化的印美战略合作密不可分。印度对“印太”概念的拥抱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启以来日益提速的印美战略互动几乎同步, 而印度“印太外交”的演变与起伏也反映着印度对与美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战略一致前后政策出现的一些微调。印

<sup>17</sup> “Speech by Foreign Secretary on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at the 10th Meeting of the BCIM Cooperation Forum, Kolkot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February 18, 2012), <http://mea.gov.in/outgoing-visit-detail.htm?18855/Speech+by+Foreign+secretary+on+Indias+Look+East+Policy+at+the+10th+Meeting+of+the+B+CIM+Bangladesh+China+India+Myanmar+Cooperation+Forum> (accessed August 6, 2018).

<sup>18</sup> Sunil Khilnani, et al.,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India (February 2012), pp.12, <http://www.cprindia.org/research/reports/nonalignment-20-foreign-and-strategic-policy-india-twenty-first-century> (accessed August 11, 2018).

<sup>19</sup> David Scott, “India and the Allure of the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9, Issue 3-4, 2012, pp.169 (published on 15 September 2014).

<sup>20</sup> David Scott, “India and the Allure of the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9, Issue 3-4, 2012, pp.168-169 (published on 15 September 2014).

<sup>21</sup> D Suba Chandran, “The Indo-Pacific: India's Look East 3.0,” Article (ICPS)(March 14, 2013), <http://www.ipcs.org/article/india/the-indo-pacific-indias-look-east-30-3843.html> (accessed November 28, 2017).

<sup>22</sup> Danielle Rajendram, “India's new Asia-Pacific strategy: Modi acts East,” Analysis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December 2014),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indias-new-asia-pacific-strategy-modi-acts-east.pdf> (accessed August 11, 2018).

<sup>23</sup> Chietigj Bajpae, “Dephasing India's Look East/Act East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9, No. 2, 2017, pp. 361.

<sup>24</sup> “India-Australia-Japan-U.S. Consultations on Indo-Pacific”,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November 12, 2017),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9110/IndiaAustraliaJapanUS\\_Consultations\\_on\\_IndoPacific\\_November\\_12\\_2017](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9110/IndiaAustraliaJapanUS_Consultations_on_IndoPacific_November_12_2017) (accessed August 11, 2018).

度辛格政府最初拥抱“印太”既是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美国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邀约其融入亚太的回应。2011年美国开始高调重返亚太，印度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因此美国试图将印度纳入其“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轨道。事实上，“东向行动”即英文“Act East”最早是由美国时任国务卿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提出来的。2011年7月，克林顿访印时公开支持印度的东向政策，并鼓励印度不仅“向东看”（Look East）还要“融入东方”（Engage East）并“在东方有所作为”（Act East）。<sup>25</sup>同年10月，克林顿在《外交政策》上又撰文称，“亚太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引擎，而该地区包括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的广袤区域”。<sup>26</sup>这表明，美国此时已明确将印度次大陆主要是印度纳入亚太地区。2012年6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访印时进一步指出，美国视印度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支点”。<sup>27</sup>此前，奥巴马政府还于2010年开始公开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显然，美国对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主动帮扶符合印度的战略意愿，美国对印度融入亚太的邀约符合印度的战略设计，因此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2015年至2017年印度高调拥抱“印太”的过程则与印度对美国的战略拥抱过程同步。2015年，印美不仅签署了《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还签署了为期十年的新版《印美防务合作框架协议》，确定在情报交流、反恐、防扩散、导弹防御、海上安全、军工等十几个领域加强合作。2016年，美国认定印度为其“主要军事伙伴”，允许印度在军事技术上享受美国“最紧密盟友的待遇”，<sup>28</sup>同时支持印度在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情况下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印度则在十多年的犹豫不决后最终与美国签署了《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LEMOA）。此举成为印度偏离不结盟、在战略安全上向美国倾斜的重要标志。同年6月莫迪访美时还应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他称印美是“相互拥抱的伙伴关系”（embracing partnership），“一个强大的印美伙伴关系能够确保从亚洲到非洲、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和平、繁荣与稳定”。<sup>29</sup>因此，当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美国的印太战略后，印度最初的积极回应既是其多年来在融入亚太问题上与美国频繁互动的结果，也是莫迪政府近年战略拥抱美国的体现。尽管2018年莫迪香会讲话说明印度的印太外交有所回摆，重新强调印度的战略自主性，

<sup>25</sup> Robert M. Hathaway, “India and the US Pivot to Asia,” *YaleGlobal Online* (February 24, 2012),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india-and-us-pivot-asia> (accessed August 11, 2018).

<sup>26</sup>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accessed August 11, 2018).

<sup>27</sup> “US says India ‘lynchpin’ of rebalancing strategy,” *The Indian Express*, 7 June 2012.

<sup>28</sup> “Text of Indo-US Defense Framework Agreement 2015”, *India Strategic* (June 2015), [http://www.indiastrategic.in/topstories3823\\_Text\\_of\\_Indo\\_US\\_Defense\\_Framework\\_Agreement\\_2015.htm](http://www.indiastrategic.in/topstories3823_Text_of_Indo_US_Defense_Framework_Agreement_2015.htm)(accessed August 11, 2018).

<sup>29</sup> “Full Text of PM Narendra Modi’s historic speech in the US Congress”, *India Today* (June 9, 2016), <https://www.indiatoday.in/world/story/full-text-of-pm-narendra-modis-historic-speech-in-the-us-congress-13124-2016-06-09> (accessed August 11, 2018).

但并不意味着印美战略和安全合作的停摆。事实上，香会不久即2018年9月，印美举行首次外交和国防“2+2”对话，签署《通信兼容安全协议》(COMCASA)，宣布2019年两国将举行首次三军联合军演，并再次确认加强印太合作。<sup>30</sup>因此，印度印太外交近来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只是对其前期过早倒向美国倾向的一种回调，但印美深化战略与安全合作的趋势并未逆转。

(三)印度的“印太外交”是为应对中国崛起。毋庸置疑，美、日、印、澳等国所推动的印太合作，无论是双边、三边还是四边，应对中国崛起都是其一个重要共识和基本动力。早就有学者指出，“印太”并非一个中性词汇，其被构建出来就是为对冲可能出现的由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尽管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更多出于一种集体性的“地缘政治想象”。<sup>31</sup>至于美日印澳四国集团，2007年5月四国首次对话时，就因其明显针对中国且具有较强的同盟色彩而招致中方的抗议，澳大利亚和印度国内也因此引发较大争论，最终相继退出。2017年底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臆断“中国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推广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以构建有利于中国的地区秩序”。因此，该报告号召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加强合作，包括加强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支持印度成为“全球性大国”、以及扩大美印战略与防务合作，以维护共同利益和美国的领导地位，阻止该地区发生不利的变化。<sup>32</sup>在此背景下，印度与美、日、澳所开展的印太合作无疑带有很强的“制华”色彩，而以2015年《美印关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以及《印日2025年愿景联合声明》为例，两个文件都就所谓“南中国海自由航行和飞越”问题联合发声，其意涵不言自明。

就印度自身而言，由于中印间尚有未决的领土争端，同时中国又是印度周边与之接壤的唯一大国，如何与中国相处，特别是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长时间以来就是其对外战略面对的优先课题。因此，“印太外交”从一开始就被印度战略界赋予很多“中国元素”。拉奥琪当年就指出，中国的崛起改变着印太地区的安全基本面，印度必须引起重视。<sup>33</sup>多年前，所谓中国对印实施包围的“珍珠链战略”尽管捕风捉影，但却在印度战略界特别是军方占有一定市场。近年随着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存在的增加，包括印度洋反海盗护航行动、在吉布提

<sup>30</sup>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augural India-U.S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September 6, 2018),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0358/Joint\\_Statement\\_on\\_the\\_Inaugural\\_IndiaUS\\_2432\\_Ministerial\\_Dialogue](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0358/Joint_Statement_on_the_Inaugural_IndiaUS_2432_Ministerial_Dialogue) (accessed October 29, 2018).

<sup>31</sup> Chengxin Pan, “The ‘Indo-Pacific’ and geopolitical anxieties about China’s rise in the Asian regional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8, No. 4, 2014, pp. 453–469.

<sup>32</sup>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USA (December 2017), pp. 25 & 45–4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1.pdf> (accessed October 29, 2018).

<sup>33</sup> David Scott, “India and the Allure of the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9, Issue 3-4 (2012), pp.177 (published on 15 September 2014).

建立后勤补给点等,以及“一带一路”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推进,确实让长期在印度洋特别是南亚次大陆享有独特战略优势的印度感到压力。<sup>34</sup>印太外交因此有时被印方赋予非常具体的内涵。例如,2017年印度在未派代表出席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情况下,却与日本推出“亚非增长走廊”倡议,被普遍认为是制衡中国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路的重要举措。<sup>35</sup>不久前,印美“2+2”对话也再次确认,双方要加强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的合作,“支持透明、负责、可持续债务融资的基建发展”。<sup>36</sup>

### 三、印度“印太外交”的局限与挑战

“印太”是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概念,无论印度政府承认与否,其“印太外交”既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考虑,也必将产生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印度的印太外交启动时间并不长,但已显示出较大的波动性,说明其仍要经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构建过程。从目前看,印度的印太外交至少面临以下三大发展“瓶颈”:

一是印度“印太外交”的范围界定存在模糊性和矛盾性。如前所述,印度“印太外交”的初心是为融入亚太,因此其印太外交的实质是亚太外交,即印太外交的重点应该是亚太。然而,根据2015年印度分别与美国和日本达成的两个重要政府间双边文件、以及2017年印日联合提出的“亚非增长走廊”倡议,印度的印太外交实际涵盖了“从非洲到东亚”的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根据莫迪的香会讲话,印太地区更是包含了“从非洲海岸到美洲海岸”的大片区域。<sup>37</sup>清晰界定印太外交对印度的意义在于,印度是印度洋国家,其国家安全战略重点首先应该在印度洋,如若印太将印度洋与亚太连为一片,那么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点会否有所变化?2015年印度海军公布的《印度海洋安全战略》明确指出,印度的首要海洋利益区是印度洋,包括:(1)印度海岸地区和海洋区域;(2)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安达曼海及其沿岸地区;(3)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4)阿曼湾、亚丁湾、红海及其沿岸地区;(5)西南印度洋(含印度洋岛国及非洲东海岸地区);(6)进出印度洋的咽喉要道;(7)其他涉及印度海上通道和重要能源和资源利益的区域。而连接太平洋的东南印度洋、南海和东海、西

<sup>34</sup> Abhijit Singh, “China’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India”, *War on the Rock* (August 21, 2017),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7/08/chinas-military-base-in-djibouti-strategic-implications-for-india/> (accessed August 11, 2018).

<sup>35</sup> “India, Japan come up with AAGC to counter China’s OBOR,” *The Economic Times*, 26 May 2017.

<sup>36</sup>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augural India-U.S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September 6, 2018),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0358/Joint\\_Statement\\_on\\_the\\_Inaugural\\_IndiaUS\\_2432\\_Ministerial\\_Dialogue](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0358/Joint_Statement_on_the_Inaugural_IndiaUS_2432_Ministerial_Dialogue) (accessed October 29, 2018).

<sup>37</sup>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accessed August 6, 2018).

太平洋等则被列为印度的次要海洋利益区。<sup>38</sup>因此，意在“东进”的印度印太外交，使印度在如何平衡其印度洋战略重点与前出亚太上面临挑战。

同时，如若印度的印太外交将印度洋涵盖其中，还意味着印度接受美、日、澳等国在印度洋地区建立更多的军事存在，而这与印度多年形成的大战略有所冲突。印度著名战略思想家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曾指出，印度大战略将世界划分为以印度为圆心的三大同心圆：第一个同心圆覆盖与其直接接壤的邻邦。在这个同心圆中，印度追求主导地位，拒绝外部势力介入。第二个同心圆涵盖广义周边即大周边，包括亚洲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印度在其中寻求平衡其他大国在此的影响，阻止后者侵占其利益。第三个同心圆包括整个世界舞台。印度在此争取大国地位，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sup>39</sup>近年，印度通过推动建立印度洋海军论坛和推进环印度洋联盟（前身为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开展务实合作，有意凸显自身在印度洋的领导地位。然而，印太外交却使印度与美、日等国在印度洋的安全互动日益紧密，如印美日马拉巴尔海上演习机制化、印美承诺加强在西印度洋的海上安全合作、印度支持美国成为印度洋海军论坛的观察员等，这对于印度在印度洋的地位而言，无疑是把“双刃剑”。

二是印度的印太外交冲击其东盟外交。这与“印太”概念对东盟地区中心地位的冲击直接相关。就东盟自身而言，经过多年的努力，随着东盟系列机制的建立与发展，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也逐渐确立。因此，东盟已经将维持其团结、中立、中心地位和领导地位，作为自己处理内外政策的战略目标。<sup>40</sup>然而，美国印太战略出台后，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作用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因此东盟对“印太”反应异常谨慎，其拟议中的共同立场文件迟迟未能出台。<sup>41</sup>在2018年初印度东盟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上，联合宣言也未提及“印太”。<sup>42</sup>综合看，“印太”主要在三个方面挑战东盟的地区中心地位：一是印太的范围过大，东盟要发挥“小马拉大车”的作用难上加难。讲到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主

<sup>38</sup> Indian Navy, *Ensuring Secure Seas: Indian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15), [http://indiannavy.nic.in/sites/default/files/Indian\\_Maritime\\_Security\\_Strategy\\_Document\\_25Jan16.pdf](http://indiannavy.nic.in/sites/default/files/Indian_Maritime_Security_Strategy_Document_25Jan16.pdf) (accessed November 5, 2018).

<sup>39</sup> C. Raja Mohan, "Ind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06-07-01/india-and-balance-power> (accessed November 5, 2018).

<sup>40</sup> "Nay Pyi Taw Declaration on the ASEAN Community's Post 2015 Vision," *Nay Pyi Taw* (November 12, 2014), 转引自周士新：“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6期，第30页。

<sup>41</sup> "ASEAN crafts position on U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Nikkei Asian Review* (August 2, 2018),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ASEAN-crafts-position-on-US-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 (accessed November 5, 2018).

<sup>42</sup> "Delhi Declaration of the ASEAN-India Commemorative Summit to mark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ASEAN-India Dialogue Relation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January 25, 2018),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9386/Delhi\\_Declaration\\_of\\_the\\_ASEANIndia\\_Commemorative\\_Summit\\_to\\_mark\\_the\\_25th\\_Anniversary\\_of\\_ASEANIndia\\_Dialogue\\_Relations](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9386/Delhi_Declaration_of_the_ASEANIndia_Commemorative_Summit_to_mark_the_25th_Anniversary_of_ASEANIndia_Dialogue_Relations) (accessed November 5, 2018).

要是指东亚地区。有关该地区经济一体化、地区安全架构的讨论已进行多年,由东盟主导的各种机制建设也受到相关各方特别是地区各大国的支持。如果印太地区包括印度洋,显然现有的东盟系列机制缺乏足够的代表性,东盟“小马拉大车”的能力也会被进一步稀释。二是美国所推动的印太合作更加看重印度的作用,客观上也造成印度与东盟在印太中心地位上的竞争关系。最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8处提到印度,仅有1处提到东盟,从篇幅看二者差距更是明显。三是美日印澳“四国同盟”既挑战东盟的地区领导力,也冲击东盟系列机制所推动的地区安全合作理念。四国同盟中既有美国这样的当今世界领导国,也有日、印、澳这样的中等强国,若论领导力,东盟显然处于劣势。同时,四国同盟强调一致的民主价值观,具有较强的安全结盟倾向,与东盟系列机制所推动的包容性、合作安全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并有可能成为地区安全架构的一个新选项。

东盟国家是印度的重要周边延伸,其中缅甸还与印度有陆上边界,泰国和印尼则与印度在海上接壤。印度的东向政策已实行26年,东盟国家始终是核心;而印度要融入亚太,东盟系列机制如“东盟+印度”、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也都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东盟外交或东向政策在印度对外政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面对东盟国家对“印太”的疑惧,印度政府反复强调尊重东盟的中心地位。2017年11月莫迪就对东盟表示,“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以东盟为中心,东盟在印太地区安全架构中的核心地位显而易见”。<sup>43</sup>继莫迪在香会上大篇幅论述东盟的中心地位后,不久前召开的印美“2+2”对话也强调印太地区以东盟中心地位为基础。<sup>44</sup>尽管如此,更加注重与美、日、澳等大国协调的印度印太外交与其传统意义上的东盟外交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印度如何化解这一矛盾也将影响其印太外交的走向。

三是印度的印太外交受制于其对冲战略。近年,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加强,印度的对外战略日益表现为一种对冲性。所谓对冲战略,是一种抵消性的国家对外战略选择,简单来说就是左右逢源、两面下注。具体到印度而言,其对冲战略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印度在中美间的战略对冲,二是印度在区域和多边层面的战略对冲。尽管印度与美国的战略与安全互动不断深化,总体而言,印度依然试图与中美同时保持接触,以在中美战略竞争中

<sup>43</sup> “Opening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at 15th ASEAN-India Summit, Manil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November 14, 2017),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113/Opening\\_Statement\\_by\\_Prime\\_Minister\\_at\\_15th\\_ASEANIndia\\_Summit\\_Manila\\_November\\_14\\_2017](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113/Opening_Statement_by_Prime_Minister_at_15th_ASEANIndia_Summit_Manila_November_14_2017) (accessed November 5, 2018).

<sup>44</sup>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augural India-U.S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September 6, 2018),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0358/Joint\\_Statement\\_on\\_the\\_Inaugural\\_IndiaUS\\_2432\\_Ministerial\\_Dialogue](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0358/Joint_Statement_on_the_Inaugural_IndiaUS_2432_Ministerial_Dialogue) (accessed October 29, 2018).



维持中间位置。中印两国领导人的武汉非正式会晤，表明印度不想过多或过快倒向美国，依然愿意与中国保持平稳关系和开展务实合作。其后，印美开展“2+2”对话并签署《通信兼容安全协议》，也说明印美安全合作并未实质性减速。因此，莫迪的香会讲话是对印度此前在中美间“选边站队”倾向的一种纠偏，其在中美间的战略对冲要求其对于印太的解读为非排他性和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在区域和多边层面，印度的对冲战略集中体现在其同时参加四国集团和上合组织上，即在多边安全架构上“脚踩两只船”。有印度学者指出，四国集团意在平衡中国，限制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而上合组织的发展却会削弱美国的全球政治影响，如上合组织希望成员国关闭美国在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此外美国对印度在上合组织中加强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也感到不满。<sup>45</sup>还有印度学者从陆地和海洋的角度看待这两个组织，认为上合组织构建的是欧亚大陆秩序，四国集团和印太则构建着海洋秩序。尽管上合组织与四国集团间存在着突出矛盾，但印度必须在其所代表的两种秩序中保持对冲。<sup>46</sup>细读莫迪的香会讲话，字里行间流露着印度的战略自主，但这种战略自主更多是其对冲战略的体现，因此其稳定性易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 四、结论

以莫迪 2018 年 6 月香会讲话为标志，印度已全面接受“印太”概念，印太外交或印太构想将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新视角和新支柱。印度的印太构想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具有不少差异性：一是印度的印太外交核心仍是融入亚太，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印度仍将重视参与“东盟+印度”、东亚峰会等东盟系列机制，尊重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中心作用。同时，印度也将继续拓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互动与合作。因此，印度的印太构想似乎更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二是印度的印太外交将同时重视与美、日、澳这些“志同道合”（like-minded）国家在双边、三边和四边层面的合作，印美双边安全和战略合作将持续强化，印日“亚非增长走廊”等印太合作倡议也会不断推进，印美日、印日澳等三边互动也会加强，美日印澳四国集团也将保持定期会晤并探讨务实合作，但对四国集团同盟化和军事化的趋势印度恐怕会有所保留，以防止其成为“遏制性同盟”或小圈子。三是尽管在应对

<sup>45</sup> Atul Bhardwaj, "Sailing in Two Boats: India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and Indo-Pacific 'Quad'",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53, Issue No. 43 (October 27, 2018), <https://www.epw.in/journal/2018/43/strategic-affairs/sailing-two-boats.html> (accessed October 29, 2018).

<sup>46</sup> C. Raja Mohan, "From Indo-Pacific to Eurasia", *The Indian Express* (June 9, 2018); C. Raja Mohan, "Remapping India's geopolitics", *Seminar*, #701 (January 2017), [http://www.india-seminar.com/2018/701/701\\_c\\_raja\\_mohan.htm](http://www.india-seminar.com/2018/701/701_c_raja_mohan.htm) (accessed October 29, 2018).

---

中国崛起上印度与美国有共同利益，但印度目前仍希望在中美间采取对冲战略，不想过早选边站队，因此其印太外交将保持较强的战略自主性。然而，印度在推进印太外交的过程中，仍要回答几个关键性问题，即：如何平衡其主要战略方向印度洋与其印太外交主要方向——亚太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其自身崛起对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中心地位”的冲击；如何处理其东盟外交、上合组织外交与四国集团外交之间的矛盾。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印度印太外交的走向无疑对该地区力量结构变化和安全秩序转型会产生重要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 国内政治、对外政策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

韩召颖 赵倩

**【摘要】**近年来，国内政治层次在对外政策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领域的共同推动下，形成了一个要素庞多、交互复杂的知识网络体系，但却很少有研究兼顾宏观与微观双视角下去探究、梳理、整合这个知识体系。通过考察相关经典文献与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本文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内政治解释进行类型化的分析，从宏观上寻找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从微观上探索各变量的操作化进展。各变量在对外政策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和深入程度存在差异，其中政体、观念等是两个领域的交互关系较深的变量，而行为体相关变量主要由对外政策分析领域推动，一些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直接套用了这些研究成果。两个领域间相互推动发展的这种关系，不仅使国际关系研究不再只强调单方向、单层次的分析方法，而且互动与跨层次分析的成果也越来越丰富。

**【关键词】** 国内政治；国际体系；对外政策分析；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简介】** 韩召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天津海河教育园同砚路38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邮编300350，电话13662161279，电子邮箱 zhaoyinghan@nankai.edu.cn；

赵倩，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海河教育园同砚路38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电话15122575962，电子邮箱 zhaopian@mail.nankai.edu.cn。

##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tudies in the fields of both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n China's domestic level have increased. However, these increases in studies have not been well received. Our research reviewed the related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 over the past decade, seeking to find correlations among the various domestic factors and explore the progress of the operationalization of several variables.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regime type and beliefs are the two variables which have been well studied in both of the fields o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at variables related to actors have been studied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that new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both the studies have been adopted into the paradig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se new developments have generally stimulated multilevel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 Chinese domestic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uthors:** Han Zhaoying is Professor at the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Nankai University. Zhao Qian is a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Nankai University.

对于国内政治层面,学科中两大分支领域——对外政策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在所持立场、变量选择、操作机制上存有差异的同时,又呈现出交互发展的态势。20世纪60年代,对外政策分析学者率先发展了基于国内政治层面的国家对外行为研究,临近9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虽逐渐接纳国内政治变量,但在国内政治是否应纳入到体系研究这一问题上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一些体系论者认为,尽管单元层次能够为国家对外行为提供更加细节的解释,但理论建构的要义之一是简洁,其目的是确定最核心的、最有效的解释变量,而不是建立一个复杂的变量集合,因而他们对单元层次变量引入到体系问题的研究中持消极态度。<sup>①</sup>与其意见相左的学者则通过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间的跨层次或双层次研究来证明国内政治对于解释国际关系问题的重要意义。这些研究成果覆盖国内政治的众多维度,使国内政治层次研究成为了一个要素庞多、交互复杂的知识网络体系。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存在争议,国内政治变量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成分。以《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期刊为例,检索近10年的论文摘要就不难发现,超过一成的文章将国内政治作为关键自变量去解释体系层面问题,这还不包括那些将国内政治作为中间变量或辅助变量的文章。总体而言,国内政治变量的研究进展迅速、所涉问题宽泛,但微观层面上各要素的研究方向与进程是不同的,具体表现在对外政策分析领域与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关于国内政治变量的态度、选择与操作上的差异。基于此,讨论国内政治的重要性时,宏观解读固然重要,微观分析也应该有所体现,这就需要从变量维度上把握两大领域探索国内政治变量解释国际关系问题时的研究脉络。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少之又少,且由于受到时间和视角限制,其成果也差强人意。有的研究基于国际体系层面,以满足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发展需要为前提,肯定或否定国内

<sup>①</sup>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1996, pp. 54-57;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8页。

政治层面某些特定变量的研究价值,或者从整体上讨论国内政治的研究意义。<sup>②</sup>也有部分研究基于国内政治层面,以解释国家对外行为为目的,讨论国内政治行为体在国际关系背景下的行为方式和作用。<sup>③</sup>还有学者从研究方法入手,以理解与解释、整体与个体为划分依据,整合对外政策分析中国内政治变量的分析路径。<sup>④</sup>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在分析国内政治变量的发展与价值时陷入两个误区:一是仅着眼于国际关系理论或对外政策分析中某个领域,评价体系的目的性和分区感高于对国内政治本身的考察,没有体现出国内政治层面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价值;二是缺少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个别的研究视野,以至于不能全面把握变量种类,深刻理解理论内核,也就不能形成网络状、立体化的层次研究体系。

因此,本文从对外政策分析和国际政治理论两大领域在国内政治变量的操作上入手,将研究视角锁定在变量层级,尝试对国内政治变量进行类型化分析,宏观上分析它们间交互关系,微观上把握它们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的差异,以期更好地了解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内政治层次的研究轨迹与状况,厘清其研究路径,确定其研究价值与意义。基于此,本文综合经典文献与近期成果,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内政治变量进行归类整理与分析。首先,追根溯源,从对外政策分析领域的研究中,界定国内政治的基本内涵,框定国内政治变量的基本类型;其次,梳理国际关系理论中与国内政治相关的范式,对比得出两个领域在变量选择和操作上的交互关系;再次,对国内政治变量进行类型化分析,寻找各变量在两个领域中的定位,肯定某些变量对两个领域交互发展做出的贡献;最后,探讨在双层次互动背景下的对外政策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一、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分析

20世纪50年代初,行为科学研究方法开始影响美国政治学研究并流行起来,从而为对

---

<sup>②</sup> 代表性论著有: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4-172;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 1997, pp. 513-553; David Zaret, "What Does Realist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Tell Us about Realist Theor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3, No. 3, 2017, pp. 618-637; Jack S. Levy, "Domestic Politics and War",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1988, pp. 653-673; Colin Elman, "Horse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1996, pp. 7-53.

<sup>③</sup> 代表性论著有: Valerie M. Huds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 No. 1, 2005, pp. 1-30; Ole R. Holsti,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3, No. 1, 1989, pp. 15-44; 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No. 1, 1998, pp. 289-313.

<sup>④</sup> 代表性论著有: 李志永: "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 《外交评论》, 2011年第6期, 第90-110页。

外政策分析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至60年代末,三大奠基之作——《决策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方法》、《国际政治背景下人与环境关系假设》以及《对外政策的前理论与理论》——先后问世,对外政策分析(又称比较对外政策)作为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诞生了。<sup>⑤</sup>对外政策分析领域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60至70年代初,学者们多以个人和集团为研究对象,建立了诸如知觉理论、官僚政治模型、小集团思维等经典中层理论;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行为主义遭受质疑和批评,对外政策分析领域也呈现衰落之态,但研究并未中断,学者们对既有理论进行了中层和微观上的更深入、更细致地研究;90年代之后,国际局势出现改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供的解释面临挑战,国际关系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对外政策分析的成果与研究方法也收获了更多的肯定。<sup>⑥</sup>对外政策分析主要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即决策机制与过程、决策环境以及比较对外政策,它们多以具体的国内行为体为研究对象,变量选择相对丰富,解释机制相对完整,成为推动国内政治变量研究发展的中坚力量。

纵观整个发展历程,对国内政治的定位由自变量转为因变量再到双层互动,这一过程中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层次分析方法将单元层次与体系层次相区别,单元层次强调国家特质,侧重分析国家内部的结构特征,试图解释国家的对外决策行为问题。<sup>⑦</sup>所谓国内结构特征,就是一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它能为国家的目标、动机、目的等问题提供更具细节、更为深刻、也更有张力的解释。<sup>⑧</sup>早期对外政策分析从微观角度定义国内政治,关注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及其互动,很少涉及国内制度要素。<sup>⑨</sup>这种研究偏好引起的是对当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中基本假定的挑战。

在对外政策分析蓬勃发展的70年代,有学者评估了当时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状况,指出现实主义占据学科的主导地位,其基本假定——国家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是研究开展的前提。<sup>⑩</sup>然而,对外政策分析的研究视角决定了国家不能被假定为黑箱,宏观上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国家理性行为的动机,取而代之的是将低层次行为体作为研究对象,从国内利益分

<sup>⑤</sup> Walter Carlsnaes, "Foreign Policy",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13, pp. 298-325.

<sup>⑥</sup> 韩召颖:《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5页。

<sup>⑦</sup>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80-95; 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8, pp. 427-460.

<sup>⑧</sup> J.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14, No. 1, 1961, pp. 77-92.

<sup>⑨</sup> 王鸣鸣:《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sup>⑩</sup> James N. Rosenau et al., "Of Syllabi, Texts, Students, and Scholarshi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me Data and Interpretations on the State of a Burgeoning Field", *World Politics*, Vol. 29, No. 2, 1977, pp. 317-321; Helen V. Milner, "Rationalizing Politics: The Emergenc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4, 1998, pp. 762-764.

配结构分析国家行为。<sup>11</sup>因此,在对外政策分析中,国内政治研究强调的是通过复杂的政治系统和过程,行为体将信念、资源、职责等特质融入到利益诉求中,并作用于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sup>12</sup>然而这些行为体发挥作用的程度、机制和条件是不同的,他们只能通过成为或影响决策单元的途径才能实现既定目标,<sup>13</sup>因此就需要一般行为体和决策单元。

根据数量和影响方式,行为体可归为四种类型。根据数量划分,国内行为体可分为个人和集团(如图1所示),如领导人、顾问、政府官员等都属个人行为体,政府机构、政党、利益集团等多人组成的团体则归为集团行为体。<sup>14</sup>依据行为体对决策的影响来分,领导人、执政党、内阁等政治属性行为体对决策产生直接作用,而媒体、公众、利益集团等社会属性行为体通常经由施压、游说等方式间接影响政府决策。那些能够对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行为体通常会成为对外政策分析中决策范式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决策单元,它包含三种类型:领导人、内阁(核心决策集团)、执政联盟。<sup>15</sup>一个国家的决策单元是谁,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制约体系。

在对外政策分析中,研究对象的类型决定了理论的建模路径。常见的对外决策模型,如官僚政治、小集团思维等,均是基于决策单元的视角建立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应用于解释国家的对外政策产出。而那些一般行为体的作用机制通常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作用于决策单元才能成立,例如,公众舆论仅在特定环境(如权力结构)、特定时间(如竞选周期)、特定条件(如重大危机)下才能发挥作用<sup>16</sup>。结合对外政策分析的三个范式来看,国内行为体是理论逻辑的基点,其中决策单元是决策机制的研究对象,一般行为体则提供了一些中间或辅助变量,而决策单元与一般行为体的互动关系成为研究决策环境的核心。

<sup>11</sup> Ole R. Holsti,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3, No. 1, 1989, pp. 15-44.

<sup>12</sup> Jon Hovi, Detlef F. Sprinz and Arild Underdal, "Implementing Long-term Climate Policy: Time Inconsistency,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narchy",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9, No. 3, 2009, p.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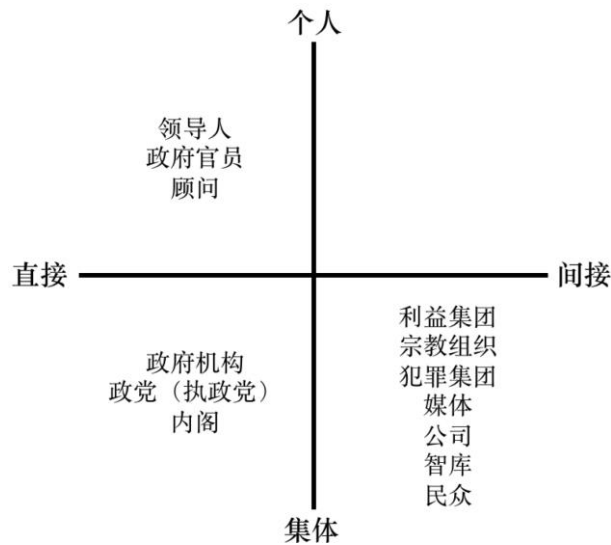
<sup>13</sup> Margaret G. Herman, "How Decision Units Shape Foreign Polic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 No. 2, 2001, pp. 47-80.

<sup>14</sup> Valerie M. Huds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pp. 144-153.

<sup>15</sup> Ryan K. Beasley et al., "People and Processe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 No. 2, 2001, pp. 217-250.

<sup>16</sup> Alastair Smith,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2, No. 3, 1998, pp. 623-638; 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图 1：国内行为体的归类



需注意的是，在众多行为体中，领导人是个人，也是国家机关，它集个人层次和国内政治层次于一身，既可以被看作是带有个人意识与偏好的行为体<sup>17</sup>，也能看作是协调各方的决策单元或其成员<sup>18</sup>。个人层面的研究强调个体特征在决策过程中的投射，侧重对领导人的个人经历、心理、情绪、性格、风格等要素的分析。<sup>19</sup>而国内政治层面的研究偏重于领导人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对环境的应激反应，领导人是独立的决策单元，又或是“多头政治”<sup>20</sup>中的重要一员，他需要在国际和国内双重压力下开展活动。<sup>21</sup>

对外政策分析领域的研究多是以行为体为研究对象，探索在国际和国内环境中，行为体自身拥有的变量会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这些行为体或直接参与到决策中去，成为决策

<sup>17</sup> Margaret G. Hermann,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Us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4, No. 1, 1980, pp. 7-46.

<sup>18</sup> Ryan K. Beasley et al., "People and Processe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 No. 2, 2001, pp. 217-250.

<sup>19</sup> 相关研究可参见：Neta C.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4, 2000, pp. 116-156; Stephen Benedict Dyson, "Person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Tony Blair's Iraq Decis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2, No. 3, 2006, pp. 289-306; Michael C. Horowitz and Allan C. Stam, "How Prior Military Experience Influences the Future Militarized Behavior of Lea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3, 2014, pp. 527-559; Shale Horowitz and Steven B. Redd, "Leadership Preferences in Ethno-Territorial Disputes: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3, No. 4, 2017, pp. 950-967.

<sup>20</sup> [美]海伦·米尔纳著：《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曲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13页。

<sup>21</sup> 相关研究可参见：Robert Jervis, "Do Leaders Matter and How would We Know?",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2, 2013, pp. 153-179; Margaret G. Hermann et al., "Who Leads Matters: the Effects of Powerful Individual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 No. 2, 2001, pp. 83-131.



单元,又或通过施压或影响决策单元,间接作用于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无论通过那种路径,不同行为体所涉及的变量及其操作模式是不同的。概括来看,对外政策分析为国内政治提供了一种以行为体为基础的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内涵,它强调的是,国家内部行为体在将自己的利益追求诉诸到国家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其相关变量的作用机制。这一内涵是基于微观层面上对国内政治的理解,因而使得对外政策分析成为沃尔兹所说的“提供更加细节的解释”的领域,它缺少对向研究,仅解释国家单向输出对外政策的过程。这种情况在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政体这一变量之后发生改变,用国内政治变量解释国家互动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起来。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内政治变量

20世纪80、9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开始接纳、重视国内政治变量,<sup>22</sup>不仅得益于学者们打破现实主义基本假定的束缚,<sup>23</sup>也是因为层次的互动关系研究有所进展。在现实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时,国家被视为忽略其内部属性的“黑箱”,国内政治并不在体系理论的研究视野内。70年代末,古诺维奇(Peter Gourevitch)运用“颠倒的第二意象”一词,论述了国际体系对一国国内政治的影响,<sup>24</sup>这项研究使体系和单元层次互为各自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建立了两者的单向作用关系。80年代末,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解释国家的政策制定时,提出双层博弈概念,指出国家政策是国内与国际双层互动的结果,<sup>25</sup>成为跨层次和层次互动研究的基础理论。纵观这一研究进程,体系层次和国内政治层次之间的关系由不相关到单向作用再到双向互动,跨层次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越来越普遍。<sup>26</sup>

然而,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发展来看,国内政治单独作为自变量的解释框架并不多见,它们多充当一些范式的中间变量。防御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内政治变量当作中间变量来操作。建构主义在推动观念变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发展上起到重要作用,但其理论建构起点是个人层次观念,随后上升至单元层次的共有观念(文化),最后再解释

<sup>22</sup> Juliet Kaarbo, "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erspective on the Domestic Politics Turn in IR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7, No. 2, 2015, p. 193.

<sup>23</sup> Helen V. Milner, "Rationalizing Politics: The Emergen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4, 1998, p. 765.

<sup>24</sup>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2, No.4,1978, pp.881-912; Stephen D. Krasner, "Revisiting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prepared for a conference in honor of Peter Gourevit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April 23-24, 2010.

<sup>25</sup> 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8, pp. 427-460.

<sup>26</sup> Stephen Chaudoin, Helen V. Milner and Xun Pang,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Linking Complex Interactions with Empir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9, No. 2, 2015, pp. 275-309.

体系问题。共和自由主义提出的民主和平论是为数不多的将政体这一国内政治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解释框架中的。还有马克思主义、替罪羊假设（又译为“战争转移理论”，英文 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等学说也基于国内政治层面研究国家的对外行为。下文概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个范式对国内政治变量的选择与操作，并对比对外政策分析的研究成果，观察在这些变量上两个领域交互发展的状况。

### （一）现实主义理论

自第一次论战以来，现实主义试图回答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从最初将权力视为解释国际关系的圭臬<sup>27</sup>，到后来探究权力结构的形态和转变，现实主义流派甚少触及单元层次，即便有，也多是为了阐明该层次在解释国际政治上的局限。正如沃尔兹（Kenneth Waltz）所言，还原主义是基于单元层次通过个体属性差异来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它仅能解释不同的国际结果，但是原因往往是多变且多元的，因为这种难以避免的不牢靠，它难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理论。<sup>28</sup>

尽管如此，国内政治还是出现在一些现实主义者的研究视野里，如防御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国内政治能否起作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存在分歧，态度对比鲜明的是结构现实主义中防御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两个分支。<sup>29</sup>对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如何追求安全这一问题，进攻现实主义认为，在霍布斯式的国际体系中，国家迫于结构压力不得不利用进攻确保安全，而这会使国家追求军事优势，导致螺旋式的安全困境。<sup>30</sup>相反，防御现实主义并不认为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安全的稀缺，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计算而选择采取防守或维持现状的战略。对于那些奉行扩张主义的国家，防御现实主义将其归因于国内政治。例如，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在分析冷战前后欧洲安全前景时指出，民主、社会分层、精英治理等变量才是维持欧洲和平的关键。<sup>31</sup>在防御现实主义学者的研究中，国内政治及可以充当自变量和中间变量。

此外，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另一个重视国内政治研究的现实主义分支。虽然它仍坚持体系因素是解释国际关系和对外政治的最重要变量，但它认为国家对外部环境与体系压力的解读

<sup>27</sup>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拉尔茨格拉夫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4页。

<sup>28</sup>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8页。

<sup>29</sup>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 154.

<sup>30</sup>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sup>31</sup>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1998, pp. 5-43.

与回应,需要通过单元层次的中间变量进行干预,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对外行为与结果。在这个理论范式中,国内政治被用为干预变量,<sup>32</sup>常见要素有决策者的观念与偏好、政府能力,公众舆论等<sup>33</sup>。

虽然防御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有所接纳,但却没有构建以某个国内政治变量作为核心变量的解释框架,体系层次仍是现实主义者坚守的阵地。从变量的选择上看,这些范式采用的要素多是对外政策分析的成果,甚至连变量的作用路径也多借用了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常见机制。从国内政治的内涵来看,行为体的相关变量成为现实主义吸纳的主力。总体而言,对于国内政治维度,当前一部分现实主义学者已接受了它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存在,并肯定了它的意义,但对于国内政治变量的发展而言,这些范式也仅是利用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原有机制,而没有致力于去推进变量的操作与研究。

## (二) 自由主义理论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流派不论是从基本假定还是理论建构上都更能凸显国内政治变量对于国际政治的重要性。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中,个人与集团是主要行为体,其行为受到观念、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理性的判定也就不再只局限于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开放了研究的视野与层次。对于国家,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是个人或集团组织起来的政治机构,它受制于国内外个人与集团的身份、权力、利益等要素,因此单元和个人层次上的变量自然而然地会影响、甚至决定国家的偏好与政策。自由主义的这些观点较贴近国内政治视角下的国际关系,许多理论分支也都采用了国内政治变量,典型成果有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是共和自由主义的核心,也是为数不多为对外政策分析贡献出有意义的新变量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研究之一。“政体”这一变量在民主和平论提出之前,相关研究乏善可陈,但之后便立即成为两个领域共同感兴趣的假说。它试图通过“政体”属性来分析国际和平的条件,其假设是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几乎不发生战争。<sup>34</sup>虽然该假说得到了某种程度

<sup>32</sup>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11-128页。

<sup>33</sup> Sverrir Steinsson,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the North Atlantic: Explaining Behaviors and Outcomes in the Cold War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3, No. 3, 2017, pp. 599-617; David Zarnett, "What Does Realist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Tell Us about Realist Theor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3, No. 3, 2017, pp. 618-637.

<sup>34</sup> 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 3, 1983, pp. 205-235; 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 4, 1983, pp. 323-353; 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tt,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3, 1993, pp. 624-629.

上经验事实的验证,但其内在逻辑却饱受争议。拥护者认为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制约和共同的规范准则,使得彼此之间拥有比武力更好的解决冲突的方法。<sup>35</sup>相反,质疑者从概念界定、逻辑链条和实证检验三方面提出疑问,<sup>36</sup>更有学者基于统计检验结果分析,证实了大国建立的等级关系和国际结构才是战后民主和平的关键变量,这从研究层次上直接证伪了民主和平论,<sup>37</sup>将国际战争与和平研究重新拉回到体系层面上来。但这并不能抹灭民主和平论丰富国内政治层面研究的贡献,它提出的“制度”维度变量,丰富了国内政治的内涵。

此外,还有一些自由主义分支采用了与现实主义相同的方式,直接引用了既有研究成果。例如,观念自由主义强调国家行为由国家偏好决定,而偏好则由国内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决定,这些认同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塑造,又离不开国家的地理、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sup>38</sup>又如,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也是以国内行为体作为基点架构的一种解释国家间合作的学说。功能主义认为一体化的最佳途径是实现合作的自动扩展,也就是说简单的国家联合或联邦主义并不能完全消除民族主义,需要组建不同国家间某一部门的功能合作,推进其他部门的合作,编织成一个功能性的相互依赖的网络,最终达成一体化目标。由它演进而成的新功能主义则是介于联邦主义和功能主义之间的一种理论,该假说认为实现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是功能性和政治性外溢,通过经济一体化外溢至政治一体化,最终建立超国家行为体。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机构不再是唯一的行为体,精英和政治家的贡献得到肯定,这突出了社会多元化和利益集团的作用。

自由主义对国内政治因素的发展贡献突出,它不仅唤起学者对国内政治中“制度”变量的研究热情,同时也肯定了国内行为体的作用,探讨了这些行为体的相关变量,搭建起由行为体间互动而形成的国际关系体系,提供了一种认识国际关系本质的新视角。对于制度层面而言,自由主义关注了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结构,重视政治结构和制度本身带给国家对外决策的影响,丰富了国内政治的内涵。同时它又以国内行为体为分析对象,通过这些行为体的自身属性与互动关系来解释国际体系中的复合相互依赖。总的来说,自由主义学派扩展和加深

<sup>35</sup> Jarrod Hayes, "Securitiz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Security: Nixon, India, and the Ties that Bi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6, No. 1, 2012, pp. 63-93.

<sup>36</sup> John M. Owen,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2, 1994, pp. 87-125; Jameson Lee Ungerer, "Assessing the Progres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4, No. 1, 2012, pp. 1-31.

<sup>37</sup> Patrick J. McDonald, "Great Powers, Hierarchy, and Endogenous Regimes: Rethinking the Domestic Causes of Pea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9, No. 3, 2015, pp. 557-588.

<sup>38</sup>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 1997, pp. 513-553.

了国内政治变量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发展,同时也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 (三)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在基本假定和解释机制上与前两种理论截然不同,它更强调个人和集团行为体的认知过程,通过操作观念和话语两类变量,解释微观层次上施动者(对外政策决策的精英)的行为动机以及宏观层次上对外政策的产出过程。在建构主义者的眼中,自然现实与社会现实是相区别的,在社会现实中,人具有改变现实的能动作用,其中观念在建构人的身份、利益以及影响人的行为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sup>39</sup>其实,自由主义者也曾讨论过“观念”变量的作用,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Robert Keohane)指出观念给行为体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手段关系的路线图,其中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这三种观念对行为体的活动有着重要影响。<sup>40</sup>建构主义者不仅肯定了观念的因果作用,同时还提出了观念的建构作用,认为观念可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从而确定行为体的利益,进而解释行为体的动机与目的,也就是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建构利益。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官僚政治模型中个体决策者的利益建构过程。一直以来,官僚政治模型只是建构起各个决策参与者在个体利益驱使下参与讨价还价的过程,但就利益由何而来这一问题却缺少讨论,建构主义者在这方面弥补了这种缺失。<sup>41</sup>此外,文化是建构主义者在国家层次上贡献出的新的研究思路,例如卡赞斯坦提出了安全文化学说,利用一国国内社会与法制观念来分析国家利益与身份,进而解释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sup>42</sup>

除观念变量以外,建构主义的另一分支强调的是话语建构和社会话语(social discourse),它由后实证主义和诠释派主导。建构主义者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实在工具,是理解人们思想和观念的媒介,通过对行为体的话语分析,能够得出一系列行为体的思想体系,从而解释

<sup>39</sup> David Pareick Houghton, "Reinvigorating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oward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3, No. 1, pp. 24-45.

<sup>40</sup> [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著:《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Maysam Behraves, "The Relevance of Constructivism to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rom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ly 17, 2011), <http://www.e-ir.info/2011/07/17/the-relevance-of-constructivism-to-foreign-policy-analysis/?nsukey=ll40fA8wpheo7uZboxb3ZfpqcEXhlXvsAthaJpx%2FwfrEI0KtYHTIGLAqBgjNPs1t15xaZG%2FNewKG2FWAauvZq2CqHlw%2FuWtB0g2jya5K92bpfeZnmK79OKzTB6gc1j%2BVE0LsXL8%2FPBy8SiczSA%2Btkcsk70%2FfefHjsPUaPuk55AIREd6GCqD2SiF95EeCi4Ulx9rxTLG6488uIhzIFUX8Q%3D%3D>

<sup>42</sup> 可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1995, pp. 32-64; Peter J. Katzenstein,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hn S. Duffield, "Political Culture and State Behavior: Why Germany Confounds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4, 1999, pp. 765-803.

他的行为选择。<sup>43</sup>与之相应的,在对外政策分析领域中诸如信念体系、操作码等理论均是建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

建构主义深入了微观的个人的认知和心理维度,同时又从宏观的文化视角诠释国际结构,并提出结构与施动者的互构关系<sup>44</sup>,这就使得国际关系更加动态化、循环化。对于国内政治变量的发展而言,建构主义转变了对制度的认识,提出制度既会限制行为体,同时也能被行为体制造;<sup>45</sup>它还提供了观念、语言等变量的新的解释机制,与对外政策分析领域的研究存在较高的叠合程度。总体来看,相较于“怎么样”这种决策机制问题,建构主义者在“为什么”这类行为动机问题上提供了更有价值的回答,并且在分析路径与研究方法上也同对外政策分析学者相互借鉴,共同推动了两领域的合作与相互促进。

除这三大流派外,还有一些理论也以国内政治作为变量,如马克思主义<sup>46</sup>和替罪羊假设<sup>47</sup>,同时也不能忽略“颠倒的第二意象”一派的大量成果。虽然这些成果中的相当一部分属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sup>48</sup>,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也存在一些相关的研究问题,如一体化与国际机制对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制度的作用、<sup>49</sup>国际环境对国家军费开支、<sup>50</sup>国际组织如何介入一国对外政治制定<sup>51</sup>等。还有一些最新的研究则开始关注体系转型对于国家内部的影响,并

---

<sup>43</sup> Jeffrey T. Checkel, "Constructivism and Foreign Policy", in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Actors, Cases*, Steve Smith, Amelia Hadfield and Tim Dunne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73.

<sup>44</sup> Alexander E.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1987, pp. 335-370.

<sup>45</sup> Walter Carlsnaes, "The Agency-Structure Problem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3, 1992, pp. 245-270.

<sup>46</sup> V. Kubalkova and A. A. Cruickshank, *Marxism-Leninism and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sup>47</sup> Jack S. Levy, "The 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 A Critique," in Manus I. Midlarshy, ed.,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Amy Oakes, *Diversionary War: Domestic Unrest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pp. 662-664.

<sup>48</sup> 代表性论著有: Paul Midfor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omestic Politics: Improving on Rogowski's Model of Political Align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4, 1993, pp. 535-564; Gunther Hellmann, "Linking Foreign Policy and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in Global Politics: Methodized Inquiry in a Deweyan Traditi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3, No. 3, 2017, pp. 578-598; J. Bradford Jensen, Dennis P. Quinn and Stephen Weymouth, "Winners and Loser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Effects on US Presidential Vot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1, No. 3, 2017, pp. 423-457.

<sup>49</sup> Michael E. Smith, "Toward a Theory of EU Foreign Policy-Making: Multi-level Governance, Domestic Politics, and National Adaption to Europe's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1, No. 4, 2004, pp. 740-758.

<sup>50</sup> Willian Nordhaus,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on National Military Expenditures: A Multi-country Stud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6, No. 3, 2012, pp. 491-513.

<sup>51</sup> Teri L. Caraway, Stephanie J. Rickard and Mark S. Anner,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Case of IMF Labor Market Conditiona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6, No. 1, 2012, pp. 27-61.

涉及到国家职能调整和权力分配问题。<sup>52</sup>

总体而言,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在国内政治变量的操作上既有创新又有继承,制度维度上,它丰富了国内政治的内涵,观念维度上,又与对外政策分析研究相辅相成、共同发展,而在如公众舆论、利益集团等其他变量上也借鉴了对外政策分析的研究成果。除了相互促进外,对外政策分析领域还对理论范式提出了相当多的挑战和质疑,为体系问题提供了资料更为翔实、逻辑更加严密的微观解释,弥补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证不足,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具的广度和深度。<sup>53</sup>

### 三、国内政治变量的类型化

结合对外政策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国内政治可从制度和行为体两方面界定其涵义:从制度上讲,国内政治是指国家的权力分享结构,体现为一国的制度;从行为体上看,国内政治是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此概念,国内政治变量可被归为制度与行为体两种类别,其中根据行为体的数量,再划分出个人和集体两个子类。制度类的解释主要包括一国的政体、政党制度、机构结构等;行为体类的解释根据观念和非观念进行区分,观念型变量包括信念、心理等,非观念型变量如职位、组织背景等。两类解释相比较,制度类变量从作用时间和形态上呈相对稳定状态,而行为体解释受国际和国内环境影响而会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作用效果。

#### (一) 制度类变量的解释

制度本身是国内的权力共享结构和机制,<sup>54</sup>在一定条件和时间内,政治制度由行为体创造,又会约束行为体的活动,制度为行为体变量发挥作用提供一种较稳定国内情景。在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制度类变量涉及政体、机构结构、竞选制度、政党制度等。就各变量的研究特征而言,政体变量研究趋向于解构式分析,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政体,决策者与其内部的权力制约关系成为政体解构化分析的研究对象。机构结构是政府内部的职权分配,它确定了每个部门的职责以及政府的决策流程,同时也体现了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如官僚政治

<sup>52</sup> Gunther Hellmann, "Linking Foreign Policy and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in Global Politics: Methodized Inquiry in a Deweyan Traditi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3, No. 3, 2017, pp. 578-598.

<sup>53</sup> Juliet Kaarbo, "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erspective on the Domestic Politics Turn in IR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7, No. 2, 2015, pp. 189-216.

<sup>54</sup> [美]海伦·米尔纳著:《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曲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模型和组织过程模型这样经典的决策模型都与该变量有关。竞选制度常与公众舆论同时出现,研究问题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决策单元对舆论的操控与应对机制,二是由公众舆论引起的观众成本在选举周期的不同阶段对决策单元的政策选择造成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年来,政体变量操作化的广度和深度有了长足发展,而其他两类变量的操作机制基本承袭早期研究成果,只在案例研究方面有所扩展,因此,这里我们将详细评述政体变量的既有文献,简要回顾其他两变量的相关研究。

政体成为国内政治层次的重要变量是在民主和平论提出之后,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政策分析领域都出现了讨论的热潮,直到今日依然热度不减。起初,民主和平论试图回答体系层面上国家间和平相处的条件,作为自变量的政体被操作划分为民主与非民主两类,两种政体意味着国内不同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制约体系,决定了决策单元是谁,而其他行为体又能否牵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sup>55</sup>自提出之日起,民主和平论就遭受到大量质疑,如经验事实上民主国家同样好战<sup>56</sup>、非民主国家同样具有反战舆论<sup>57</sup>等经验事实都冲击着该理论的基本假说。仔细研看便不难发现,这些质疑实际上都将研究问题从体系层次拉回到单元层次,也就是说,问题从国际体系中国家间如何实现和平互动的双向研究,转变成为国家使用武力的政策决策的单向研究,这种转变的结果就是,政体变量的操作方式变得更加细腻。

政体变量的操作细腻化在以权威政体为对象的研究中展现得相对明显。仔细分析威权政体的国内政治环境,实际是对国内权力分配结构的深入剖析。最初,格迪斯(Barbara Geddes)将威权政体分为军事独裁,党派专制和个人独裁三种类型,<sup>58</sup>之后,威克斯(Jessica L. Weeks)依据决策单元和政权属性将威权政体分为四种类型,即军事个人独裁(strongman)、军事执政团(Junta)、非军事执政团(Machine)和非军事个人独裁。<sup>59</sup>无论是三类还是四类,其划分依据有二:一是决策单元由谁担当;二是国内的权力制约关系。就决策单元而言,威权政体有三种形式——领导人、内阁、执政联盟,相较民主国家,领导人成为威权政体特有的决策单元。若国家决策由领导人一人掌管且不受任何制约时,这个国家是个人独裁统治,如萨

<sup>55</sup> Randall L. Schweller, "Domestic Structure and Preventive War: Are Democracies More Pacific?",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2, 1992, pp. 235-269; John M. Owen,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2, 1994, pp. 87-125.

<sup>56</sup> Jack Snyder, "One World, Rival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 145, 2004, pp. 56-59.

<sup>57</sup> Mark S. Bell and Kai Quek, "Authoritari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No. 1, 2018, pp. 227-242.

<sup>58</sup> Barbara Geddes, "Authoritarian Breakdown: Empirical Test of A Game-Theoretic Argu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1999, pp. 1-62.

<sup>59</sup> Jessica L. Weeks, *Dictators at War and Peac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7-43.



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若内阁或执政联盟能够参与国家决策并对领导人有权力制约，使其不得不背负一定的国内观众成本，那么，这类国家采用的是集体决策，如二战时期的日本。个人型的威权政体中，国家决策受领导人的个人属性和偏好控制，有效的解释变量如个人的军事倾向、成长经历、开放偏好等。<sup>60</sup>而集团型的威权政体下，决策过程是在权力制约关系下的政治博弈，具体表现为领导人权力地位的产生机制，以及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受到事前或事后政治惩罚。<sup>61</sup>

近年来，政体变量在单元层次上不断被深入、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研究课题与发展趋势。其一，研究层次再次转变，在单元层次的基础上，学者们尝试建立体系层次和跨层次分析。例如佩切尼（Mark Peceny）、比尔（Caroline C. Beer）等人尝试建立“威权和平论（dictatorial peace）”，利用配对数据来研究威权政体国家之间的和平条件。<sup>62</sup>其二，虽然尚未形成较清晰的分类方式，民主政体也有被细化分析的趋势，但目前尚未结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sup>63</sup>就研究路径而言，民主政体类型化研究与权威政体类型化分析路径一致，都是用国内权力结构来替代制度特征。其三，运用政体变量解释的问题多样化。传统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仍然是重点，但一些新问题也在不断涌现，例如合作问题<sup>64</sup>、联盟问题<sup>65</sup>、观众成本<sup>66</sup>、

---

<sup>60</sup> Michael C. Horowitz and Allan C. Stam, "How Prior Military Experience Influences the Future Militarized Behavior of Lea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3, 2014, pp. 527-559

<sup>61</sup> 可参见：Krusav Gaibuloev, James A. Piazza and Todd Sandler, "Regime Types and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1, No. 3, 2017, pp. 491-522; Mark S. Bell and Kai Quek, "Authoritari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No. 1, 2018, pp. 227-242.

<sup>62</sup> Mark Peceny, Caroline C. Beer and Shannon Sanchez-Terry, "Dictatorial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6, No. 1, 2002, pp. 16-26; Mark Peceny and Caroline C. Beer, "Peaceful Parties and Puzzling Personalis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2, 2003, pp. 339-342.

<sup>63</sup> Victor Asal, Kathleen Deloughery and Steve Sin, "Democracy, Inclusion, and Failure in Counter-Insurgen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3, No. 4, 2017, pp. 913-930; 张勇：“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第43-65页。

<sup>64</sup> Michele B. Battig and Thomas Bernauer,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Are Democracies More Cooperative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3, No. 3, 2009, pp. 281-308.

<sup>65</sup> Rosenanee W. McManus and Keren Yarhi-Milo, "The Logic 'Offstage' Signaling: Domestic Politics, Regime Type, and Major Power-Protégé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1, No. 4, 2017, pp. 701-733.

<sup>66</sup> Jessica L. Weeks, "Autocratic Audience Costs: Regime Type and Signaling Resol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2, No. 1, 2008, pp. 35-64.

民主转型与和平<sup>67</sup>，政府的执行和效仿能力<sup>68</sup>等。

除政体外，政党制度、竞选机制和机构政治等变量的研究进程相对较慢，近年来这些变量在研究问题和解释路径上与之前并无太大变化。就政党制度而言，使用政党制度作为解释变量的研究一般见于比较政治研究中，<sup>69</sup>在对外政策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较少见。竞选制度多与观众成本相连共同组成解释框架，逻辑链条通常是在竞选周期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上，观众成本对决策单元的影响。<sup>70</sup>机构政治变量的操作目前来看处于滞步状态，多数研究依旧是围绕着官僚政治模型和组织过程模型展开。<sup>71</sup>

综合制度类变量的研究进展，可看出具体变量的研究高度、挖掘深度以及应用广度存在差异。政体变量在对外政策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领域都有长足发展，而政党制度、竞选制度和机构结构的研究范围的拓展力度较小，在解释机制上的变化和发展较慢，国际关系理论也较少致力于开发这些变量的新的操作路径，只是承袭了对外政策分析领域的研究成果，接受和采纳这些变量作为中介变量进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中。

## （二）行为体相关变量的解释

国内政治的另一层含义是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行为体包括个人和集团。通常个人行为体出现在政治博弈中是带有组织背景，例如，个人的头衔可能是国会议员、顾问、官员、政党成员、公民等，他们的偏好往往受组织背景的约束，其行为要根据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目标来规划。这些个人会组成不同的集团，如对外决策的精英集团、政府部门或组织、政党、利益集团、公众等。每种行为体都会有多种相关变量和假设，这里我们仅概述非决策单元行为体如公众、利益集团等在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决策单元涉及的变量将在下文的解释路径部

---

<sup>67</sup>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Pathways to War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3, No. 2, 2009, pp. 381-390; Vipin Narang and Rebecca M. Nelson, "Who are These Belligerent Democratizers? Reassessing the Impact of Democratization on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3, No. 2, 2009, pp. 357-379.

<sup>68</sup> 时殷弘、陈潇：“现代政治制度与国家动员：历史概观和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第32-39页。

<sup>69</sup> 如 Colton Heffington, "Do Hawks and Doves Deliver? The Words and Deeds of Foreign Policy in Democraci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4, No. 1, 2018, pp. 64-85; 徐万胜：“政党体制转型与日本对外政策”，《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第70-81页。

<sup>70</sup> 如 Alastair Smith,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2, No. 3, 1998, pp. 623-638.

<sup>71</sup> 如 Jeffrey S. Peake,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U.S. Treaty Ratification: Bilateral Treaties from 1949 to 2012",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3, No. 4, 2017, pp. 832-853.

分进行论述。

对外决策的精英集团中，成员多属于决策单元，他们带有不同的组织、党派背景，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形成复杂的政治博弈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官员之间依照个体偏好进行的讨价还价上，<sup>72</sup>集团成员的职位决定他们的立场、利益和目标，从而形成各自的偏好，最后偏好之间的碰撞导致了政治妥协和政策产出。此外，这些成员的偏好会受到其他非政府行为体的影响，特别是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是由共同利益凝聚起来的组织，如公司（国内、跨国）、非政府组织或产业联盟等。这些集团通过游说方式，<sup>73</sup>向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等决策单元输出政治理念、推选偏爱的候选人或推荐偏好政策。例如，在美国这类国家，总统和议员选举也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候选人无论是在竞选前还是上任后，其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都要考虑到其背后的支持者的意愿。<sup>74</sup>

无论是精英集团、利益集团还是政党，在现行的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中，或多或少的都会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重要、甚至是主导性的影响，但是另一个集团——公众，其能否发挥作用受到国家政治结构和制度的限制。在某些政体下，例如个人独裁政府，公众几乎很难左右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这里，我们仅考虑在制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公众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施加压力的情景。这些压力的大小体现为观众成本，在国内政治中一般指国内观众成本，其大小取决于决策是否满足公众偏好的程度。涉及公众舆论的两种常见解释是，选举周期和议题关注周期，二者均通过社会支持度<sup>75</sup>来影响观众成本，左右政府决策。就选举周期而言，领导人或议员候选人的偏好和政策选择会影响其能否竞选成功或者顺利连任。研究表明，虽然总统（领导人）的抉择受选举周期的影响，但在选举的哪个具体阶段公众舆论能够发挥作用，学者们由如下几种观点：在任职开始和结束阶段，领导人更易采取强硬措施，如升级危

<sup>72</sup> Graham T. Allison, "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3, No. 3, 1969, pp. 691-798.

<sup>73</sup> 可参见：谢建国、葛剑鸣、张晓磊：“利益集团与美国能源政策——基于美国 ACES 法案投票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第44-63页；Stephen G. Brooks, "Economic Actors' Lobbying Influence on the Prospects for War and Pea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4, 2013, pp. 863-888.

<sup>74</sup> [美]约翰·米尔海默斯、斯蒂芬·沃尔特著：《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王传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Wendy L. Hansen and Neil J. Mitchell, "Disaggregating and Explaining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Domestic and Foreign Corporations in National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4, 2000, pp. 891-903.

<sup>75</sup> 可参见：Alastair Smith,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2, No. 3, 1998, pp. 623-638; Christina J. Schneider and Branislav L. Slantchev,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ermany and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No.1, 2018, pp. 1-31.

机的决定；<sup>76</sup>又或者，越临近大选，身处经济困难中的领导人更容易在危机中表现强硬。<sup>77</sup>除使用武力外，公众舆论在其他决策上也发挥着作用，如一国的战略选择、结盟。<sup>78</sup>

实际上，公众舆论的作用不仅受限于政治制度和结构，也受到领导人选择的影响。例如，在某一议题上，领导人可能为避免公众监督、降低观众成本，而不公开议题的基本情况，那么无从获取信息的公众，也就无法发挥影响。<sup>79</sup>另外，公众对议题的关注也存在程度与周期的不同，有些对外问题不会引起他们的关注，而有些问题虽然会引起关注，但持续时间短、热度小，并不会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公众因一致对外的情感和情绪而酝酿成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会对政府决策形成的强大压力。<sup>80</sup>其实，公众与政府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政府可以通过政治操纵来控制公众舆论<sup>81</sup>，需要注意的是操纵与政体无关。

总体而言，非决策单元行为体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国家制度、议题类型、时机等背景会影响这些行为体发挥作用的程度。这类行为体的相关研究成果是国际关系理论从对外政策分析领域中吸纳的主要部分，许多相关要素都被当作一些理论范式的中间变量，但它们很少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自变量。非决策行为体只有通过决策单元才能作用于国家的对外行为，现有的决策模型多是以决策单元为对象，这些对外政策分析领域的解释路径从建立到发展多独立于国际关系理论。

### （三）国内政治变量的解释路径

无论是制度类还是行为体相关变量，它们的解释要素都在增加，涵盖范围逐渐扩大，研究路径也更加细化。表1涵盖了目前国内政治层面的大部分变量，这些变量成为解释国家对外政策产出和执行的解释路径与框架的关键要素，帮助还原了政策制定过程中行为体所带的各种

<sup>76</sup> Patrick James and Athanasios Histoulas,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Evaluating a Model of Crisis Activ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6, No. 2, 1994, pp. 327-348.

<sup>77</sup> Kevin H. Wang, "Presidential Responses to Foreign Policy Crises: Rational Choice and Domestic Politic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0, No.1, 1996, pp. 68-97.

<sup>78</sup> 漆海霞、齐浩：“同盟信号、观众成本与中日、中菲海洋争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106-134页；蒙克：“技能专有性、福利国家和欧洲一体化——脱欧的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第123-154页。

<sup>79</sup> 可参见：柳思思：“公众情感引导机制研究——塔利班与美国对阿富汗的公众情感引导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第58-76页；张传杰、付舒：“美国公众涉台舆论取向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91-112页。

<sup>80</sup> 可参见：Lars-Erik Cederman, T. Camber Warren and Didier Sornette, "Testing Clausewitz: Nationalism, Mass Mobilization, and the Severity of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5, No. 4, 2011, pp. 605-638；王军：“网络民族主义、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第141-155页。

<sup>81</sup> Matthew A. Baum and Tim Groeling, "Reality Asserts Itself: Public Opinion on Iraq and the Elasticity of Rea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3, 2010, pp. 443-479

变量之间的交互情景。从对外政策分析领域中梳理这些解释路径,可发现,大多数模型的理论建构已相对成熟,近年来仅在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和案例分析上有所进展,也有一些新建模型还在完善之中。这里,我们首先根据国内政治的概念对变量进行归类,随后再根据这些变量来分类其解释路径。

表 1: 国内政治层次的行为体相关变量归类

类别	个人维度	集团维度	
行为体	领导人	政府部门	
	官员	政党	
	顾问	利益集团	公众
	国会议员	跨国公司	
		内阁	
变量		结构	
	利益	偏好	观众成本
	认知	官僚政治	民族主义
	风格	集团思维	认知分歧
		组织文化	

一部分国内政治变量和解释机制借鉴自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以个人与集团、观念与非观念为划分依据,国家对外决策模型可分为四种类型:(1)个人观念类解释;(2)集团观念类解释;(3)个人非观念类解释;<sup>82</sup>(4)集体非观念类解释,也就是各种组织之间和内部的政治角力塑造的国家决策过程,其中官僚政治和组织过程模型是最经典的决策模型。<sup>83</sup>从表 2 中就不难看出,观念维度占据了当前对外政策分析研究的半壁江山。该维度涉及人的认知、心理等要素,将它们引入到行为分析研究中,以弥补理性选择理论难以解释的理论空白。其实,理性也是一种观念因素,但其评判标准却可以被物化为利益等显性要素。由经济学借鉴而来的理性人假定是指人们最大限度的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然而这种假定却不符合国家选择次优战略的事实,因而观念就成为另一种解释。

<sup>82</sup> 这类研究数量较少,且没有成型的作用路径,因此本文将不予讨论。

<sup>83</sup> Graham T. Allison, "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3, No. 3, 1969, pp. 691-798. 这是对外政策分析中最经典的模型,其理论框架改动较少,本文将不予过多讨论。

表 2: 对外决策模型归类

分类		行为体	
		个人	集团
属性	观念	操作码; 信念体系; 知觉与错误知觉; 前景理论; 多元启发理论	小集团思维; 多元思维;
	非观念		官僚政治模型; 组织过程模型;

在对外政策分析中, 观念被理解为环境在行为体的认知和心理上的投射, 研究中学者们通过活动、语言来分析和判断这些行为体的观念。具体来说, 观念要素还能以作用时间来区分: 一类是长期保留在行为体脑海中、不会轻易改变的观念; 另一类是根据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应激观念。关于前者, 学者们建立了操作码、信念体系等解释路径<sup>84</sup>, 这些观念又被细分为工具性和哲学性信念。而后者则可以再次细分为包含如知觉理论<sup>85</sup>、前景理论<sup>86</sup>等单

<sup>84</sup> 代表成果与近期研究如 Ole R. Holsti,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 No. 3, 1962, pp. 244-252; 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1969, pp. 190-222; Jonathan Renshon, "When Public Statements Reveal Private Beliefs: Assessing Operational Codes at a Distance",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0, No. 4, 2009, pp. 649-661; Huiyun Feng and Kai He, "Prospect Theory,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and Risk-Taking Behaviour: A New Model of China's Crisis Behaviour",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24, No. 2, 2018, pp. 173-190.

<sup>85</sup> 代表性论著有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sup>86</sup> 代表性论著与近期研究有: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87-112; Jonathan Mercer, "Prospect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 1, 2005, pp. 1-21; Christopher K. Butler, "Prospect Theory and Coercive Bargain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1, No. 2, 2007, pp. 227-250; Hector Perla, "Explaining Public Support for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The Impact of Reference Point Framing and Prospective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5, No. 1, 2011, pp. 139-167.

独采用认知变量的解释路径，以及认知与理性相结合的多元启发理论<sup>87</sup>。

此外，思维也是观念维度上的关键要素之一，除了早期贾尼斯（Irving L. Janis）提出的小集团思维外，明茨（Alex Mintz）和韦恩（Carly Wayne）近期提出了多元思维（polythink），进一步探讨了思维变量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路径。小集团思维和多元思维的逻辑起点是集团动力的凝聚程度，当集团凝聚力强时，集团内部会出现一系列认知表征，阻碍他们进行发散性和开放性思考，受囿于小集团思维，最终导致决策失败；<sup>88</sup>当集团离散力强时，集团内部的观点与立场分歧将难以弥合，决策意见难以统一，集团受困于多元思维，最终导致决策瘫痪或失败。<sup>89</sup>然而，目前该理论还是不完美的，其判断多元思维的标准还不够清晰，案例选择还很有局限性，论证方法也十分单一，这些都值得学者们在未来研究中贡献智慧。

#### 四、结语

将这些变量和路径进行类型化处理后，能够更清晰地感知到国内政治层面的总体研究状况与进程。几十年来，国内政治层面在对外政策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领域的共同推进下有了长足发展，在制度和行为体两个维度上涵盖的变量在增多、研究路径在扩展、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样。从这种进程中，观察对外政策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领域的互动，可发现在国内政治变量的研究上，双方建立了相互补充、彼此推动发展的交互关系。虽然在国内政治变量的研究上对外政策分析比国际关系理论要早上 30 多年，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依然提出诸如政体等新变量，为对外政策分析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丰富了国内政治的内涵。同时，对外政策分析领域提供了更丰富、更细致的国内政治变量研究，这些成果也被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直接引用，辅助其框架的扩展与深入。<sup>90</sup>

当我们审视这个复杂庞杂的国内政治层面知识体系时，除了看到国际关系研究中领域间

---

<sup>87</sup> 从研究方法上说，多元启发理论的研究路径由三种：其一是案例研究，如 Alex Mintz, "The Non-compensatory Principle of Coalit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7, No.3, 1995, pp.335-349; Abbas Maleki, "Decision Making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A Heuris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Affairs*, Vol.19, No.73, 2002, pp. 39-53; 其二是统计检验方法，如 Patrick James and Enyu Zhang, "Chinese Choice: 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 1950-1996",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1, No.1, 2005, pp. 31-54; 其三是博弈模型，如 Min Ye, "Poliheuristic Theory, Bargaining, and Crisis Decision Mak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3, No.4, 2007, pp. 317-344。

<sup>88</sup> 代表性论著有：[美]欧文·贾尼斯著：《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大失败的心理学研究》，张清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

<sup>89</sup> Alex Mintz and Carly Wayne, *The Polythink Syndrome: U.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on 9/11, Iraq, Iran, Syria and ISI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sup>90</sup> Juliet Kaarbo, "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erspective on the Domestic Politics Turn in IR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7, No. 2, 2015, pp. 189-216.

的交互发展外，还需进一步思考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的关系。近年来，双层次和跨层次研究正逐渐增多，学者们不再只关注单元层次与体系层次的单向跨层次互动，双层次共同作用的解释路径与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这类研究不仅有“颠倒的第二意象”、“双层博弈”等理论支持，也有案例和统计检验的支撑。这一研究趋势与当前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紧密相关，国际机制在被塑造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文化和舆论走向。然而，这种双层次和跨层次的研究在为国际关系学科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今后，如何清晰界定和准确把控双层和跨层次分析，如何建立更加清晰的层次划分标准，甚至层次划分还有无必要，将成为层次分析方法学者的研究问题。如何增强文章的学理性和逻辑性，如何避免因多层次分析带来的缺少研究简洁性的问题，如何切实有效地锁定问题的关键变量，则是对外政策分析学者面临的挑战。



## 权力转移、地位焦虑与中美战略竞争新态势

王秋彬

**【摘要】**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成功地战胜苏联与日本在安全与经济上的挑战，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近年来，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力推进，美国的优势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中美经济力量对比的逐渐缩小，中美即将发生权力转移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一地位变化所带来的是美国深深的“地位焦虑”。其实，这种焦虑感在中美两国都有体现，只不过作为霸权国，美国的“地位焦虑”——在经济、军事、科技、模式等领域优势地位被他国超过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安全感——比崛起国表现得更为明显。受地位变化以及地位焦虑的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竞争色彩空前凸显。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特朗普政府明确地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通过多种方式制衡中国。为此，中美双方除了在经济、科技、安全等传统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之外，在规则、国际观、朋友圈等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尽管中国目前无意（也没有实力）与美国开展竞争与对抗，但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挑战，中国该如何应对？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面临的最为棘手的外交难题。

**【关键词】**权力转移；地位焦虑；中美关系；战略竞争；“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侨大学侨务公共外交研究所所长。

### Power Transition, Status Anxiety, and New Trends of Strategic

###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US has become the superpower after having overcome security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It has been able to maintain this unique status for decad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 and its vigorous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merica's pre-eminent status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As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gets smaller, the possibility of power transition is emerging. This change of power status leads to a deep "status anxiety" in the US. In fact, this anxiety is evident in both China and the US. However, as a hegemonic power, America's status anxiety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rising power. The US is feeling insecure, due to witnessing the fact that its pre-eminent position in

the economy,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al model, as well as other fields, are being replaced by other emerging powers. Because of the status change and status anxiety, competition has been stronger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as China is moving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dentifies China as its “rival”, and adopts many measures to balance China. As a result, besides the competition in the traditional fields such as the economy, technology, security, etc., both China and the US are also engaging in intense competition in other areas, such as norms, conception, and their “circle of friends”. Despite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no intention (nor capacity, either) to compete with or confront the US, when facing the overbearing challenges from the US, China should think about what it should do. This is also the most difficult diplomatic issue for China after its 4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up.

**Key words:** Power transition; Status anxiety; China-US relations;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uthor:** Wang Qiubin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Diaspora Public Diplomacy Studies at Huaqiao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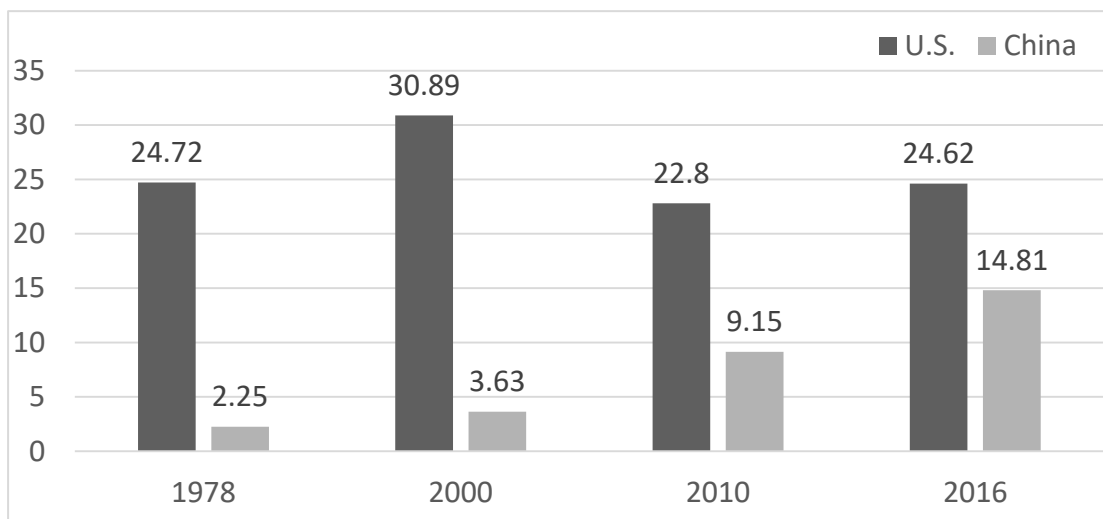
近年来,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力推进,美国霸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二战结束后美国曾经遭遇苏联的军事挑战与日本的经济挑战不同,这一次美国受到了来自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发展模式等领域的全方位挑战。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关于中美即将发生权力转移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一地位变化(status change)带来的是美国深深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其实,这种焦虑感在中美两国都有体现,只不过作为霸权国,美国的“地位焦虑”——在经济、军事、科技、模式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被崛起国超过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安全感——往往比崛起国表现得更为强烈。鉴于此,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特朗普政府明确地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通过挑起贸易争端、杯葛“一带一路”倡议、争夺朋友圈等多种方式,试图使中国崛起不至于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太大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及其对华战略思维决定了中美关系的磕磕碰碰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与历史上崛起国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始终强调自己无意也无力与美国竞争、对抗,希望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建设者,对手的“缺席”可能使美国成为一个孤独的“挑衅者”,但中美战略竞争的新态势已经日趋显现。

## 一、中美实力地位对比变化与权力转移的前景

自中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关于中国GDP何时将超过美国的各种预测便纷至沓来。根据经济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wC)201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购买力平价(PPP)作为计算标准的GDP排行榜上,中国2016年已超过美国,位居榜首。而

若以市场汇率（MER）计算，中美两国的 GDP 规模将在 2025 年达到接近值，中国为 21.3 万亿美元，美国为 21.7 万亿美元；到 2030 年则拉开了距离，中国为 26.5 万亿美元，美国是 23.5 万亿美元。<sup>①</sup> 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显示，1978-2016 年间，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份额从 2.25% 上升到了 14.81%，40 年间几乎增长了 6 倍，而美国仍然保持在 25% 左右（见图 1）。可以预见，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进一步缩减。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 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无论是 2016 年还是预测中的 2022 年，按照 PPP 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大于整个发达经济体，若根据 MER 计算的话，中国的贡献率则接近于发达经济体。换言之，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远远超过美国。<sup>②</sup>

图 1：中美两国占世界 GDP 份额的变化（%）



数据来源：联合国

除了上述一系列统计数据之外，皮尤（PEW）研究中心和盖洛普（Gallup）的民调数据也纷纷显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领导作用的提升。根据 2017 年 7 月 13 日 PEW 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在全球 38 个国家中，虽然认为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比例（42%）仍高于认为是中国（32%）的比例，但在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发现：从纵向看，2014 年和 2016 年，对于同一个问题，只有 6 个国家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2017 年，认为美

<sup>①</sup> PwC, The world in 2050, Feb. 2017,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economy/the-world-in-2050.html>(accessed November 18 2018)

<sup>②</sup>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7), <http://data.imf.org/?sk=ABFF6C02-73A8-475C-89CC-AD515033E662>(accessed April 15 2018)

国已经退居中国之后的国家数量增加了一倍。从横向看，许多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盟友（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纷纷把中国视为世界经济的新领导者。虽然中国邻国、非洲以及南美国家虽然仍视美国为世界经济领导力量，但这一比例是呈下降趋势。<sup>③</sup> 盖洛普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开展的民调结果也显示，不同意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比例首次超过同意的比例（见图 3），当然不同意美国并非意味着就一定同意中国，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各国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信心产生了动摇。这一民意变化发生在 2017 年，也就是特朗普执政元年，不应该是一种机缘巧合，而是与特朗普执政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新保守主义政策分不开，比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巴黎协定》，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费用，甚至威胁要减少安全承诺以节省开支，确保“美国再度伟大”。一个只注重自身利益的美国很难再让盟友产生信任，转而寻求新的世界领导者也在常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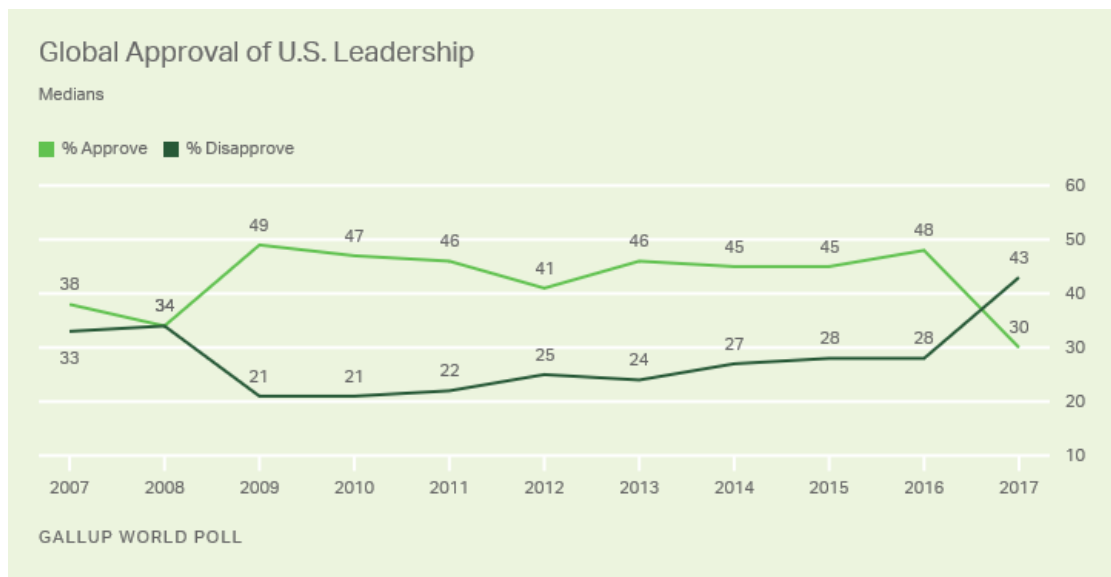
图 2：PEW 民调关于美国是世界经济领导力量的比例

	2014- 2016 %	2017 %	Change
Senegal	68	48	-20
Tanzania	63	43	-20
Philippines	66	49	-17
Ghana	61	45	-16
Mexico	60	47	-13
UK	43	31	-12
Chile	54	42	-12
Brazil	56	44	-12
Israel	63	52	-11
Germany	34	24	-10
India	51	42	-9
Venezuela	53	44	-9
Canada	40	32	-8
Hungary	59	51	-8
Indonesia	47	39	-8
Tunisia	46	38	-8
Argentina	44	36	-8
Sweden	46	40	-6
South Korea	51	66	+15

数据来源：Richard Wike, Jacob Poushter, Laura Silver and Caldwell Bishop, “Globally, More Name U.S. Than China as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July 13, 2017), <http://www.pewglobal.org/2017/07/13/more-name-u-s-than-china-as-worlds-leading-economic-power/> (accessed April 20, 2018)

<sup>③</sup> Richard Wike, Jacob Poushter, Laura Silver and Caldwell Bishop, “Globally, More Name U.S. Than China as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July 13, 2017), <http://www.pewglobal.org/2017/07/13/more-name-u-s-than-china-as-worlds-leading-economic-power/> (accessed April 18 2018) .

图 3: 盖洛普民调关于同意/不同意美国领导地位的民调数据



数据来源: Julie Ray, “World’s Approval of U.S. Leadership Drops to New Low”, Gallup(January 18, 2018), <http://news.gallup.com/poll/225761/world-approval-leadership-drops-new-low.aspx> (accessed April 12, 2018).

国家实力既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也需要他者的认可。上述相关统计数据与民调数据均表明,在当今世界充满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之时,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大国,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持续增长。数十年来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独占鳌头的历史恐将结束,其减少的份额将由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补上,大国在经济领域的实力对比将更加均衡化。国际关系也将因此发生深刻变革。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如果崛起国家的实力达到或者超过主导国实力的 80%,就有可能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挑战国际体系内的主导国。<sup>④</sup> 可见,该理论着重强调的是崛起国对现状的不满而挑战主导国。在他们看来,新兴大国因不能享有相应权利而对现有国际秩序“不满”,既有主导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将极力维持现有秩序,双方因此围绕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展开激烈竞争乃至对抗;一旦“不满意的国家认为有机会借助战争手段赢得秩序主导权,就会发动战争来争取改变现状”。<sup>⑤</sup> 自 1500 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上,新崛起国家挑战主导国的案例一共有 15 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 11 例,为该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与权力转移理论的假设不同的是,当今崛起的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获益者(而且满意度较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正是参与了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才推动了中国经

<sup>④</sup> Jacek Kugler, “Extensions of Power Transitions: Applica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Peace Economics,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Volume 5, Issue 3, Summer 1999, p.2.

<sup>⑤</sup>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p.123;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pp.5-7.

济的迅速增长,中国怎么会去挑战这一对自己有利的秩序?可见,中国的崛起将不同于历史上的崛起国,走的是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道路,权力转移理论的“预言”在中国身上可能无法应验。当然这也并不完全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态度(包容还是拒斥?)对权力转移是否会走向冲突也至关重要。其实不仅中国,大多数国家也都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最近十年的发展表明,亚洲人民已经成为1945年美国和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开创的开放性的多边体系中的最大受益者。今天,很少有亚洲国家想破坏对它们有益的这一体系。”<sup>⑥</sup>其实早在数年前,中国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尊重。2014年12月16日至18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出席在芝加哥举行的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JCCT)时指出,中国对美国统治全球经济发展和建立世界规则秩序的手段有“清醒的认识”(clear understanding)。“我们基本上接受这些规则,并愿意在全球经济结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些规则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前就已由美国建立。”“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地位”,中国希望在合作中使美国更加了解中国的想法。<sup>⑦</sup>

除了无意挑战现有秩序之外,中国是否有实力发起挑战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与美国战略界面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普遍不淡定不同,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迈克·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对中美实力对比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提出“不要再纠缠于中国”,因为中国还威胁不到美国霸权。他在2018年9月份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令部分美国人惶惶不可终日的美中在经济体量(GDP)上的此消彼长,其实并不能真正反映财富与实力。因此贝克利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权力来源应该是扣除成本后的净资源。这些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福利成本、安全成本等。为此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曾经估算过各国的净资源,涉及生产资本(基础设施等人造物)、人力资本(教育、技术等)、自然资本(水、能源、可利用土地等)多个领域。虽然不同机构的测算标准和资料来源各不相同,但结果却惊人相似:美国拥有的净资源数倍于中国,而且其领先优势还在逐年扩大。<sup>⑧</sup>这一观点在一向“未雨绸缪”的美国战略界以及特朗普政府看来无异于是对华“绥靖”,其中折射出来的是实力相对衰落的美国内心深深的焦虑。

## 二、“地位焦虑”与中美战略调适

<sup>⑥</sup> [新]马凯硕:《新亚洲半球》,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sup>⑦</sup> “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汪洋发言:引领世界的是美国”,观察者网, [https://www.guancha.cn/broken-news/2014\\_12\\_19\\_303814.shtml](https://www.guancha.cn/broken-news/2014_12_19_303814.shtml), 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0日。

<sup>⑧</sup> Michael Beckley, “Stop Obsessing About China: Why Beijing Will Not Imperil U.S. Hegemony”, *Foreign Affairs* (Sept.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9-21/stop-obsessing-about-china>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8).

国家之间围绕权力、地位的追逐竞争是国际关系史上永恒的主题。有学者提出了一套包括荣誉 (honor)、社会面子 (social face)、威望 (prestige) 以及道德权威 (moral authority) 在内的地位指针 (status regulators), 国家会为了这些地位指针而战, 对地位的关注便成为影响国家对外行为的重要因素。<sup>⑩</sup> 图多尔·奥林 (Tudor A. Onea) 则提出了“地位焦虑” (status anxiety) 的概念, 认为地位焦虑是“主导国害怕失去较高地位 (包括经济、军事和威望) 的一种倾向, 这使主导国努力抵制实力上升国与其竞争或超过它们”, 并以 1740 年代到拿破仑时期的英法关系以及 188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德关系为例对其理论进行了验证。需要指出的是, 主导国并非对所有实力上升国都有焦虑, 其焦虑对象是某些对其地位构成竞争与挑战的特定国家, 正如奥林所言: “在一个不视对方为地位竞争者的国家眼中, 即使国家实力出现相对下降, 地位焦虑也将为零, 比如美国并不会对卡塔尔产生地位焦虑, 即使当美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而卡塔尔经历着全球最高的 GDP 增长率。”<sup>⑪</sup> 可见, 两国存在地位焦虑的前提是二者对彼此的地位产生了较深的关切。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以及影响力的增长, 美国对中国的地位焦虑感也日益上升。正如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加里·斯密特 (Gary J. Schmitt) 所说, “尽管美国正集中精力应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 但美国战略家们的一项普遍共识是在未来几十年里, 美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中国的崛起”, 并主张加强遏制的力度。<sup>⑫</sup> 这是美国保守派对作为“他者”的中国的崛起, 感到焦虑乃至担忧的集中体现, 而且这一焦虑逐渐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体现出来。其实早在奥巴马时期, 美国国内质疑对华接触政策的声音就已经出现, 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 TPP 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以及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奥巴马指出, “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规则也在变化之中, 应该是美国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书写规则。”<sup>⑬</sup> 尽管如此, 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仍以接触为主, 特朗普上台后, 在“美国优先”战略的指导下, 对华政策 (包括贸易、人文、台湾等方面) 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某种程度上已经放弃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 这既与中国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影响力扩大给美国带来的压力增加有关, 也跟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与个人色彩分不开。

在 2017 年底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美国明确地把中国定性为竞争对手, 认

<sup>⑩</sup> Barry O'Neill, *Honor, Symbols, and Wa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preface, p.XII.

<sup>⑪</sup> Tudor A.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14, p.125, p.135.

<sup>⑫</sup> [美]加里·J. 斯密特主编:《中国的崛起: 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新华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3 页。

<sup>⑬</sup> “President Obama: The TPP would let America, not China, lead the way on global trade”, (May 2,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president-obama-the-tpw-would-let-america-not-china-lead-the-way-on-global-trade/2016/05/02/680540e4-0fd0-11e6-93ae-50921721165d\\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558fb4ee78f2](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president-obama-the-tpw-would-let-america-not-china-lead-the-way-on-global-trade/2016/05/02/680540e4-0fd0-11e6-93ae-50921721165d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558fb4ee78f2) (accessed December 15, 2018)

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扩大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的影响范围，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塑地区秩序”。《报告》还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反思：“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支持中国的崛起以及融入战后国际秩序，将促使中国实现自由化。但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中国现在是以牺牲他国主权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权力。”

<sup>13</sup> 鉴于此，特朗普政府不会再“重蹈覆辙”，要对中国采取行动：从挑起贸易战到挑动南海问题，从要求中国加入《中导条约》到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从指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到污蔑中国干涉美国选举。特朗普政府指控的是中国对国际规则的违背以及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其政府高官对中国的攻击力度之猛烈也为历届美国政府所罕见。2018年10月4日，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问题发表演说，批评前几届美国政府忽视了中国的行动甚至“助长”了中国，并宣布：“这样的日子结束了。”<sup>14</sup> 这一火药味极浓的发言不禁让人想起了铁幕演说，担忧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新冷战”。

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感，是一个叱咤世界数十年的超级大国地位相对衰落自然反应。它需要找一个假想敌，努力延缓地位衰落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关系的磕磕碰碰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常态，我们对此应该做打持久战的准备。其实，中国的崛起也不必然意味着权力将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或者中国将很快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就目前态势而言，世界正在迎来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世界将步入多元领导力量的时代，这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任何一个国家均无法独步世界舞台。这就意味着美国需要适应新的地位状况，接受新兴国家崛起的现实，并尝试与新兴国家一道分享世界领导权力。当然，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也需要调适日益提升的实力地位，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近年来，在实践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欧亚非大陆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实现人类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理念上，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并提出国家间的交往应当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这些都是对西方传统国际政治实践与理念的重要突破与创新，也是崛起的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但遗憾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新理念并未作出善意的回应，而是继续采取传统思维来看待中国的崛起。

<sup>13</sup>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 2017),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7.pdf>, p.25. (accessed December 5, 2018).

<sup>14</sup>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October 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accessed December 12, 2018).



### 三、中美战略竞争新态势

受地位变化以及地位焦虑的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竞争色彩空前凸显。而且双方除了在经济、科技、安全等传统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sup>15</sup>之外，在规则、国际观、朋友圈等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第一，规则竞争日趋加剧。“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便着手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秩序，其核心便是自由贸易和法治的自由价值观。”<sup>16</sup>在这一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得以迅速崛起，这就给希望“美国再度伟大”的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双重挑战：一是开始反思原有的一套经济规则与秩序是否太“利他”，而对自己不利；二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可能导致规则的重塑，使美国丧失主导权。这也就不难理解特朗普政府为何要执意退出相关国际机制，而且通过贸易战来打击中国，通过提高钢铁关税来教训那些摇摆不定的盟友，其根本目的是要减缓挑战者的追赶速度，继续保持对全球局势和规则制定的掌控权。在中国“一带一路”大力推进的过程中，美国关注最多的可能就是规则问题。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在被解职之前的非洲之行中指出：和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非洲“激励良政，而中国则是利用不透明的合同、掠夺性的贷款条款和腐败的交易，让负债国家陷入困境，并削弱他们的主权，从而形成对中国的依赖”<sup>17</sup>，表达了美国对中国不遵守规则、大肆在世界扩张影响力的担忧。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里，中美之间围绕贸易、环保、融资以及全球治理等领域的规则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第二，由于国际观的根本差异，两国在国际舞台上道义与利益的碰撞将更加激烈。跟西方国家固守权力政治与传统利益观的国际交往原则不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强调道义色彩。随着中美实力地位的变化，这两种不同的国际观也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激烈交锋。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倡导的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领导人也在诸多国际场合表示，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是“美国利益”与“美国第一”的问题，在2017年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通篇考虑的是自身及其盟友的利益。报告40次提到“美国的利

<sup>15</sup> 参见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55-60页。

<sup>16</sup> Adam Posen, “The Post-American World Economy: Globalization in the Trump Era”, *Foreign Affairs*, Vol. 97, Issue 2, 2018.

<sup>17</sup> “蒂勒森：中国养成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依赖”，《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80307-840716>，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0日。

益”（或“我们的利益”），虽有几次提到“共有利益”（shared interests），但主要指的是美国与盟国或者“自由世界”的共有利益。<sup>18</sup> 相比之下，在此前两个多月所作的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24次提到“人类”，6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1次提到“国家利益”，在谈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提出，“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sup>19</sup> 此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坚持的正确义利观也是对西方传统权力政治原则的根本性超越，与西方以利益为导向的国家交往原则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双方关于朋友圈的争夺也拉开了序幕。长期以来，美国引以为豪的是世界范围内庞大的同盟体系，中国则采取的是结伴而不结盟的政策，致力于与世界许多国家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中国同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落地生根，许多国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有些曾经跟随美国或者在中美之间摇摆不定的国家，基于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纷纷与美国拉开距离，积极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例如，杜特尔特在菲律宾执政后，一改前任阿基诺三世政府的亲美政策，将南海问题搁置起来，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昂山素季上台之后，西方舆论曾欣喜有加，希望自己长期在缅甸培养出来的民主力量会“倒向西方怀抱”，成为西方制衡中国崛起的“前沿棋子”。但很快昂山素季就发现西方国家除了在人权问题上发号施令之外，并不能给缅甸带来民生的改善。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她在缅甸成立了“一带一路实施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席，准备深度参与“一带一路”。除此之外，美国的许多欧洲盟友也禁不住“利益的诱惑”，加入亚投行（AIIB），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朋友圈的不断扩大，正是美国的担忧所在。为此，美国一方面污称“一带一路”是一条“束缚带”（constricting belt）或“不归路”（one-way road）<sup>20</sup>，另一方面不断向中国周边国家示警，强调“一带一路”合作可能导致严重债务风险，中国会动用债务、经济杠杆谋取利益，试图离间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彭斯曾经给柬埔寨首相洪森写信，表达了他对中国要在柬埔寨建立海军基地的担忧。<sup>21</sup> 美国的长臂做法遭到洪森的强力回击。

<sup>18</sup>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 2017),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7.pdf>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8).

<sup>19</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uanq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http://www.gov.cn/zhuanq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上网时间：2018年11月25日。

<sup>20</sup>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at the 2018 APEC CEO Summit”, (November 16,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2018-apec-ceo-summit-port-moresby-papua-new-guinea/>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8).

<sup>21</sup> “Cambodian PM says no China naval base being built”, (Nov. 19, 2018),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cambodian-pm-says-no-china-naval-base-being-built> (accessed December 12, 2018).

总的说来,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美国的相对衰落,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将重新分化组合。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力量对比将发生历史性变化,意味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在时隔200年之后再度超过西方,重返世界经济舞台之巅,还体现在世界政治版图的变化重组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东西方观念将进一步被打破,传统盟友对美国能否继续领导世界经济已经表现出信心不足。在特朗普政府撤出对诸多国际机制的支持、威胁要减少对盟友承担的安全义务、并采取诸多逆全球化潮流而动的举措之际,这种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路线令国际社会对美国的领导意愿产生动摇。在美国盟友以及许多中小国家看来,“中国仿佛一下子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捍卫者、推动者以及领导者”<sup>22</sup>,它们可能最终需要在中美之间作出艰难的权衡与选择。此外,就目前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与外交实践态势而言,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建设者的形象日益凸显,而美国却逆袭地扮演了挑战者的角色;中国的国际战略越来越着眼于全球视野与人类利益,而美国则突出强调美国利益至上;中国的国际行为越来越走向开放,国际姿态日益自信,受到的国际认可也日益增加,而美国则越来越走向保守,对一时一地的得失锱铢必较,缺乏宏观考量。究竟谁代表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时间将作出回答。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独领风骚上百年,在许多方面仍然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中国在与一个日益焦虑的超级大国打交道时,需要有更强大的战略定力与智慧。

---

<sup>22</sup> Astrid H. M. Nordin and Mikael Weissmann, “Will Trump make China great aga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2, 2018, p.239.

## 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倡议与全球行动

林跃勤

**【摘要】** 当下，全球化以及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遭遇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阻击，严重威胁着全球稳健发展与良性治理格局的形成。理性思考和探寻有效应对之策理应成为人类共同国际社会的积极选择。中国以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最终推动区域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宏大目标，积极探求通过平等互利共赢的多边国际合作应对各种全球发展与全球治理挑战。但国际上诸多误解误读严重干扰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在回顾相关研究基础上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于全球发展与治理良性格局形成的重大意义及其核心支撑体系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价值，厘清两者内在关联及互动共进规律，提出中国相关世界讲清一带一路倡议本质内涵和普遍时代价值、创新实践并以此引领、带动区域乃至全球力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选择。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倡议；全球行动

**【作者简介】** 林跃勤，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对外传播中心主任。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实版全球化理论悖论与‘一带一路’理论创新研究”（编号18BJL086）阶段性成果。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ese Proposals and Global Actions**

**Abstract:** At present, globalization,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re challenged by unilateralism and isolationism, threatening the world's ability to achieve steady development and a benign pattern of global governance. Rational thinking an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are a necessary choi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major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propos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th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China seeks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tackle multipl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challenges through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based on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fter a research review,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significance and backbon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well as the vision's significance to global development and a benign governance pattern.

Then, it tries to give evidence that the China-propos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support system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discusses how these two proposals interact and promote each other. Last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approaches for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involved in being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us driving positive forces in the world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Chinese proposals, global actions

**Author:** Lin Yueqin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一、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究综述

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一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和谐共存模式的一种理念,人类共处一个地球,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贸易交往以及文化联系等使得人类社会休戚与共、荣损共担,治理命运紧密相连,事实上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在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世界里以“在承认不同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追求和推进协同、合作、平等互利、共享共赢,是摆脱“动力缺失”和“零和博弈”全球化困境的基本取向和药方。但由于各国资源禀赋、历史、发展水平、制度、政策、文化及对全球发展与治理诉求和水平不一,对多边合作看法不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认同和追求迄未形成普遍共识,而且,在现实世界中,国家间由于利益、边界、文化、宗教、资源、经贸、政策、移民等差异或矛盾经常产生矛盾和冲突,距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和目标异常遥远。在可预见的未来,逐渐形成平等共商、和谐合作的广泛共识和建设和谐共享的世界大同社会殊为不易,需要增进共识、树立目标、建立机制、打造平台、探索路径、付诸行动。要不断趋向这一目标,需要多元支撑体系,如思维理念、认知、制度、政策、交通旅游、经贸投资、文化交往等多领域互动、融合,政府、社会、公民、企业、国际组织多主体协力,各国、各地区和各区域联动,平台、机制、项目、方法等相互配合支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一个愿景目标、庞大体系、行动集成,很难一拥而上、全盘开花、一蹴而就,需要从一些有志敢为者倡导、领先,从一些具备条件的区域启动、从一些合理规划项目开始,循序渐进,逐步前行。主流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并奉行古代丝路和平、合作、融通的精神将中国与沿线各国紧密联系起来并共享发展成果,与中国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和最高目标根本一致,与当代国际社会期待共享全球化红利、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消除种族、地理、宗教、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差别和联通障碍、深化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共同繁荣、

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根本目标相一致。是中国率先倡导的一个旨在联合周边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通过基础设施、人员、贸易、金融、政策、文化等的联通促进区域合作和发展成果共享，形成区域一体化和命运共同体，作为驱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的动力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沿路带国家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率先合作发展，打造区域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进而影响、探索引领驱动其他区域的互联互通、合作发展，逐渐形成全球性的互通、融合和发展，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sup>①</sup>如自提出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后，接着提出“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接续，由最初的“亲、诚、惠、容”的周边命运共同体逐步扩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杨帆，肖倩倩认为，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关联密切，一带一路倡议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彼此融合，互不可缺，在全球化大视野中彰显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并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推进中共同升级。需要厘清一带一路倡议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一带一路倡议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离不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和目标指向。只有深刻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内含的价值意蕴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作用，才能开创世界各国和平共赢的新契机和国际合作的新格局。鉴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任重道远，一带一路倡议是解决全球化问题提出的现实要求，是解决全球化主要矛盾的可行路径，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提基础和中坚力量，两者有机统一不可分割。<sup>②</sup>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和实践，也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基于丝绸之路的传统交流合作共同繁荣精神，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把中国发展同沿线各国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与世界梦衔接起来，推动沿线各国联动发展。各国在此过程中将形成“共商、共建、共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等荣损共当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sup>③</sup>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是中国政府参与新时代全球治理应有的使命，也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重要保障。<sup>④</sup>

国外专家学者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涉及经济合作，也是通过经济合作改善世界经

<sup>①</sup> 陈须隆，“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求是》，2018年4月16日。

<sup>②</sup> 杨帆、肖倩倩，“一带一路”倡议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蕴涵，《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sup>③</sup> 邱璇，以“一带一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民论坛》，201712（下）。

<sup>④</sup> 胡兴东，“共享减贫知识 共建减贫责任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23日。

济发展模式，使全球化更加健康，进而推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sup>⑤</sup>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解决全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世界各国开辟了新的合作之路，它不是中国“独奏曲”，而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大合唱”，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国梦，也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sup>⑥</sup>阿根廷亚洲和阿根廷研究中心主任古斯塔沃也指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基于所有参与国的互利互惠原则，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国际关系和世界贸易的新模式，将使全球化变得公平而且富有人性，为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提供融入全球化的接口（道路、通讯、电网、电缆的建设等）。通过重塑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编织一张立体化的贸易投资网络，让过去居于全球化边缘的次区域国家获得发展机会，将为新时代的探险者们发掘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沿线国家经贸和产业投资合作，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促进新一轮全球化的均衡、包容发展。从推动经济发展到促进政治、社会领域的融合，一带一路将给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带来机遇。<sup>⑦</sup>我们正进入一个将会出现一个更加分裂和碎片化的世界和更加复杂的时期。全球化本身不会逆转，但世界正在发生一场不同的全球化，这就是中国式全球化，它以一带一路为最显著的特征。<sup>⑧</sup>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从中国角度对全球化的诠释，展示了中国如何成为世界新兴力量、如何从根本上帮助世界弥合分歧这一举措将成为促进全球和平与合作的手段。<sup>⑨</sup>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列塔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寻求多种形式的互相依存：互联互通，相互贸易，长期投资，它与完全建立在金融统治基础上的华尔街模式不同，这一倡议希望促进解决发展不平衡，政治治理对立，无法为阻止并扭转全球共同资源恶化而协调行动等危害国际社会的问题。<sup>⑩</sup>

国际社会日益认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促进全球发展、治理合作的重要价值。2016年11月17日，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一致赞同联合国大会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联大决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打造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

<sup>⑤</sup>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一带一路’倡议”，《环球时报》，[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8-10/04/content\\_7660336.htm?node=20908](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8-10/04/content_7660336.htm?node=20908)，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5日。

<sup>⑥</sup> 陈效卫，“‘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一访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4日第16版。

<sup>⑦</sup> 孙萍、叶书宏，“‘一带一路’为全球化带‘三大利好’”，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1212/c1002-28943610.html>，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5日。

<sup>⑧</sup> 孙微，“马丁·雅克：善于学习的中国必须与众不同”，《环球时报》，2018年10月19日。

<sup>⑨</sup> 强薇，“[访谈]马丁·阿尔布劳：用共同的目标增进理解”，《人民日报》，2018年4月23日。

<sup>⑩</sup> “法媒：‘一带一路’助中国开启21世纪原创模式”，参考消息网，<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8/0423/2262565.shtml>，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5日。

的新前景，与相关国家开展更为密切的合作，相关国家会因这种合作关系而受益。联合国大会主席莱恰克也认为，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分享其财富和经验，是全球发展之路。<sup>11</sup>日本野村证券2018年4月17日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低收入受援国经济快速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平台”。中国资助的项目将增加受援国直接投资，缩小基础设施差距，刺激数字经济增长并建立供应链。

综上所述，各方研究基本上认可一带一路倡议对于覆盖全球人口约60%、世界经济总量约30%的沿线亚欧大陆区域的发展、和平、繁荣和安全共享所具有的率先打造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洲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进而促进亚欧联通和亚欧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并对全球联通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产生积极影响的本质内涵和潜在价值。国际社会以及国际组织的评价同样普遍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发动机、国际发展与治理合作重要倡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的重要内核和多维支撑之一。一带一路倡议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合作性项目。中国通过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相关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连通了亚欧，保证了与沿线地区交流并大大提高了自身影响力。<sup>12</sup>

已有文献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一带一路倡议两者的重要意义以及内在关联进行了原则性的研究和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对于两者关联度分析依然不够全面和具体；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成为世界共识和实践行动的基础和条件缺乏探讨；如何让一带一路倡议实践有效演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机部分等等缺乏建设性建议。因而，要合理有效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付诸实施，并使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无缝对接、高效促动，需要更加细致分析两者的含义、内在关联，以及中国与其余世界对这两者的看法，中国如何向周边国家和其余世界讲好自己的倡议，并转化为全球故事。因为，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倡议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均是庞大的长期系统工程，绝非中国一己之力可以担当。充分认清其面临的难题、厘清相互关联、找出共同价值，可以位打造有力的支撑体系提供有力解释并帮助世界准确清晰理解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进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践。

<sup>11</sup> 王建刚，“记者手记：由联合国高官为‘一带一路’点赞说起”，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15/c\\_1122993640.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15/c_1122993640.htm)，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5日。

<sup>12</sup> Sven Biscop, “The EU and Multilateralism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s”, (July 2, 2018), <http://www.egmontinstitute.be/the-eu-and-multilateralism-in-an-age-of-great-powers/>(accessed December 15, 2018).



## 二、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自2013年中国首倡一带一路建议并付诸实践以来,这一倡议在国际上的接受度日益提高,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了上百个共建协议,经贸投资活动日益活跃,并超过中国对外投资和经贸平均增速,在沿线国家建立了数十个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推进,金融合作、制度与政策协调以及人员交流等互联互通水平明显提高。一带一路在推动欧亚区域合作发展等诸多方面均有日益凸显的表现,正成为引领全球化、全球治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和产生显著国际影响依然任重道远,要将其稳步顺利推进、发挥其对区域合作、区域命运共同体进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功能还充满诸多难题和挑战。

### (一) 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不足

迄今,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还存在一些不同认识甚至负面观点和态度。主要有:

#### 1. 不了解甚或无视、漠视

一些国家或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漠视、无视中国倡议,很少报道一带一路倡议,国民无从得知其详,或者获得不准确信息甚至歪曲信息。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意义等的共识还不够,中国倡议尚未得到广泛认同和理解。依据清研智库与凤凰网国际智库2018年6月12日在京主办一带一路全球传播论坛将一带一路沿线67个国家387家媒体的社交传播内容和传播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实时监测330个Facebook账号、289个Twitter账号发布的《“一带一路”全球社交传播大数据报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涉华内容仅占其媒体播出内容的3%,而在中亚媒体中几乎处于空白,这与中亚被视为一带一路核心热议区域不相适应,也与中国国内媒体关注度高达90%的热度形成鲜明对比。这意味着沿线国家和全球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很低,而在印度Zee Café电视台2018年第一季度Facebook账号上发布的一档澳大利亚美食节目(中国饺子)的预告竟成为涉华传播度最高事件,关注度明显高于一带一路内容。还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纯粹是中国项目、单纯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服务。还有观点认为中国需要大包大揽,做出更多投入和贡献,要求每一个项目都无条件成功,如有有些机构过度渲染放大被取消或失利的项目,忽略更多的成功的项目。实际上并非所有一带一路项目最终都能确保成功,有些项目不成功或者失败也属于正常现象,也并非一带一路建设所独有之现象。而且,不是所有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的项目都是一带一路项目。实际上,一带一路项目中有不少项目有西方跨国企业或其他第三方企

业参与（直接投资或间接融资等）。

### 2. 担忧、不认同和不参与

一些国家政府、企业和国民源于信息来源不足、政府和媒体立场等多种原因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导向、内容、价值等不知晓、知晓甚少或者对其宗旨、内涵等理解不到位，担忧之心有之，如担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较高，一旦发生风险，要么亏本经营，要么撤资招致这些国家不满，会导致“花钱买仇家”的结果（IMF 总裁拉加德）；还有担忧中国能力和实力不足，运用国际规范公开透明的管理能力不强；如有匈牙利学者抱怨中国的一些投资计划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不认同不参与之心也有之。如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持消极态度，坚持不表态、不参与，甚至提出“亚非发展走廊”（自由走廊）、“印太经济走廊”、“季风计划”、“香料之路”、“棉花之路”等一些不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倡议和计划。欧盟 2018 年 9 月 19 日发布一项亚洲基础设施计划，加强欧亚互联互通。这既有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互通和合作的一面，也不排斥部分内容排斥对冲的一面。

### 3. 怀疑、污蔑、歪曲和谩骂

一些对华不友好学者、官员和媒体质疑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背后“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认为中国希望借助一带一路令亚太地区力量平衡再洗牌，或是类似美国当年推动“马歇尔计划”一样，以经济援助达到政治控制，抛出“中国威胁论”，“地缘扩张论”、“经济掠夺论”、“环境破坏论”、“规则破坏论”、“债权帝国主义论”、“就业恶化论”、“分裂欧洲论”等诸多质疑、曲解和攻击一带一路倡议的怪论。还有一些舆论认为，一带一路项目中中国企业和资金进入部分地区是对当地经济的威胁，对本土企业的排挤。夸大负面情况，如美国 RWR Advisory Group 咨询公司发布消息称，2013 年以来，中国在 66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宣布投资的 1674 个基础设施项目中约 14% 的项目（234 个）遭遇了麻烦。陷入“麻烦”的中资海外基建项目的增加会损害一带一路倡议的声誉。

13

上面提到并不限于提到的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诸多疑问和一些歪曲、反感等，证实了迄今为止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意义及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关联和重大普遍价值的解释和传播尚不能让沿线各国以及全球各方满意和信服。

## （二）一带一路倡议落地进度、运行情况、成效及影响尚不如人意

<sup>13</sup> 金奇：“‘一带一路’项目为何大量遇阻？”，FT 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8461?full=y&archive>，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15 日。

迄今，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沿线各地全力推进，但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制度协调和政策调整、民心相通等是长期过程，很多项目等刚处在洽谈、启动阶段、尚未完工或开始产生显著成效，对双边尤其是当地的就业、税收和经济增长等产生显著影响，受到急于见到成效的舆论或者当地政府及民众的质疑等，有多方面的原因。

#### 1. 工程项目本身规模大、周期长、投资多

很多工程项目规模大、投资多、周期长，如中巴经济走廊全长3000多公里，需要投入逾千亿美元，绝非数年内可以建成；又如中吉乌铁路以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均需要长期大量投资建设。还有则是当地的产业配套和供应保障能力不强，以及从中国或第三方供应链条太长等，均影响项目进程和效率。

#### 2. 统筹规划不够科学严谨，项目谈判存在贪腐问题等

一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因各种原因出现计划更改、停工、停滞甚至取消等也非罕见。一些项目引发公众反对、劳工政策抗议、施工延期以及国家安全担忧，部分问题源于项目谈判过程中存在不透明、暗箱操作和贪腐。2018年马来西亚新总理上台后取消了上任总理与中国签订的高铁项目，新政府认为该项目谈判过程中存在腐败。2018年10月10日国家塞拉利昂取消一项由塞拉利昂前总统花了四年时间谈判并在该国大选几天前签订、中国资助、造价高达4亿元（美元，下同，约5.5亿新元）的新机场工程。新总统比奥曾在竞选期间批评新机场为“虚假项目”。

#### 3. 管理体制及管理能力不高、合作方协调配合不佳

跨境合作涉及制度、政策、人才、劳工、语言、文化、宗教、就业、治安、环境等多方复杂因素和双方甚至多方合作主体，协调配合和管理极为艰难。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经常受到当地治安状况恶劣、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的武装袭击等干扰，工期自然受到拖延。一些项目本地化运行水平不高，对当地需求、法律法规、传统习惯、人才招募、劳工法律等不熟悉，如有波兰学者对中国相关官员不了解其所在的波兰城市基本地理状况。

#### 4.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信息透明度和规范化水平有待提高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存在一些项目立项、招投标、运行等公开性、透明性和规范性不够等问题。如“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成立以来在很多方面信息不透明，只在自己网站上公布了一些合作领域，东盟国家不知如何申请；缺乏信息发布中心；基金政府主管及细节不清楚；一些中国投资项目政治考量和政府主导多于市场原则和社会安全监管考量不足，前期预测和可行性分析缺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智库——LSE Ideas的中国前瞻项目(China Foresight)负责人于杰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中很多项目的高级管理层团队都是由中共

任命，不具备高超的管理技能，对东道国也缺乏了解。在很多中国提供融资的基础设施引发激烈争议的国家，中国官员和高管们对在与本国的威权市场截然不同的社会解决争端准备不足。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两家机构拒绝面向承包商进行公开的竞争性投标，如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联合融资基金提供部分融资的哥伦比亚国内40亿美元的伊图安戈大坝。这意味着某些承接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承认“它们的中国中心主义意识造成的损失”。

### （三）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乃至全球参与的动员能力不够

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就明确宣布一带一路是面向沿线所有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开放性合作项目和平台，中国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合作方参与。5年来，认同、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行动中来的国家、企业和国际机构、组织等日益增多，除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外，日本、美国、韩国等国的企业也开始参与进来。2018年10月中日两国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为两国企业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强化了法律基础和金融保障。但是，整体而言，迄今，仍有相当多的国家、政府、企业和组织等还对一带一路不了解、不知晓、不认同、甚至误解误读、冷嘲热讽、袖手旁观，更遑论支持和积极参与。这说明，在说服和动员更为广泛的力量认同和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形成更为强大的正能量方面，中国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 三、发挥中国引领角色唤起全球共同行动

国际经验显示，但凡涉及众多合作对象和目标复杂多样的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行动，要取得成果往往需要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龙头引领和共同感兴趣和可接受的合作标的（对象与项目）以及具有激励性和约束力的规则制度等，这是消除集体行动搭便车和日益陷入一盘散沙的关键。中国作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者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践行者，无疑需要发挥自身积极主动性，致力成为引领力量和主引擎。

### （一）需要讲清讲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关联与重大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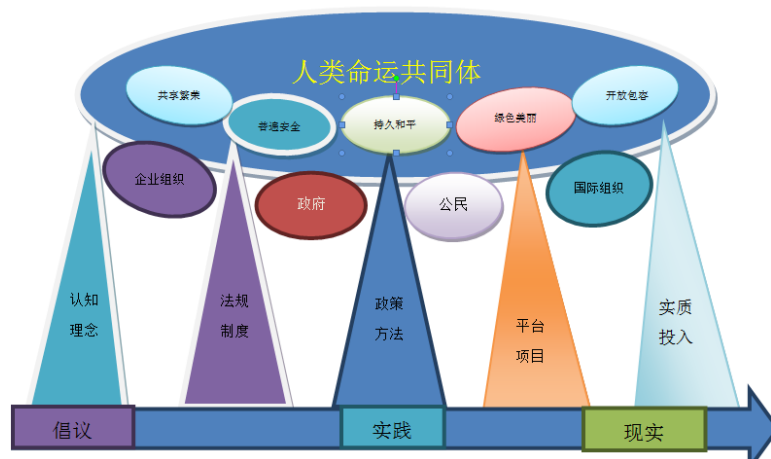
一带一路建设5年来的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五通，民心相通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民心不通，缺乏民意基础和舆论支持，其他四通将严重受挫，即便基础设施和经贸投资活动进展顺利，也可能得不到民众、舆论等的欢迎和接受，而且，硬件建设不能不受到阻击。

因此，推进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应将加强舆论、文化和民心交往等提到与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同等重要的程度上。中国政府、社会、企业、媒体等各方应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改进方法，合力讲清讲透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刻内涵、时代意义、普遍价值及其与区域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关联和互动共进本质，非常必要和迫切。

### 1. 清晰和深刻阐述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共价值和全球含义

面对沿线国家政府、民众和舆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无知、不理解甚至误解，最好的办法是讲清楚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价值和必要性，让沿线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深刻清晰了解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沿线国家和欧亚互联互通共同繁荣以及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联和重大示范与引领意义（图1）。图1比较清晰地描绘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支撑体系中的平台、项目的位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庞大建设体系中多维支柱之一。只有让沿线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真正深刻了解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区域合作、各国平等互利共享繁荣安全稳定等方面具有的普遍价值和时代意义，才能消除各种质疑和歪曲。

图1 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支撑体系中的角色位置



### 2. 发挥媒体传播讲好国际故事的功能

媒体传播是增进民心相通的核心平台。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意在促进交流主体多元化，拓展正式外交范围，发挥二轨外交积极效果。除了充分发挥外交渠道增进官方往来和认知之外，必须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各国媒体、学术、智库、民间交流管道对于深化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支撑意义的理解和认同。在应对沿线国家民众不解、疑

问以及西方媒体与观察家的片面解读与批判时,在尊重客观事实、国际惯例和事物发展规律基础上展现更多的话语叙事灵活性,慎重回答好西方民众和学者的关切和疑问,求得谅解和支持。因此,中国应通过公关和媒体渠道客观充分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意义以及相关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影响并联合境外意见领袖,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风范,彻底打消周边国家、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担忧,引导人们科学评价、理性发声,将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和内在价值传播出去,为全球理解、接纳和转化为共同行动。

## （二）改善和创新运行模式，率先做好一带一路项目发挥成功示范效果

一带一路建设是国际合作过程,对运行管理有较高的要求,需要严格对接国际合作建设规范性法制性,提高公开性、透明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按照国际惯例和规范立项、招投标、接受国际权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监督,媒体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减少政府主导的政治性项目安排和内部不透明谈判等操作方法,严格依据市场化运作标准运行。需要综合考虑政策、规则制定、风险与可行性评估等内容,协商制定符合各国利益的细则与条例,为区域合作、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制度支撑。

## （三）提高风险应急处理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开展的,必然遭遇诸多困惑和风险。任何合作项目的成功与否,除了买卖双方合作努力因素外,还与异常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如社会环境、经济措施,政治结构、媒体倾向、民众情绪,乃至其他因素介入等综合因素有关,每个因素都可能成为一个“噪点”,综合考虑到多方因素及其可能变化,尤其是难以预测的负面因素的冲击,并建立强有力的应急处理体系和能力,是消除隐患、防范风险迅速扩大化以控制对交易基本盘颠覆性影响的关键。

## （四）需要联合和广泛动员各种力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多元化的长远国际合作系统,需要沿线数十个国家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数十万、乃至百万亿美元规模的庞大投入和数十年、数代人的艰苦努力,远超中国一己之力可以为。因而,秉持开放包容心态,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支撑互赢的共识、动员更为广泛积极力量至关重要。中国需要以包容、开放心态,积极动员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理解支持和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并认同、支持和对接其他形式的各种倡议和方案,包括欧盟的欧亚联通计划、俄罗斯中亚国家的欧亚经济联盟、甚至印度的亚非经济

走廊、南亚经济走廊、以及美日等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等，寻找最大合作交集点，减少和降低分歧和矛盾之处，求同存异，合作共享，动员和发挥最大多元合作力量，才能更好更快更有效地建设一带一路。

#### 1. 与更多相关国家谈判并达成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协议 筑牢一带一路建设政治基础

沿线国家政府无疑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因素和关键力量。中国政府应该继续推动与各国政府谈判，争取达成更多的共商共建政府间协议，为一带一路建设强化战略支持、政治与法律保障。目前，中国与沿线部分国家政府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协议，以及建设产业园区等协议，对于促进诸多重大项目的落地创造了政治基础和战略保障，但与部分国家尚未达成类似协议，例如与沿线重要国家印度等，这需要中国政府继续努力与印度和其他国家政府沟通、协商。

#### 2. 吸引更多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智库等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群策群力，发挥各方优势，除了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直接参与外，还需要加强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亚开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等国际组织、机构的合作，这些组织机构一方面具有较强国际权威性，另一方面具有强大经济金融实力和丰富国际治理协调经验，取得其支持和参与，有利于推动解决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增进一带一路建设国际性、合法性和保障性。此外，还需要发挥各国的商会、行会、智库、中介咨询服务机构等多种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职能效用，共同商讨发展模式和路径，帮助更合理规划设计项目、更好协调各方关系、更有效解决各种矛盾。

#### 3. 积极对接欧亚经济联盟、欧亚联通计划、欧亚走廊等其他国际项目

中国不仅只关注和要求其他国家认同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还应积极研究、了解包括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和中亚、印度、伊朗等国的诸多相关国际合作规划，寻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之处、探讨合作共享可能性，忽略其与一带一路建设排斥和对撞性因素以及谁主谁次的问题，以各种方式开展平等互利合作。

#### 4. 打造样板工程，发挥示范效应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无数具体项目，难以不问轻重缓急、齐头并进，而需要科学研究、全局权衡，循序渐进，力求上马一个，做好一个，做精一个。因为每一个项目都处在当地政府、民众监督和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异常敏感，稍有不慎，可能名誉扫地、鸡飞蛋打，甚至产生长期全局性负面效应。因此，中国政府、企业等必须坚持协同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与担当，坚守国际劳动、环境、技术和商业标准，提供最佳实践、

高质量和安全标准，增强历史责任感、时代使命感，以质量第一、成功第一、信誉第一的根本要求和基本原则，以致力打造、塑造精品方式去赢得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可和尊重，并产生良性示范和带动效应。同时，更要打造一批教育、培训、医疗、农业、科技、文化等有品牌价值的轻资产项目，让这些要素深入丝路百姓生活中去，发挥“润滑剂”和“黏合剂”的作用。

## 结语

前面，在对现有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相关性研究以及实践进行考察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及实践中值得关注的若干问题，并论证了动员多方主体力量改进传播方法模式，讲清一带一路倡议本质内涵、时代意义及对沿线国家和全世界发展与治理合作，共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普遍价值，力求为消除各种国际疑虑和分歧，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将中国首倡合情合理内化为区域乃至全球共同理念和行动的基本设想和要义提供注解。